

文明实践在行动  
春意暖心庆新年



《文明实践在行动 春意暖心庆新年》  
来源：中国文明网

# 福州党校学报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编辑委员会

主任：童桂荣

常务副主任：陈 浩

副主任：戴 鸿

编 委：李永杰 刘兴旺 魏少辉 吴碧英

张曙婷 林淑周 欧 敏 赵咏梅

钟 诚 曹敏华 黄 虹

主 编：陈 浩

副主编：林淑周

编 辑：丁春华 兰丰丰 陈琴容 郑梅钦 魏璐珂

# 福州党校学报

双月刊

2026年第1期（总第218期）

主管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

主办单位：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4-107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5-1204/C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出版日期：

2026年2月20日

国内定价：

10.00元

印刷单位：

厦门安妮企业

有限公司

## ·目次·

### 新时代新思想研究

- 5 “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理论渊源、内涵辨析和时代价值  
林馨如 李永杰
- 14 “马上就办”优良作风的理论品质与时代价值  
林善炜

###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 21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争议问题的当代阐释及中国方案  
王宝林 杨 苗
- 31 数字劳动异化的四重批判及其扬弃路径  
刘姿琨
- 39 自由时间与精神解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资本逻辑批判与超越  
李青宇

### 治理研究

- 47 从“他者凝视”到“主体自觉”：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叙事逻辑何以重塑？  
庄顺程

##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 维普、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 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 请在投稿时声明, 本刊将做适当处理。

57 当代青年策略性怀旧叙事的景观呈现及引导策略  
——以“勇敢小羊”叙事为例

尹昭桦 花宇馨

66 高质量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 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王建生

### 文化研究

72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逻辑、鲜明特质与实践进路

顾雨萌 李春霞

82 从沉浸到速食: 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叙事异化与消费逻辑

邓欢 王祥礼

### 福州发展研究

91 习近平在福州实施“堡垒工程”的创新实践及其时代启示

蔡雄杰

编辑出版:

《福州党校学报》

编辑部

主 编: 陈 浩

副主编: 林淑周

地 址:

福建省福州市

福马路 990 号

邮 编:

350014

电 话:

0591-88199355

电子邮箱:

fzdxxb@163.com

网 址:

<http://fzswdx.gov.cn>

#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FUZHOU

## The Main Contents

NO.1,2026

General NO.218

- 
- 05 Theoretical origins, connotative analysi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New Cultural Life-Entity"  
Lin Xinru, Li Yongjie
- 14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Get It Done Right Away" work ethic  
Lin Shanwei
- 21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Chinese approach of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the Marxist View of Labor  
Wang Baolin, Yang Miao
- 31 Fourfold critique of digital labor alienation and its sublation  
Liu Zikun
- 39 Free time and spiritual liberation: critiqu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capital logic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spiritual life  
Li Qingyu
- 47 From the "Gaze of the Other" to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how can the narrativ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 image be reshaped?  
Zhuang Shuncheng
- 57 The landscape presentation and guidance strategies of strategic nostalgia narratives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 —Taking the "Brave Little Lamb" narrative as an example  
Yin Zhaohua, Hua Yuxin
- 66 The value implication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high qual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ang Jiansheng
- 72 The generation logic,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the cultural for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GU Yumeng, LI Chunxia
- 82 From immersion to fast consumption: the narrative alienation and consumption logic of movie commentary short videos  
Deng Huan, Wang Xiangli
- 91 Innovative Practices and Contemporary Insights of Xi Jinping's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rtress Project" in Fuzhou  
Cai Xiongjie

# “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 理论渊源、内涵辨析和时代价值

林馨如<sup>1</sup> 李永杰<sup>2</sup>

- (1. 福建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17;  
2.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在理论渊源层面, “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有三重理论根基: 一是马克思主义“魂脉”的奠基; 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滋养; 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实践。在内涵辨析上, 从本体论看, 它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新结晶, 是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 是通过“化学反应”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特质论看, 其核心特征体现为文化主体性、辩证统一性、人民中心性。“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文化根基、为民族复兴注入了精神力量; 推动了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 打破了西方话语垄断, 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 新的文化生命体; 理论渊源; 内涵辨析; 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6)01-005-09

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时, 他指出: “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 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sup>[1]</sup>。“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之一, 这个概念是从中国式现

代化实践探索中提炼出来的原创性概念, 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 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理论渊源

### (一) 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奠基

“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诞生是“两个结合”发展的必然结果。“两个结合”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唯物史观核心概念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百年建构研究”(23BKS03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馨如,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李永杰, 博士,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化相结合。在实现“两个结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不可或缺的“魂脉”，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诞生筑牢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唯物史观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提出提供了根基。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2]</sup>“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也不是精神自我运动的产物，而是于物质生产的不断变革中产生的。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了，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了，这种变革必然伴随着包括旧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变革。这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其次，“新的文化生命体”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发展观。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发展观具有开放融合性，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学反应”。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3]</sup>他们深刻揭示了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不断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持续交融、相互渗透。文化之间同质的要素逐步累积，推动文化整体性发展。<sup>[4]</sup>当前的世情、国情下，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民族文化持续突破地域的限制，融合各民族之间的异质成分，其自身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同质成分持续增加，逐步削弱了本民族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在这一演化过程中，才有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契机。

最后，“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我们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时指出：“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

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sup>[5]</sup>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始终将文化置于社会整体变革中考察，拒绝“文化虚无主义”。江泽民提出：“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区分精华和糟粕，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新的生命，放出新的光彩。”<sup>[6]</sup>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泽民指出要在推陈出新中把握。由此可见，“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长期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进行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结果。

##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滋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深厚的文明底蕴、独特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标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大同思想与革故鼎新理念，犹如三条贯通古今的精神血脉，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出现提供了滋养。

我们党始终坚守的“人民至上”理念，植根于百年奋斗征程中，脱胎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最早源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孔子“仁者爱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历代思想家对“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阐述，民本思想强调执政者应以安民、养民、利民为根本职责。于“新的文化生命体”而言，民本思想也为其提供了核心的价值源泉——文化源于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民本思想也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主体根基来源之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融会贯通，升华为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构成了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政治底色和价值导向，为“新的文化生命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大同思想勾勒“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终极理想与愿景。大同思想最早源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其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便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这一社会理想的核心内涵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权力公选，德才为纲；二是社会共济，鳏寡有养；三是财富共享，力出为公；四是诚信和睦，盗乱不作；五是天下为公，万物并育。大同社会的哲学根基与最高原则是资源、政权、成果属于所有人。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中，唯有中国共产党人，既对大同理想抱有至真至诚的信仰，又能将其切实付诸实践，更具备真正让这一理想照进现实的能力。<sup>[7]</sup>“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共产主义征程中的一大成果。

革故鼎新赋予“新的文化生命体”生生不息的内在活力。革故鼎新最早源于《周易》，原文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为破除旧的，确立新的。《礼记·大学》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周易·系辞下》可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古训，这些都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勇于自我更新、与时俱进的特质。“新的文化生命体”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使其能够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复杂环境时，不断变革自身，实现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强大的自我更新、自我转化的能力。

###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实践成就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能发生“化学反应”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除了“魂脉”的奠基和“根脉”的滋养，还离不开主体和环境的作用。“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主体，也离不开党领导人民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场域。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的强有力支撑。历史与实践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不会有“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

生。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砥砺前行，在不同历史阶段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孕育成长筑牢根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其创设了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为其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卓越成果，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飞跃，则为其构筑起更为完备的制度保障、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sup>[8]</sup>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飞越波澜壮阔，深刻改写了民族发展的命运轨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两个结合”的伟大创举应运而生，既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深度融合，又促进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在“两个结合”的背景下，“新的文化生命体”得以孕育、成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努力，探索出的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成果。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土地改革、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党的十二大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从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不断完善。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持续提升国家发展的文化软实力。“新的文化生命体”在这一背景下得以产生，因此，“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是无土的果实，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沃土中得以生根发芽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的实

践场域。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不断塑造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舞台，推动“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破解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惯性思维，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世界各国存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存有差异，中国式现代化为文化的交融提供了实践的路径，促使各个文明之间得以相互借鉴，促成了“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生成的舞台，还为其提供强大的驱动力。“新的文化生命体”厚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沃土中，依靠其提供强大的驱动力，得以生生不息，不断焕发强大的生机活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的新问题、新挑战，激发着人们的文化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对外开放，与各国进行文化的深入交流与融合也为“新的文化生命体”注入新的元素与动力。

## 二、“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内涵辨析

### （一）本体论：有机统一的生命体

“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成果，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两个结合”孕育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中所形成的新的理论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究其本体而言，它不是碎片化、零散的观点，它是新成果、新路径、新文明的有机统一。

1. 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的结晶。当前，经由“两个结合”孕育而成的最新理论成果——“新的文化生命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历程中凝结的最新理论精华，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崭新成果。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要义所在。<sup>[9]</sup>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经过了漫长的发

展过程，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1930年，毛泽东就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sup>[10]</sup>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固然需要认真学习，但绝不能脱离中国实际，更不能割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脱离中国特点空谈马克思主义是行不通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成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标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深邃的理论思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坚定的制度自觉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也主张吸收古今中外优秀思想文化，这一系列伟大成就，仍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深度结合所结出的丰硕果实。邓小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继承了《礼记·礼运》中“小康”社会的理想图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探索出了如何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方案，超越了传统文化中小康思想的狭隘性和空想性。这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把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结合世情、国情、党情，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顺利开展，取得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成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党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始终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

2. 新路径：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生命力。“新的文化生命体”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有机、融合的文化形态，它突破了传统文化“静态传承”“单一领域”“封闭发展”的固有模式，以“融合性”“实践性”“创新性”为核心特征，之所以称其内涵为“新路径”，正是因为它为文化的传承、发展、落地提供了一套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方法论与行动框架。这种“新路径”的作用，体现在文化传承过程中，通过打破固态、连接要素、激活价值，让文化从“观念形态”转化为“实践动能”。

传统文化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深刻影响了其传承与发展的路径。首先，线性传承机制。表现为通过单一的手段，依赖于权威与固定载体进行传递。比如师徒相授或通过书籍留存进行传承。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机制保障了一定的真实性与系统性，但也天然存在封闭性与排他性，抑制了跨领域之间的文化碰撞。其次，地域割裂。表现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与时代革新、经济生产、社会治理等社会领域存在疏离状态。文化常被赋予超越性价值，其内在智慧与资源亦未能有效整合，没有反哺于动态的社会治理进程。这种系统间的功能性区隔导致传统文化在应对社会整体性变迁时，难以主动汲取外部动力，更多是被动适应——即主要依赖外部环境压力驱动其内部有限的调适与修正。此种应激性适应模式，常滞后于社会需求，且易导向碎片化、表层化的变革，缺乏基于内生逻辑与跨领域协同的前瞻性、系统性创新规划。

“新的文化生命体”为文化传承更新了方法论，用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当代文化传承正经历双重路径革新：纵向传承维度，实现从“复刻式保存”到“活化式延续”的范式升级；横向发展维度，完成由“单一领域自循环”向“多要素共生”的生态拓展。传统路径囿于物理性存续，如文物封存与技艺模仿，虽维护形式完整性，却因脱离现代生活语境导致“博物馆化僵化”。新兴路

径则以“文化生命体”为内核，通过三重机制激活传统基因：科技赋能、场景再造和功能适配。更深层次的变革在于跨域融合——文化生命体作为“连接器”，将文化基因注入经济、科技、社会治理等领域，实现社会产业链多方面升级。最终构建“传统守护—现代转化—跨界增值”的可持续发展闭环，为世界文化遗产活化提供中国方案。

### 3. 新文明：“化学反应”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

“新的文化生命体”从本体出发，在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过程中，充分彰显了强大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它通过不断克服外部环境的阻碍与内在机理的缺陷，实现了自身的新陈代谢与有机生长，并在此基础上经由深刻的“化学反应”，孕育生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新文明形态，而这种新文明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的文化生命体”则是这一新文明的生命载体。让新文明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孕育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着两重深刻内涵。第一，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中包含着文明形态，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整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激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生命体，才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发展。<sup>[1]</sup>第二，从微观层面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本身不仅具有物质形态、精神形态，还具有文化形态、文明形态，通过这些形态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

“新的文化生命体”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要坚持从本体出发，保证“新的文化生命体”始终保持生机活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从中国式现代化本体出发，其宏观与微观层面虽各有侧重、相互区别，却始终内在统一、不可割裂。无论从宏观维度审视，还是从微观视角考量，新文明都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全过程。

“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文

明形态，并非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是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度契合。它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产物，更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维度，新文化生命体建构文化权益普惠分配机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均衡，更是文化权益的普惠。“新的文化生命体”通过数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突破地域资源壁垒，借力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实现群体文化赋能。文化的共同享有让共同富裕有了更丰富的精神内涵。“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历史的必然，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结果。它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机，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拥有了深厚的文化根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唯有始终保持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在传承中创新、在开放中守正，才能让这一文化生命体持续生长，让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篇章更加璀璨。

## （二）特质论：三大核心特征

“新的文化生命体”与中华文明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文化主体性、辩证统一性、人民中心等鲜明特征。

1. 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在中华民族这一特定的主体条件下所形成的文化。世界上有些民族在经历外来入侵后，原有的文明被压制，也可能中断甚至消失，或者与原有的文明背道而驰。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中断并且保留至今是因为拥有自己的“主体性”。<sup>[12]</sup>在“新的文化生命体”中，文化主体性又一次得到巩固。

“主体性”的哲学含义源于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到近代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得以成型。黑格尔的辩证法有个观点就是论证“奴隶通过劳动获得主体性”。奴隶最初因对主人的恐惧而屈服，丧失自我意识，沦为“物”，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性，只有客体性。但在劳动中奴隶意识到自己掌握着各种主人不具备的生活技能，自己不是被动的“物”，而是能主动改变世界的“主体”，这时候

奴隶开始有了主体性。这就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我们中华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经历了入侵，特别是在近代遭遇的西方入侵，一度冲击着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入侵者试图改变中华文化，但我们保持了自己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至今。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一登上历史舞台，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发展成为迫切需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工农阶级将劳动热情凝聚成无穷的力量：在这一时期，第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出厂，国产首批“东方红”拖拉机完成生产，“人民第一号”火车诞生……，中华民族精神在此时具象化为“劳动精神”。“劳动精神”既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源头活水，更彰显着中华文化生命体的文化主体性。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主体性跃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主体，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主体，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革新主体。

2. 辩证统一性，“新的文化生命体”具备内部与外部环境互动中的对立统一、有机融合与动态平衡等特点。“新的文化生命体”坚持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既承认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主体性，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又承认各民族的文化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这个普遍性。

辩证看待世界文化，“新的文化生命体”承认不同民族之间各有差异，都存在文化的主体性，各民族之间没有高或低、贵或贱、重要或非重要之分。应该允许各国各民族文化共存，共同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世界文化生命体，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些西方国家存在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民族歧

视,实则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结果。它表现为不仅对其他民族的文化加以排斥,也对其他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进行否定。这种偏颇的思维在“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张中亦能找到印证。<sup>[12]</sup>“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对其他民族文化历史的诋毁、虚构来达到否定其他民族文化的效果。二元对立思维下形成的文化观,只承认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特殊性,不承认文化的普遍性。即不承认各民族文化具有普遍联系、有共通的地方,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世界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文化观割裂了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这种文化观强调不同民族之间存在高低之分,坚持西方中心主义,其后果必然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产生剧烈的冲突,民族的多样性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被削减。这种文化观鼓吹其文化为普世价值,并试图取代其他文明,主张“西方文明中心论”,将其自己的文化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来衡量别的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

辩证看待我国文化发展,“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承认各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且主张各民族之间在保留其文化特殊性的前提下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sup>[13]</sup>我们中华民族重视文明交流、给予文明包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造人类文明精神家园。“新的文化生命体”将辩证统一性贯穿于我们本民族的文化发展,也贯穿于世界文明发展,使其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法。

3. 人民中心性,“新的文化生命体”来源和指向都是人民。文化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人民中心性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核心属性,贯穿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发展全过程。“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人民中心性有两重意蕴,一是“新

的文化生命体”的出现源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民需要不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的富足,还需要精神层面的富足。二是人民的创造力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活力之源。人民群众不断创造新思想,为其注入强大动力,使之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的精神需求日益强烈。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sup>[14]</sup>为初心使命和奋斗目标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新的文化生命体”构建始终将人民作为核心,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文化生命体的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使文化发展能真正富足人民的精神世界。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更是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文化来源于人民。文化生命力的绵延不绝,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这个源泉,人民是“新的文化生命体”蓬勃发展的动力源泉。中华文化虽然饱经磨难,却从未中断,延续至今,依靠的是人民群众强大的创造力。新时代,文化传承面临新的困境,生活方式转变导致传承链面临中断风险,许多非遗项目后继无人。因此,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更需要人民群众集思广益,发挥其庞大的创造力,建立多元的传承方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这需要我们更好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sup>[15]</sup>

### 三、“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时代价值

#### (一)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性价值

“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文化根基、为民族复兴注入精神力量,对我国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人被迫进行劳动,资本逻辑支配着人,产生劳动异化以及人的异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

人民至上的理念，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一个能够满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文化生命体。<sup>[6]</sup>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质财富日益丰裕的现代化，更是人民精神世界趋向富足的现代化。在此进程中，人民对文化的需求愈发强烈，这也需要创造一个富有蓬勃生命力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文化根基，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各类文化思潮竞相涌现，西方意识形态持续冲击，文化自信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根基，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主动选择。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的文化生命体”必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成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

### （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革新性价值

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广大人民铸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必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赓续，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推动其实现现代化革新。要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革新的关键，需以科技发展作为赋能的主力，助力“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铸就。具体而言，要以文化遗产为传承载体，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算法等先进技术，运用多元表达形式传承传播传统文化，进而打造独具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品牌。取精华，弃糟粕，古为今用，不断挖掘传统文化，构建中华文明，将中华文明置于时代语境下，推动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激活中华文明基因。<sup>[6]</sup>在中华文明基因的历史传承中，发掘其中蕴含的“仁爱礼智信”“大同思想”“民本思想”等，在实践中推陈出新，将革新的现代化的传统文化融入“新的文化生命体”中，明晰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蕴。要坚持革故鼎新，

汲取中华文化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使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接轨，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塑造文化生命体的新形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以独特的基因标识激活文化生命体的强大生命力。

### （三）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开创性价值

“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世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贡献了中国智慧。冷战结束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度是对世界秩序走向的两种最有影响的文化解读。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均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和价值标准作为“普世尺度”来衡量世界文化发展，忽视非西方文明的独特发展逻辑。“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出现，有望改变以上偏颇的文化解读。“新的文化生命体”认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之间并不是相互敌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是对不同文化相互敌对的观点非常有力地反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构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既推动了两个文明共同向前发展，更通过“化学反应”，创造了一个新的文明状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有多种文明共存，多样性必然存在差异性；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互相取长补短，世界文明这棵大树才能枝繁叶茂。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中孕育而成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已然超越了“文明冲突”的狭隘认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提供了全新方案。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维度的独特呈现，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深刻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所秉持的独特世界观、文明观与历史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它是中国的、独特的、具有前瞻性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发展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面向世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发展

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发展都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 结语

“新的文化生命体”并非凭空而生的抽象概念，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深厚底蕴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实践特别是“两个结合”伟大探索的必然成果，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自觉与文明觉醒的集中体现。“新的文化生命体”冲破了国与国之间的壁垒限制，在理论与实践、现实与历史的维度间自由穿梭，始终以蓬勃崭新的生命姿态，实现着持续的有机成长。“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出现依托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魂脉和根脉的作用，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带领下的实践。“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实现了自身的新陈代谢和有机生长，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新的文化生命体”概念的提出不仅对于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意义，也为那些想要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道路。不论是现在或者是将来，“新的文化生命体”都会在世界民族之林熠熠生辉，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 2023(17):4-1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2.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04.
- [4] 阮荣辉, 杨亮.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发逻辑、哲学意蕴及时代内涵[J]. 党史天地, 2023(06):1-10.
-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664.
- [6]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123.
- [7] 韩喜平, 袁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探析[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01):1-10.
- [8] 董德福, 任宇韬. 论“两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成基础[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06):47-56.
- [9] 刘建武. “两个结合”与新的文化生命体的造就[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03):21-29+150.
- [10] 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11-112.
- [11] 陈金彪. 论“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02):9-17.
- [12] 吴宏政. “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内涵与特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12):4-22+199.
- [13]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 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传承发展的深刻内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 社会科学战线, 2025(04):1-10.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26.
- [15] 黄金峰, 沈有洪. 习近平文化思想人民性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25(07):1-13.
- [16] 雷辉. 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三重逻辑研究[J]. 马克思主义哲学, 2024(05):13-22.

责任编辑：丁春华

# “马上就办”优良作风的理论品质与时代价值

林善炜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 “马上就办”是20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提出并倡导的工作作风。“马上就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要求,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路线和公仆理论在行动上的生动体现,具有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等优秀品质,蕴含着跨越时空的理论价值、历史价值和实践价值,为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关键词:** “马上就办”; 作风建设; 理论品质; 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D630;B0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6)01-014-07

“马上就办”是20世纪90年代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针对当时福州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严重、机关作风懒散、办事拖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问题而提出并倡导实施的优良工作作风。“马上就办”从点滴做起、重在落实,从效率抓起、拼出速度,以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贯穿于改革开放的方方面面,体现在福州发展的全过程,为90年代福州的改革开放和事业发展注入了全新动力。

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州市始终坚持把“马上就办”作为一种执政理念来践行,作为一项工作要求来落实,作为一个服务标准来提升,作为一套制度保障来构建,让“马上就办”在榕城大地蔚然成风。历经30多年的实践淬炼,“马上就办”优良作风已经深深扎根在福州市、福建省乃至全国许多地方,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理念,产生了广泛深刻持久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人们坚守的一种自觉行动。“马上就办”优良作风在

赓续相传中发扬光大,在守正创新中与时俱进,愈发彰显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机和活力。

“马上就办”优良作风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是已经被历史验证的具有本质性、方法性和规律性的思想认识,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实践充分证明,优良传统的生命力在于守正创新,只有将精神内核与时代需求相结合,才能持续提升治理能力,真正践行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中央全面从严治党和加强作风建设的新要求下,对“马上就办”在理论层面进行总结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应当秉持历史和发展的观点,重点研究和把握其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和时代价值,并发扬光大,使“马上就办”优良作风真正成为全党、全国的干部作风,成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成为新时代党的重要执政理念。

**基金项目:** 2025年度福建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研究”委托项目研究成果(FJDX2025A001)。

**作者简介:** 林善炜,中共福州市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一、“马上就办”的理论品质

理论建构始于对日常认知的提炼升华，植根于实践探索的深厚土壤，萌发于对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最终形成对发展规律的系统化理论表达。理论的价值在于其蕴含的变革力量——当科学理论被人民群众理解并运用时，就能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巨大物质力量。理论品质指与理论具有直接同一性品质的规定性。由于其具有的特殊品质，一种理论才成其为自身。<sup>[1]</sup>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指导我们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上就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要求，蕴含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路线和公仆理论在行动上的生动体现，具有人民性、实践性、时代性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优秀品质。

1. “马上就办”的人民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地将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确立为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最终价值取向。“马上就办”正是在群众要求不断提高、政府服务能力难以匹配的状况下，为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好地回应民生诉求、服务群众需要而提出的，充分体现了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担当意识。“马上就办”矢志不渝的追求是以民为本、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充分反映和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心声和要求。“马上就办”的提出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和坚决支持，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体现了“人民本位”的价值观。“马上就办”的本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有最朴素、最平民化的理论品质和实践价值，有着鲜明的人民性。人民性是“马上就办”的价值指向和原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也是在治国理政中处理各种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关系的全面调整，社会利益的快速分

化与重组，我国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情况和新变化，尤其是一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更需要践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始终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为，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困，切实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真正把群众期盼转化为实际行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马上就办”的实践性。理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又发展理论。任何理论的真实性都必须通过实践来确证，唯有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才具有现实指导价值。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科学地阐明了“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2]</sup>，“马上就办”的“办”就是付诸实践、狠抓落实，它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通俗表达。实践第一、“办”字当头，是“马上就办”的首要原则。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如何去“办”，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办”，直接影响到“办”的结果。因此，端正“办”的态度，明确“办”的目的，创新“办”的办法，落实“办”的政策，提升“办”的能力，完善“办”的制度，才能保证“办”得漂亮。只有把党的政策和主张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通过“办”转化为实践的力量，才能推动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坚决反对精神不振、口号表态、办事拖拉等不良现象，强调要激发工作热情，提高办事效率，树立时间观念。他号召广大领导干部要办实事、多办事、快办事，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马上办、办得快、办得好。为谁“办”？如何“办”？“办”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构成了“办”的学说整体。习近平同志指出：“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sup>[3]</sup>“马上就办”的实践性品质集中体现在其源于实践、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上。

3. “马上就办”的时代性。理论总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必然镌刻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理论的时代性特征，本质上源于其与特定历史条件的深刻关联。“马上就办”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体现了与时俱进、服务时代发展的鲜明特征，也是顺应改革开放潮流，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选择，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品质。“马上就办”的行政理念，就是要追求效率、追求效益，使政府的工作人员能保持充沛的精神和高效率的工作状态，确保政府能根据社会各种新情况新问题确立灵敏高效的应对机制，保证政府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过程中让各种社会资源获得最佳的经济社会效益。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显著增强，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宏观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必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这种竞争，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但其背后是政府管理方式、机制、职能与效率的竞争。我国提出“制度型开放”，就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和新要求，通过对标最新的国际规则，营造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环境。推进制度型开放，首当其冲就是对政府治理提出许多新挑战和新要求，需要同步推进政府治理变革，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以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这对各级政府、各级领导干部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sup>[4]</sup>面对新形势，必须用“马上就办”的要求定位政府权限，优化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加强与国际惯例接轨，建设一套高效运行的现代行政管理制度。

## 二、“马上就办”的时代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sup>[5]</sup>“马上就办”作为一种工作态度、工作作风和工作要求，既充分体现了党对人民群众的尊

重，更体现了党为人民利益勇于负责、敢于探索的担当精神。<sup>[6]</sup>“马上就办”的优良作风经过30多年的坚守和传承，仍然直指时弊、历久弥新，让人更加深切地领略到它背后蕴含的鲜明的时代价值。

1. 在理论价值上，“马上就办”是马克思主义群众理论的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在于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融合，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探索出群众路线的科学工作方法，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理论和人民立场。<sup>[7]</sup>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立足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从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和时代特征出发，明确提出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系统形成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明确将这一重要思想载入党章，成为全党的行动指南。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提出并倡导的“马上就办”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责任担当，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新的内涵和要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深化和发展，是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群众理论的新境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活力。“马上就办”作为一种工作态度、一种工作作风、一种工作要求，既充分体现了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智慧和力量的尊重，更体现了为人民利益勇于负责、敢于探索的担当精神，蕴含着唯物史观真挚的人文情怀、求是的科学精神和务实的实践理性等理论品格。<sup>[8]</sup>“马上就办”工作精神和工作作风，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体系增添了新内容、新方法和新思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在历史价值上，“马上就办”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作风建设是贯穿其中的一条鲜明主线，深刻彰显着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从中央苏区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到延安时期以优良作风赢得民心；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到改革开放初期关于党风问题关乎党的存亡的重要论断，再到新时代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深入整治“四风”问题，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作风建设不仅关乎民心所向，更直接决定着党的生命力，影响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前途命运。作风建设已成为党的建设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密切联系群众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群、干群关系的状况已经成为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成效的晴雨表。

“马上就办”工作作风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一理念与党的群众路线紧密相连，是“急群众之所急”的具体体现。“马上就办”的实质是作风与效率的体现，传承弘扬“马上就办”工作作风是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需要，是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中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体现，是解决机关效能差、执行力低、办事拖拉、越位失位等不良现象的具体措施，也是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提高办事效率的具体办法。<sup>[7]</sup>“马上就办”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种直观、外在的表现，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党的自我革命在基层的实践形态，“马上就办”将群众监督嵌入作风建设的创新实践，为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供了地方经验，为新时代作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传承弘扬“马上就办”工作作风，把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引向深入，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

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

3. 在实践价值上，“马上就办”为新时代进一步提高治国理政能力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马上就办”作为一种高效、务实的工作理念，不仅承载着对效率与结果的双重追求，更在实践中展现出深远而广泛的价值。“马上就办”这一理念不仅要求我们在面对问题时迅速行动，更强调以实际行动和真实效果为导向，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马上就办”是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一项行动要求，是作风建设与能力建设的有机统一和集中体现。“马上就办”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马上就办”不仅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新时期党和政府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和服务发展的一种能力要求，更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种直观的、外在的表现。实践证明，“马上就办”对于改进党员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具有良好效果和强大生命力。“马上就办”的工作理念和的工作作风与现代化政府治理中对提高治理效能的要求高度契合，为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提供了有效路径。“马上就办”为广大干部在新时代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带头践行“马上就办”，为广大领导干部作出很好的示范，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保一方平安”，给群众留下了一个做事实实在、待人实在、考虑问题实在的印象。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体现了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尽职尽责的高尚品格，使广大干部倍受鼓舞、倍增动力，并激励着广大干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行动投入到干事创业中去。

### 三、“马上就办”的启示意义

“马上就办”，坚持的是执政服务理念，彰显的是为官政治素养，体现的是过硬工作作风，实现的是民心民意民愿。<sup>[9]</sup>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

倡导实施的“马上就办”优良作风，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顺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历史和实践检验中，愈发展现出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芒。

1. 践行“马上就办”，必须增强公仆意识。增强公仆意识是“马上就办”的基本前提。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看来，公仆理论的基本内核主要体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马上就办”归根到底是要服务于人民，与公仆理论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增强公仆意识，从根本上就是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增强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意识，这是“马上就办”的前提和基础。<sup>[8]</sup>改变工作作风关键在于提高思想认识，转变观念。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经常强调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主人，不能当官做老爷，摆架子，向人民耀武扬威，要改变“衙门”作风，强调宗旨观念和公仆意识要经常讲、反复讲，要把各项工作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最终利益挂起钩来。他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的公仆，关心群众的冷暖安危，把群众的事情作为大事来抓，积极为基层、部门和群众排忧解难。“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做人民公仆，就是要认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公仆意识，将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为人民做实事，切实增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马上就办”是责任担当和敬业精神的体现，面对发展的大事、群众的难事，唯有心中有民、心中有责，才能自我加压，主动提速。只有每个岗位、每个环节都尽职尽责，“马上就办”才能真正落实，成为一种行为习惯。实践证明，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sup>[9]</sup>立足新时代历史坐标，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永葆为民初心不动摇、践行服务宗旨不改变。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试金石，将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尺，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 践行“马上就办”，必须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是“马上就办”的基础条件。政府职能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本质在于界定政府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定位与作用边界，明确政府行为的职责范围与权限划分。政府职能具有动态性的特征，它取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性、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以及政府与自然界的演变。<sup>[1]</sup>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变迁，政府职能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环境、新挑战，根据新的形势对政府职能作出新的界定，实现职能定位的创新发展与科学重构。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领域，也是提升“马上就办”的基础性工作。“马上就办”是党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政府职能定位准确，可以有效解决“办什么”的问题，使“马上就办”有明确的任务指向和工作范围，从而保障“马上就办”有时间、有精力和有能力做到“办就办快”“办就办好”“办得更好”。在推进“马上就办”工作中，要前瞻考虑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只有政府职能转变到位，“马上就办”才能“办”得更快、“办”得更对更好，而不是陷入“盲办”“错办”“乱办”的困境之中。要按照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真正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使“马上就办”有明确的目标任务；从审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使“马上就办”有更高的服务水平；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转变，使“马上就办”有严格的实施标准；从官僚化政府向高效能政府转变，使“马上

就办”有更快的运作效率。

3. 践行“马上就办”，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健全体制机制是“马上就办”的根本保障。体制机制是带有根本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内蕴了激励与约束机制。“马上就办”不是一时兴起的短期行为，也不是随口而出的口头约定，而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事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马上就办”一旦提出，就应该立说立行，说到做到。但“马上就办”说易行难，要不断创新探索，建立健全“马上就办”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体制机制。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在推进实施“马上就办”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体制机制建设，系统思考、统筹设计，形成了有机统一、相互衔接、有效运作的“马上就办”的体制机制。既要健全责任制，保证各方面、各环节有机衔接、密切配合，避免缺位、错位，更要落实问责制，切实解决不问不责或问而不责、问而轻责现象，以责任落实倒逼“马上就办”取得实效。要使“马上就办”得以坚持，并且办好，办出效果、办出水平、收到实效，既需要有科学的组织保障，更要将“马上就办”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探索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行政法律法规体系，推动“马上就办”成为政府部门的一种工作常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健全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马上就办”就可能成为空口号；只有健全完善的体制机制，才能保障“马上就办”真正落到实处。毫无疑问，健全体制机制是“马上就办”制度化、常态化、可持续化的根本保障。必须建立健全“马上就办”的评价、监督和约束机制。在评价机制建设方面，要采用内部评价与社会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量化考评，使评价结果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感受。在监督机制建设方面，要采用上级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方位监督，使“马上就办”处于公开、透明、阳光的运行轨道上。在约束机制方面，注重采用物质惩罚与精神惩罚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问责惩处，使“马上就办”的全过程处于硬约束之中，有效防止不良工作作风的反弹作祟。

4. 践行“马上就办”，必须狠抓落实执行。狠抓落实执行是“马上就办”的首要关键。“马上就办”贵在行动，重在落实。狠抓落实，就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扎实工作，集中精力抓大事，把统揽全局的精心部署和各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sup>[12]</sup>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特别注重抓落实，市委甚至把每年3月份定为“抓落实月”，并坚持把督查作为领导行为，切实做到有布置、有检查、抓落实、有反馈。“优良的工作作风是一级一级带出来的，要注重发挥一把手的表率作用和督促作用。有了重视抓落实、善于抓落实的一把手，才能带出抓落实的好班子、好团队。”<sup>[13]</sup>在福州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以上率下、身体力行，以“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对上级的部署做到雷厉风行，狠抓落实；对基层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处理，督促查办。狠抓落实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一项关乎全局的战略思想。工作部署重在执行，贵在落实。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立足工作实际，逐项细化分解任务，确保政策落地见效。要坚决杜绝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形式主义，克服畏难情绪，主动担当作为，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确保决策部署有效实施的核心在于构建责任链条，形成压力传导机制，实现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做到部署有方案、推进有措施、过程有监督、结果有评估。任何战略规划和政策安排，都必须坚持实践导向，强化执行力度，避免空喊口号、做表面文章，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举措和具体行动，方能实现既定目标、取得实际成效。狠抓落实、善抓落实、不折不扣、完全到位的执行力，靠的是党员干部的实干、会干、肯干、巧干。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讲究灵活性，要依靠鱼水交融、牢不可破、和谐密切的党群、干群关系来实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大力弘扬“马上就办”优良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确保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倡导践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抓住了作风建设要害，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和勇于担当的政治品格。“马上就办”在福州的深入实践和推广，形成了可复制的现代治理“福州样本”，其影响逐渐扩大，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理念。“马上就办”优良作风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已经超越了福州，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深入挖掘、认真总结、大力宣传、普遍推广，不断将“马上就办”的理念传承弘扬、发扬光大。站上新征程新起点，“马上就办”优良作风既体现传承性又具有时代性，不仅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反映出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向世界展示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风貌。

#### 参考文献：

- [1] 陈勇,陈国庆.试析理论品质的内涵与特性[J].理论导刊,2010(6):37-38+41.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 [3]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02).
- [4] 林善炜.制度型开放视域下的政府治理变革:机理、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23(11):17-23.
- [5]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16(01).
- [6] 陈清,王雪燕.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的思想渊源、核心内容和时代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0):4-7.
- [7] 林善炜.弘扬“马上就办”精神,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J].沿海企业与科技,2013(06):12-15.
- [8] 李新生.习近平倡导“马上就办”的三重意蕴[J].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1-4.
- [9] 张东文.“马上就办”的时代脉搏[N].山西日报,2016-05-03(C02).
- [10] 柴俊勇,红庐智库.铸就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光芒[J].党政论坛,2019(08):4-6.
- [11] 刘丹.法治政府:基本理念与框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57.
- [12] 孙伟,林善炜.习近平关于福州发展的战略、实践及启示[J].城市学刊,2015(03):41-46.
- [13] 习近平.关键在于落实[J].求是,2011(06):3-7.

责任编辑：郑梅钦

#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争议问题的 当代阐释及中国方案

王宝林 杨 苗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401)

**摘要:**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是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的钥匙, 马克思的整座思想大厦是以劳动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但是, 当前出现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质疑、批评, 甚至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过时论”。针对此类片面认知, 可以聚焦五大关键议题阐释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当代价值: 一是摆脱现代性悖论, 从劳动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内在关联中探寻人的全面发展路径; 二是直面劳动异化外溢现象, 科学应对数字规训与价值空虚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 三是聚焦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模糊化”“灵活化”现象, 构建新型劳动关系,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四是再审视家务劳动的生产性、非生产性争议, 推进性别平等; 五是厘清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源泉, 化解生产力跃升带来的主体性危机。总之,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持续印证着该理论的现实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 人的解放; 异化劳动; 劳动关系; 性别平等; 劳动价值

**中图分类号:** A81; C970;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 (2026) 01-021-10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引发的理论争议始终是围绕现实的劳动问题展开的。无论各方秉持何种立场, 争论最终都指向对劳动本质的反思。尽管争辩的部分理论构想带有乌托邦色彩, 但其中蕴含的批判精神却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思想体系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重要的方法论参照, 也为我们揭开资本主义的面纱、审视当代劳动领域的新问题、找寻中国特色的应对之道打开了新视角。

## 一、现代性危机与人的解放问题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社会进步与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 劳动解放被界定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它的价值就在于推动人类逐步摆脱“物支配人”, 向着“自由王国”不断跨越, 最终实现人的类存在本质充分彰显。但是, 在现代性展开的历史进程中, 劳动这一本应承载着人类解放使命的核心动力, 却在资本逻辑的渗透和支配下发生扭曲, 演变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理解这一转变的内在逻辑, 是直面现代性困境“何以至此”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探讨实践层面的“破局之道”, 则是关乎人类未来命运走向的现实课题。

从人类文明起源的视角审视, 劳动在人的主体

---

**作者简介:** 王宝林, 博士,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杨苗,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性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劳动在参与人的塑造过程中催生了语言和思维，孕育和发展了社会关系。劳动推动人类挣脱自然条件的桎梏，使人从单纯的自然存在逐步进化为具有独立意识、能够能动改造世界的实践主体。随着劳动形态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关系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社会中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逐渐转向现代性语境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种转变一方面促成了个体主体性的觉醒，另一方面也使劳动本身陷入深刻的现代性悖论。具体而言，现代性悖论是指在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框架下，人的类本质与生存现实之间被割裂出一道难以弥合的鸿沟，劳动本该作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但是在现实语境中却普遍呈现为受雇于资本的谋生手段。劳动者虽然参与物质生产过程，却从具有创造性的实践主体沦为被支配的客体，与自我实现的价值追求相背离。劳动彻底偏离了它作为个体自我超越途径的定位，变成了否定自我本质的形式。

在应对现代性引发的困境时，汉娜·阿伦特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回归”传统政治。她主张通过重建公共领域和复兴政治实践来打破劳动的私人属性，为人的解放寻求出路。马克思揭示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指出它造就了现代国家的抽象、虚幻性与市民社会的利己、孤立性，基于此预见国家的最终消亡，并为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所处的工业化社会，现代性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资本主义化。马克思指出，唯有扬弃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瓦解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无产阶级革命是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关键。马克思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性的历史进步性，而是主张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辩证超越，让劳动回归到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规定，从而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指导下，我国借助对国家的社会化扬弃、对劳动与资本关系的调整以及对

现代性困境的理性批判，为人类社会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性跃迁提供了具象的典范。国家的消亡，不是简单地废除国家，也不意味着阶级统治随即成为过去，而是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条件下，对国家进行社会化改造，推动国家从阶级统治的工具蜕变为服务社会整体利益的机构，其职能从维护资产阶级的法权转向捍卫全体人民的福祉。在此过程中，通过政治与法律的理性化，让法律与政治制度从掩盖阶级统治的帷幕转变为实现劳动解放的实质性保障。实现这一政治实践的关键，在于变革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现代性困境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资本不受约束地支配市场，无情地破坏社会关系、碾压个体尊严，导致市场经济深陷泥淖，沦为“撒旦的磨坊”，整个社会跌入无政府状态下冲突频发的“霍布斯丛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认资本存在的合理性，坚决“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sup>[1][2]17</sup>，将资本，特别是关键的生产资料公有化，剥夺其凌驾于劳动之上的特权，“设立‘红绿灯’，规范、引导资本发展”<sup>[1][2]20</sup>，充分发挥其服务生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代性力量。对现代性困境的超越，最终要落实到个人。让劳动者成为资本的主人，合理把握资本的文明化趋势，提高掌握驾驭资本逻辑的能力，让劳动真正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恢复劳动作为人自我实现的本质定位，从而“让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sup>[2]</sup>，实现“虚假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跨越<sup>[3]</sup>。

## 二、劳动异化外溢与社会治理问题

异化是黑格尔辩证法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最初的语境中，异化用来描述主体意识从现实世界中脱离外化为客观精神并与主体意识对立，最终二者在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中实现统一，完成绝对精神的运动过程。马克思对异化概念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改造，他把异化概念从纯粹的、思辨的精神王国转移到“现实的社会关系”与具体

的、历史的“物质生产条件”之中。在马克思看来，异化首先体现为“劳动异化”，即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框架中与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劳动产品分离和对立；进而与人的类本质乃至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分离和对立。时至今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未失效，而且在劳动异化基础上呈现出更为广泛的“溢出效应”。当代的异化现象超越了传统的劳动过程本身，一个重要表现为对技术理性的盲目崇拜衍生出支配人本身的“技术异化”；另一个表现则是精神世界催生出畸形的“文化异化”。它们共同构成现代社会治理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

在当代社会生产体系中，劳动异化正以一种新的形态在科学技术领域呈现。技术，究其本质，是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是主体实践智慧的结晶，本该作为延伸人的肢体机能、推动人类解放的载体而存在。然而，在资本无限追逐自我增殖这一内在逻辑的驱动下，技术不再单纯地作为一种工具服务于人，而是演变为一种挣脱人类控制、遵循自身运行规律并反过来驾驭自然、支配创造者的异己性力量。这种由服从、发展、解放人类到驾驭、遏制、扭曲人性的转变是“技术异化”的本质所在。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机器大工业时代，异化劳动可以具象为工厂冷冰冰的高墙与刚性的机器流水线作业对工人身心的物理束缚；那么在如今的数字时代，这种束缚转变为一种由算法逻辑与数据流共同编织而成的、无形弥散于生活细微处的数字囚笼。

“算法霸权”与“数字劳工”是技术异化的典型表征，集中体现了技术工具理性在资本逻辑主导下的价值偏移。虽然算法本身被赋予高效、中立的技术理性特征，但在现实应用场景中却日益成为资本实施精准剥削与控制的“帮凶”。例如骑手群体的劳动过程和职业评价体系均被纳入数据化的管理框架并受到算法的严格规制。再如视频创作者在流量至上的驱使下，沦为平台体系中的“数字劳工”，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也随而异化为可量化、可榨取、

可交易的数字资本。正如马尔库塞所警示的那样，当技术合理性披上“政治合理性”的外衣，资本主导的权力支配关系便巧妙地伪装成技术的必然性，解放的现实前景似乎不得不“来自对技术理性的否定”。<sup>[4]</sup>更为关键的是，由技术异化引发的人机界限的“缺场”，不仅催生了潜在的伦理危机，更将使人类文明秩序陷入深层阵痛。当人类沉醉于似乎凭技术就可以无所顾忌地主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幻想时，海德格尔所忧思的“存在的遗忘”与“世界的灾难”便将成为现实。在技术的加持下，沉溺于对数据、利润、效益等“存在着”的追逐，将“存在”本身意义的探寻搁置脑后，终将使精神世界一度荒芜，深陷价值真空。

劳动异化的“溢出效应”并未止步于生产，而是贯穿于随之而来的分配、消费等环节，还以“文化异化”形式悄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肌理与价值结构。当劳动失去本身的创造性，且不再作为确证自身本质的力量时，个体便倾向于在消费行为中寻求身份的认同、找寻生命的价值，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已然成为异化现象侵袭下的文化景观。在“文化异化”现象中，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成为人构建自我的社会坐标。于是，消费从增进福祉的手段僭越为生命追求的终极目的。与此相适应，幸福感也从创造劳动和社会奉献中抽离，短暂的情绪、感官体验与对商品符号的追逐成为短暂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传统价值导向的扭曲和丧失使社会伦理规范与个人精神追求卷入物欲的洪流，由此造成文明秩序和价值共识的缺失。无限膨胀的消费欲望必将指向对自然无情地破坏和掠夺，催生沉重的“生态债务”，严重影响代际公平与和谐，进一步加剧自然与人类的紧张关系。

无论是技术异化引发的技术对人的数字规训，还是文化异化遮掩下产生的价值空虚，归根结底都导致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基于协作共赢的社会性联结，逐渐被充斥着恶性竞争与排他性的原子化的生存状态所取代。技术成为这种异化关系的执行手段，文化似乎也为其存在的合法性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价值辩护。克服异化的斗争，不仅是一场覆盖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实践，更是涵盖技术治理、文化价值与社会关系调整的系统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回应由劳动异化衍生的技术异化与文化异化问题时，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劳动解放的根本原则，并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时时处处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发展理念。“科技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sup>[5]</sup>基于这一认知，我国着力将技术发展嵌入国家治理的整体框架，将伦理道德纳入技术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系统构建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破除“技术中立”的迷思，赋予技术明确的价值导向和伦理约束，有效遏制功利主义倾向下的技术滥用。让科技真正地服务于人，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将人从“存在的遗忘”中唤醒，挣脱形而上学层面无家可归的困境。在这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中，重新找寻人与世界、与自身存在的本真联系。为破解由技术异化所加剧的生态危机，我国深入践行“两山”理论，加快推广绿色技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使科技在助力经济增长的同时，承担起维护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责任。针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导致的价值空虚与文化失序，我国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为构建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健全舆论引导机制，“做大做强主流舆论”<sup>[6]316</sup>，“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sup>[6]319</sup>，为劳动者营造清朗、和谐、欣欣向荣的文化生态。

### 三、劳动关系与权益保障问题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代，以平台经济为典

型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资源配置、产业融合等方面彰显出优势，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推动就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引擎。从政策导向来看，国家包容、鼓励支持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政策举措，着力营造宽松有序的市场环境，为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依托数字经济蕴含的内生动力和强大活力，为平台企业和从业者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这种新型从业模式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如劳动关系界定模糊、职业风险加剧以及权益保障缺失等一系列严峻挑战。在平台算法的精准调度与操控下，平台企业无限分割着从业者的劳动时间和空间，使劳动呈现出一种“幽灵化”特征。劳动看似无处不在，却又缺乏实质性的归属。这种新型劳动关系脱离了传统劳动关系的框架，现有的法律难以对其精准识别、有效捕捉和清晰界定。传统的监管手段在应对这种新型劳动关系时也显得力不从心。面对新就业形态带来的现实挑战，我国始终以切实维护好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为前提，在鼓励新就业形态与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之间积极找寻平衡点，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在数字时代平等享有体面劳动、全面发展的机会。

劳动关系模糊化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核心困境。从法律意义上看，“从属性”标准是界定劳动关系的一个关键性要素，具体表现为人格从属、经济从属和组织从属三种从属关系。这些关系通常需要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以契约条款的形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或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通过梳理实践中“事实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来确证“从属性”关系的存在。但是新就业形态下的灵活用工模式，恰恰模糊了这些要件，加剧了劳动关系的认定难度。平台企业常以“合作伙伴”之名否定劳动关系的存在，借此规避其作为雇主应承担的法定责任。这一法定关系的错位使无劳动合同、用工标准不统一等现象长期存

在并逐渐常态化，加剧了平台用工领域社会保险覆盖率偏低的现实困境。平台方大多不按法律规定为从业者缴纳社会保险，从业者面临短工龄、长缴费、低工资、高社保的现实矛盾。这种矛盾导致从业者的参保意愿持续走低，更使平台从业者群体的社会保障出现明显缺口。当从业者遭遇交通事故等职业意外时，由于未与平台企业建立法定的劳动关系，工伤认定将异常艰难。尽管部分企业会为从业者购买商业保险，但该类保险的本质是企业用以规避自身用工风险的一种手段，其赔付范围和额度难以完全覆盖由意外造成的经济损失，工伤赔偿的不确定性大幅增加，风险也被最大限度地转嫁给了从业者。此外，当从业者面临恶意投诉等不公待遇时，他们的维权会因缺乏清晰的法律依据和责任对象变得很困难，合法权益也因此难以得到保障。

在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除法律层面上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模糊这一基本问题外，劳动所呈现的“幽灵化”特征也加剧了从业者权益保障的困境。弹性用工模式使从业者的工作时段与生活过程产生了深度的交叉重叠，传统意义上“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界限正日益变得模糊不清，劳动如同幽灵一般，悄无声息却又无处不在地渗透于日常生活之中，劳动者在这种状态下难以将工作和生活进行有效分离。这种劳动的“幽灵化”表面上赋予从业者一定的空间自由，让从业者看似拥有了自主安排工作与生活的权利。但从深层次看，它实际上带来了更为隐蔽且严重的劳动剥削与控制。从业者在看似自由的接单背后，实则承受着算法和数据设定的更为严苛的时空规训，失去了相对自主的工作节奏和空间。就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而言，平台不仅垄断了劳动任务分配、劳动成果评价和劳动报酬计算等规则的制定权，还可以通过单方面调整算法参数变更劳动条件，进一步加剧劳动市场的两极分化。那些拥有较高数字素养且掌握多项技能的劳动者，能更好地适应平台设定的算法规则，从而获得相对

稳定且可观的收入；相反，数字素养较低、技能单一的劳动者，由于难以达到算法设定的严苛标准，即便付出大量劳动，也只能获得微薄的报酬，陷入“多劳少得”的困境。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缺乏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劳动者在面临不合理的劳动条约和薪酬纠纷时，无法获取有效的维权途径，陷入维权无门的境地。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劳动者的职业风险被全面放大，弱势地位也愈发凸显。他们不仅面临物理层面的“工伤、事故”，更承受着来自“恶意投诉、标签化、就业歧视”等数字管理手段所带来的巨大压力。

新就业形态存在的短板对个体劳动者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个体劳动者在权益遭受侵害时往往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的维权行为只能以零散的、非制度化的形式表现出来，难以汇聚成规模化的有效维权力量，直接导致他们在劳动过程中的话语权被进一步削弱。此外，随着劳动数字化转型的推进，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已难以适配当前新的工作环境。制度的刚性特征与劳动的弹性需求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对抗，大量新型劳动者游离于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之外，难以获得劳动的尊严与幸福感。新就业形态的蓬勃发展是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新就业形态呈现的多元化、灵活化特征，对当下以传统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劳动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由劳动关系界定不清引发的权益保障难题，不仅反映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现实矛盾，更蕴含着对当下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核心价值理念的时代叩问。

面对劳动关系的复杂局面，中国并未采取简单的管与放这种非此即彼的单一策略，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既能激发市场活力，又能保障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新型劳动关系。在顶层设计上，《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直面劳动者权益保障面临的现实痛点和难点问题，为司法实践和行政监管提供了关键的依据，

有效推动了平台经济在规范化轨道上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立足国家发展大局,明确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这一重要论断<sup>[7]</sup>,深刻体现了我国在应对新经济形态挑战时卓越的治理智慧与战略眼光。在202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sup>[8]</sup>的重要部署。这些论断和部署展现了党和国家坚定不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定信念。在基层实践中,各地政府积极落实中央政策要求,在关键风险领域精准研判职业伤害风险类型,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以制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促民生、稳就业提供有力支撑。在制度执行层面,构建“宣传—监管—服务”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加强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普及教育,切实提升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强化平台企业守法意识和主体责任。同时,持续深化工会组织改革,强化人文关怀,将灵活就业、零工就业等群体纳入工会覆盖范围,通过创新组织形式和服务机制,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服务体系;针对劳动者现实需求,提供工伤认定咨询、劳动争议调解等普惠性专业化服务;畅通从业者与平台企业的沟通渠道,推动形成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劳动关系。

#### 四、家务劳动与性别平等问题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劳动是一个永恒的议题,作为基本劳动方式的家务劳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却被赋予性别属性。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引发的争论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部分女性主义者以家务劳动为研究重点,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探求妇女解放的出路,但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社会生产时存在严重的性别盲区;她们强调性别斗争应具有和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意义,甚至主张将性别斗争置于阶级斗争之前。需要明确的是,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各有侧重,

前者以妇女解放为核心,后者的主题则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尽管女性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但脱离具体语境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生产概念来诠释家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意。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与“人的解放理论”为分析家务劳动的性质与女性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框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增加,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平衡,物质资料的生产在推动社会形态演进、社会分工变革方面更具决定性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以是否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为标准,对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进行了清晰的划分。生产性劳动能够直接参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实现资本积累的核心源泉;非生产性劳动尽管能满足公共或私人的需求,但不直接参与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无法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基于这一标准,家务劳动长期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体系之外,它的“价值”仅体现为“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家务劳动的价值也因此被遮蔽了。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早期的分工建立在纯粹的生理差异之上,两性之间是平等的,他们的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结合对家庭形态演变史的考察进一步指出,专偶制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sup>[9]187</sup>,深刻阐明了家务劳动的私人属性与女性从属地位之间的内在关联,揭示出二者的关系并非自然形成的,是与私有制相伴而生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只有废除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为妇女提供解放的可能。

部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两种生产理论”将人自身的生产摆在物质资料生产的从属地位,将价值创造的范围局限于商品生产领域,在客观上贬低了家务劳动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她

们认为家务劳动绝不是仅仅存在于私人领域的非生产性活动，而是支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普遍认同家务劳动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属性。她们认为妇女通过家务劳动生产食物、营造生活环境来满足自身和家庭成员的生存发展需要；而带有雇佣性质的家务劳动则进入社会流通领域，用以满足他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尽管这两种性质的家务劳动均未被纳入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但其创造的使用价值却是维系家庭与社会生活的基础。在家务劳动能否创造剩余价值的问题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内部始终存在分歧。达拉·科斯塔和谢尔玛·詹姆斯认为家务劳动属于生产性劳动的范畴，尽管它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通过再生产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为资本积累提供了根本性前提。在家庭分工体系中，男性劳动者通过无偿占有女性的家务劳动，得以从家庭中获得解放，进而全身心地投入资本主义生产；资本则通过向男性支付工资的形式，间接剥削女性的家务劳动，因此“家务劳动在根本上就是生产剩余价值”<sup>[10]</sup>。这一观点未能充分证明家务劳动直接参与了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这与马克思对生产性劳动的诠释存在一定的偏差。部分学者虽明确否定了家务劳动具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属性，但充分肯定了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贡献。还有部分学者主张跳出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分析框架，合理区分无酬的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有酬的家务劳动，将家务劳动置于社会再生产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更全面地揭示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

不同于早期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家务劳动的性质分析上，中期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逐渐突破了单一经济维度的争论，转向从制度和意识形态双重视角剖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海蒂·哈特曼认为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双重压迫造成了女性的不平等地位，并着重考察了二者之

间的关系。在私有制诞生时，父权制便与性别分工紧密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借助父权制将妇女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后备军，通过性别分工拉低整体的工资水平。父权制凭借私有制将女性禁锢在家庭领域，进一步强化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附。因此，只有同时推翻资本主义与父权制，才能使妇女真正摆脱受压迫的状况。与哈特曼不同，艾里斯·扬认为将资本主义与父权看作两种不同制度的二元分法不符合资本与性别压迫的共生逻辑，还弱化了女性的受压迫程度。即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长期植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父权制度也不会自动瓦解，因此她提倡将性别分工看作分析女性问题的核心，将其抬高到和阶级同等重要的地位，并指出消灭性别分工才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关键。性别分工使家务劳动和社会生产相脱离，为解决这一问题，部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家务劳动社会化”把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使之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这一尝试无疑是对恩格斯“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sup>[9]181</sup>的合理借鉴，但恩格斯并未将妇女解放限定于家务劳动的局部变革，而是强调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压迫，从根本上打破家务劳动对女性的束缚。此外，有学者提出“家务劳动工资化”的主张，实际是在变相承认家务劳动能生产剩余价值，试图借经济补偿彰显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却忽略了难以统一家务劳动的量化标准以及无人支付薪酬等现实难题。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消灭私有制”“消除阶级压迫”至今仍是剖析性别压迫现象、揭示其本质的关键理论。这场围绕家务劳动所展开的争论，为解决当代社会存在的性别歧视等现实难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性别议题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从边缘化诉求向国家共识的重大转变。30多年来，全球性别平等进程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我国，男女平等已成为基本国策，

妇女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我国的性别发展指数（GDI）趋近于1，性别不平等指数（GII）逐年下降，性别平等程度越来越高，女性在教育、健康等关键领域的合法权益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但从全球范围看，性别平等目前仍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5》分析了148个经济体在教育水平、经济参与、健康与生存、政治赋权四个维度上的性别差距细节。如在经济参与这一关键领域，女性劳动力占比已超四成，但在高级管理岗位的占比仅为28.1%。虽然全球整体性别差距已缩小至68.8%<sup>[11]</sup>，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的发展进程出现了明显放缓的迹象，必须通过针对性的政策干预和制度调整弥合当前存在的性别差距。在北京世妇会召开30周年这一重要时间节点，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创造者、推动者、传承者。”<sup>[12]</sup>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各方要以“四个共同”为行动指引，从“营造发展环境、培养强劲动能、构建治理格局、书写合作新篇”四个方向发力，将妇女事业与全球四大倡议一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之中。

我国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一方面高度重视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科学规划、精准供给，渐进式地减轻家庭内的家务劳动负担；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生育休假制度，严厉打击女性就业歧视行为，营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构建生育友好型的就业生态，保护女性平等就业和发展的权利。此外，通过精心制定、严格落实女性科技人才专项计划，为女性在科技领域的职业发展提供制度支撑。中国的实践证明，实现性别平等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指明的道路，又要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创造性地回应女性主义在文化与制度层面的合理诉求，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性别维度，让解放理论更加贴合当代女性的现实需求，推动性别平等事业稳步前行。

## 五、价值源泉与主体性缺失问题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生产要素，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融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深刻改变着劳动的组织形式和作用方式，推动我国生产力质态跃迁，实现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革。在人工智能席卷全球的时代背景下，也涌现了片面夸大人人工智能的自主性、宣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过时论”的论调。在无人工厂与无人车间的自动化生产模式下，价值从何而来，是否跳出了人类活劳动的范围？人类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将归于何处，是否也随之被消解？这些疑问冲击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使其面临严峻的时代审视与挑战。

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核心论断并未因技术变革失去其理论效力。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参与价值创造的问题，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争辩的根源在于对价值源泉范畴的理解，即是否坚持“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持表象论者认为，人工智能具备价值创造的能力：高度发达的机器智能体系不仅能够替代人的体力劳动，更能在相当程度上承担起复杂的分析训练、决策的规划制定，乃至创造活动等人的脑力劳动。在无人工厂的生产模式下，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工人在数量上明显锐减，甚至在个别生产部门近乎消失。但是，资本利润依然存在，并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这一派认为以智能机器为代表的自动化生产体系已经成为新的价值创造主体。

持本质论者认为，人工智能虽然能够参与价值形成，但它只是作为更高级的生产工具而存在，本身并不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人工智能在本质上仍属于商品的范畴，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二因素。它的使用价值在于能够辅助甚至替代人类完成某项复杂任务；其价值则凝结在由技术研发到生产制造再到投入运营全过程中所耗费的物化劳动。在价值

创造过程中，人工智能同历史上其他的生产工具类似，主要承担生产资料的职能，其作用也仅限于将自身已有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无法自行增殖。价值的唯一来源，仍是人类的活劳动。既如此，又该如何解释“无人工厂”在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所伴随的劳动者逐渐从生产环节中流失这一现象？具体而言，所谓的无人工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无人，它只是弱化了传统组织方式上劳动者对机器的直接附属和依附关系。它能够无限延伸劳动空间，把工人从固定的流水线转向特殊的办公领域，使劳动的形式更加隐蔽，因此造成无人参与劳动的假象。而智能机器自身的维护管理、大模型的优化升级，离不开退居幕后的生产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劳动者的管理劳动、创造劳动才是价值增殖的真正秘密所在。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物化劳动的比重日益增大，活劳动与物化劳动的功能出现部分重叠。作为劳动产品的数据、机器、厂房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生产的极大丰富，然而，它们并不创造价值，只是作为价值转移的载体而存在，价值创造的内在逻辑并未因技术进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较之于价值创造根源问题的争论，劳动主体性危机更直接关乎劳动者的现实命运。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工人是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机器设备只是人体力的延伸，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存在。人工智能的崛起，使劳动者与机器设备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从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的有机组成部分，到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的“有意识的肢体”，再到人工智能时代被边缘化的“无用阶级”，劳动者角色定位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不断被改写。<sup>[13]</sup>在资本逻辑下，人工智能从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产物变为支配人的力量。劳动者被自己创造的工具排斥出劳动市场的核心领域，丧失了劳动中确证自身价值的根本路径。于是，资本的有机构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提高，用于购买劳动力、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缩小。劳动

者收入水平与社会财富增长的速度脱节，他们的相对收入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部分工人可能失去原有的工作岗位和赖以维持生计的经济来源，面临被机器替代的生存威胁。

当劳动者无法通过劳动实践彰显自身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规定性时，便会对自身的社会角色、存在意义产生质疑，从而深陷生存焦虑和精神困境。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劳动者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传统界限，在无形中延长了劳动者的总体劳动时间；又通过远程办公等工作模式，拓宽了劳动的空间组织形式。这一过程似乎在形式上将人从枯燥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但实际上并没有颠覆资本的运转逻辑。数据垄断和算法霸权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整个社会深陷主体性危机。

人工智能的崛起非但没有宣告劳动价值论的过时，反而以资本积累的新实践印证了该理论的时代适应性。“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仍是我们破解价值迷局、回应主体性危机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在理论层面坚持正本清源，深化拓展对马克思活劳动概念的理解，打破“要素价值论”的认知误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切要素价值在本质上皆来源于人类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凝结与转移。以辩证思维把握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明确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而数据、资本、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是推动现代社会财富增长的重要条件。尤其需要明确的是，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和新兴的劳动对象，虽已成为财富创造的重要源泉，但其价值的实现始终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这一根本前提。在实践层面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引领，构建适应数智时代的生产与分配关系。我国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模式，既认可各类生产要素在财富形成过程中的实际贡献，又保障劳动要素在分配格局中的主体地位不动摇。通过完善数据要

素市场,使数据、资本等关键生产要素有序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中的价值分配。与此同时,积极塑造“人机协同”的新常态,将人工智能的技术势能转化为人的发展动能。把劳动者置于管理、监督、决策的核心位置,将其从重复性的生产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使其重新掌握劳动的主导权。此外,国家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前瞻性教育布局,努力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的智能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劳动者的知识储备、能力水平和数字素养,培育适应并引领人工智能时代的创新型劳动者。

### 结语

劳动是人类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对劳动的研究都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取向。当今社会,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交织,在劳动领域催生出一系列亟须回应的现实课题: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理论体系,有效回应西方思潮的诘难与挑战;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发展需求有机结合;如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将劳动研究与共同富裕实践有机统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行动指南等等。围绕这些现实课题展开的理论研讨和实践探索,本质上是研究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劳动观。

总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引发了社会生产方式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刻变革,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唯物史观的根本遵循和方法论参照,还为解决当代劳动异化、人机协同伦理等开辟了新的破局之道。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99.
- [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李小兵,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104.
- [5] 习近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J].求知,2022(05):4-9.
-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7]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01).
- [8]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8.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Rosemary Hennessy, Chrys Ingraham. Materialist Feminism: A Reader in Class, Difference, and Women's Live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24.
- [11] 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25(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EB/OL]. (2025-06-01) [2025-12-25].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global-gender-gap-report-2025>.
- [12] 和音.为全球妇女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N].人民日报,2025-10-14(02).
- [13] 于天宇,刘禹壮.智能机器资本主义应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2):11-21.

责任编辑:丁春华

# 数字劳动异化的四重批判及其扬弃路径

刘姿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数字劳动作为数字技术催生的劳动新形态, 虽然成为推动当代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但是仍未摆脱资本逻辑的钳制。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 在数字时代呈现出四重新特征: 数据私有化导致劳动产品的异化, 算法规训消解劳动活动的主体性, 生存碎片化割裂人的类本质, 平台操控深化人际关系的异化。应对数字时代的劳动异化, 需要从数据共享体系、技术伦理、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与内生动力等方面持续发力, 以扬弃劳动异化, 推动劳动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关键词:** 数字劳动; 异化; 数据私有化; 算法; 平台

**中图分类号:** F49;F0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6)01-031-08

当前, 人类正经历一场由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文明转型。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与快速迭代, 展现出数字文明蕴藏的巨大进步潜力——它极大提升了全球生产效率和协作水平, 重塑了经济社会的运行逻辑, 为实现人的社会性解放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 为个体实现全面发展提供了潜在可能性。然而, 这一充满解放潜力的技术进程, 在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合谋下, 并未引导劳动摆脱自资本时代以来的异化状态, 反而在新型数字化秩序中衍生出深层的控制形态与支配关系, 为人类社会带来不容忽视的文明挑战。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 辩证地吸收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劳动价值论的合理内核, 提出异化劳动理论。该理论指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呈现出四重异化状态: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

劳动活动、类本质相异化, 并最终导致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类的扭曲与压迫, 强调劳动应作为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sup>[1]162</sup>。在数字时代, 数字技术所催生的数字劳动虽是现代社会中最具创造性的劳动形式, 但其并未使人类摆脱异化的桎梏。资本与技术理性的深度共谋, 使当代的数字劳动异化呈现出新的面貌: 数据私有化使劳动者无法占有自身所生产的数据产品, 算法深度介入并规训劳动过程, 人类的劳动与生活被双重碎片化, 平台的操控与中介使得剥削关系隐匿化、劳动者间恶性竞争加剧。当下, “平台—算法—数据”的“三位一体”结构, 成为数字时代资本组织生产、榨取剩余价值的核心机制。

## 一、劳动产品的异化: 数据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劳动产品的异化中阐明: “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sup>[1]157</sup> 在工业时代的雇佣劳动关系中, 工人

**作者简介:** 刘姿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

生产的劳动产品对他来说是一个“异己的对象”。一方面，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被资本家占有，工人创造的价值反而成为支配其自身的力量；另一方面，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就越成为资本宰制下的附庸，越成为异己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sup>[1]157</sup>

进入数字时代，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数字资本的驱动下呈现出新的尖锐形态。在数字劳动体系中，关键产品不再是工业时代的实体商品，而是数据。蓝江教授指出：“数字劳动和数字生产方式所依赖的生产资料就是一般数据，手机和电脑不过是这个巨大生产资料的接口。”<sup>[2]</sup>用户的行为轨迹、社交内容、消费偏好，零工劳动者的地理轨迹、绩效记录，工程师开发的算法代码、数字工具……这些数据成为数字时代凝结了抽象人类劳动的核心价值载体和关键生产要素。当下，尽管用户生成的某些内容（如短视频）仍涉及版权归属问题，但总体上，具有明确版权属性的数字资源占比正逐渐降低。相反，大量用户作为新型劳动者——数字“产—消者”，即一方面用户以消费者的身份享受平台提供的服务，另一方面又沦为无偿的数据生产者，他们在日常活动中产生的、未被明确赋予版权保护的数据轨迹正成为资本持续挖掘和占有的资源。与工业时代工人无法占有其生产的物质商品相类似，在数字劳动过程中，用户和劳动者对其创造的“数据产品”同样丧失了基本的掌控权、所有权与收益权。这是平台资本将数据私有化的必然结果。

数据私有化构成了数字时代劳动产品异化的基础。平台资本通过其制定的用户协议，将广大用户和劳动者在平台活动中产生的各类数据，单方面侵占并转化为自身私有财产，最终为其实施剥削与垄断创造便利条件。用户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

电子商务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浏览、评论、分享，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其产品便是关于其自身兴趣、关系、行为的丰富数据。然而，这些数据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并被整合、分析、加工为可用于精准广告投放、用户画像构建、算法优化的垄断性生产资料。用户创造的“数据商品”非但不为其所有和所用，反而异化为支配其自身的力量：平台利用这些数据训练出的算法，能够更精准地预测和引导用户行为，通过“信息茧房”、成瘾设计等手段，将用户更深地纳入平台的资本增值循环，形成“数字劳动者—数据产品—数据资本—支配数字劳动者”的新型异化循环。用户贡献的数据越多，平台算法对用户的操控力就越强。

除了数字用户的免费劳动，零工劳动者以及数字工程师亦无法超出数据私有化的宰制，其创造的数据资源不但无法归其所有，更进一步成为规训其劳动活动的有力工具。以外卖骑手这一零工劳动群体为例，他们于劳动过程中创造的实时轨迹数据、接单热力图、用户评价反馈等，本是其劳动过程的具体结晶。然而，在数据私有化的情况下，这些由劳动者生成的行为数据被平台资本占有、汇聚、分析后转化为优化算法的核心生产资料。结果是，骑手创造的轨迹数据非但不能为其所用，反而异化为压迫自身的工具——更短的配送时限、更严苛的路线规划、更激烈的内部竞争。再看数字工程师群体，他们生产着数字时代最核心的工具与系统——算法模型、管理软件、监控平台等，但这些技术产品并不归其所有并为其服务，而常被用于监控、管理和规训包括工程师自身在内的劳动者群体。

在数字时代，数据的私人占有导致劳动者与自身劳动成果的根本性疏离——劳动产品的异化表现为“数据异化”。数据不仅成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新源泉，更异化为一种强大的、无形的支配性力量，反向操控着数据生产者的行为、认知乃至生存状态。

## 二、劳动活动的异化：算法规训下的主体性危机

马克思在《手稿》中进一步揭示了劳动活动的异化，他指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sup>[1]159</sup> 异化劳动使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sup>[1]159</sup>。马克思强调，异化不仅在于劳动者与产品的疏离，更深刻地渗透到劳动活动本身，剥夺了劳动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使其成为一种强制性活动。在算法规训下的数字劳动场域中，马克思的这一洞见表现得更复杂和隐蔽。

算法作为资本权力的技术代理，其核心功能在于建构一个高度精密的数字化规训机制。这一机制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实时采集、处理与模型优化，实现对劳动过程、劳动节奏乃至劳动者决策的深度操控。其实质在于将资本意志编码为不容置疑的算法指令，并通过持续的评估奖惩，内化为劳动者的行为准则，最终使劳动者被深度束缚于一个由算法指令支配的自动化规训体制中。在马克思的哲学视域下，人的主体性并非先验存在，而是一个在劳动实践中逐步确立并动态发展的过程。劳动本应作为劳动者以智力为主导的主体性活动——劳动者将既往积累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劳动实践的具体方法，同时与实践过程中反哺认知，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完善技能应用能力。这是一个双向互动、不断进步的过程。然而，在数字资本的驱动下，劳动的这一自主演进过程被算法的操控机制逐步取代。劳动者的自主意识、决策与评估能力遭遇技术性丧失的风险。

在算法主导的劳动规训体系中，零工劳动者处于主体性丧失的最前沿。他们深陷“泛雇佣劳动关系”的剥削场域：资本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由传统的劳动合同与长期雇佣关系转变为通过算法派单、劳动者接单完成任务后获取报酬的即时性交易模式。

在此模式下，零工劳动者很难享有传统劳动者所具有的社会保障、劳动保护等权益，其劳动时间与工作强度被无限延长与放大。北京大学陈龙团队围绕外卖骑手的实证研究，用具体数据揭示出算法压迫对这类群体造成的显著危害：“平台通过算法不断压缩配送时间，骑手需通过逆行、闯红灯等违规行为满足时效要求……算法时间每缩短10%，骑手交通违规行为发生率提高约15%-18%。”<sup>[3]</sup>这种以效率为唯一导向的算法设计，将零工劳动者的身体推向生理极限，并在精神层面造成深度消耗，使他们难以实现对自身劳动能力的价值认同并产生自我满足感。零工劳动者在平台算法的系统性支配下，主体性与自主选择权被大幅消解，逐渐异化为被动执行指令的“工具”。

数字工程师群体同样未能脱离劳动活动的异化。他们本应作为数字文明的构建者，却在资本逻辑的深度裹挟中经历创造力的自我背叛与扭曲，屈从于资本增值的需求。他们在设计推荐算法时被迫嵌入成瘾机制，开发生产效率系统时不得不强化监控模块。其构建的智能系统将人异化为算法的训练数据，将技术理性扭曲为服务于资本扩张的工具。工程师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被异化成了建构更高效的剥削手段的环节。

用户的免费劳动成为最典型的代表。一方面，数字资本模糊了劳动与休闲的边界，将广大用户的休闲时间也纳入剥削体系，使其陷入完全的无偿劳动状态；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对用户的剥削机制更为隐蔽与精密——用户往往在无意识状态下陷入由算法精准构建的数字陷阱。平台资本通过对用户产生的大量数据的操控与算法分析，使用户被纳入平台算法预先为其“量身定制”的框架之中。数字资本不断地将用户的休闲时间商品化，这种新型剥削方式印证了尤里安·库克里奇（Julian Kücklich）的“玩工（playbour）”理论：“玩工”是“自愿的、无偿的、娱乐的，且受到剥削的”，它难以被

归属进传统的工作或休闲的范畴。<sup>[4]</sup>在这一模式下，“玩工”劳动者常处于一种无意识甚至自愿接受剥削的异化状态——当劳动被娱乐的外衣所遮蔽，主体便在愉悦的体验中无意识地完成了自我异化。用户的主体性，包括自主意识、反思能力以及对休闲时间的掌控等被持续消解。

### 三、类本质的异化：数字生存的碎片化陷阱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应体现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人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实现个体与类相统一的根本方式。然而，资本主义大工业下的异化劳动扭曲了这一本质——劳动产品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必然导致类本质的异化。他痛陈：“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sup>[1]161-162</sup>本应作为目的本身的“类生活”被贬低为维持肉体生存的纯粹手段，个体的真实诉求被抽象形式所遮蔽。

在数字时代，“碎片化生存”成为“技术—资本”合谋下类本质异化的新形态。它通过加速拆解劳动与生活的整体性，将人类存在全方位转化为资本积累与增值的数据场域。一方面，数字劳动者面临劳动的碎片化——平台资本及其背后的算法机制为节省成本将完整的劳动过程不断细分，延续并加剧着福特时代以来的机械化生产并将其推向极致，“产业后备军”群体数量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数字资本的触角伸向了日常生活领域，导致人们生活的碎片化——无限下滑界面、算法推荐机制与即时反馈回路，将时间切割为离散的注意力片段，人类深度思考的能力让位于即时的快感需求。

在劳动与生活双重碎片化的生存机制下，人的类本质经历着深刻的解构与异化。数字劳动者从完整的劳动流程中抽离出来，不断重复着简单化、机械化的操作。这种劳动过程并非对其类本质——自由自觉活动的确证，而是让人们在机械循环中感到

极度枯燥与倦怠。数字技术的资本化运用片面追求资本增值的最大化，其大大加剧了劳动的碎片化程度，由此进一步强化劳动降级的趋势与劳动者能力的退化。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数字智能加紧对人类智能的多方位取代，数字技术对劳动完整性的“裁剪”使人类劳动者被迫降格为无稳定雇佣关系的、低技能的且随时可被替换的“原子化零件”。在有酬劳动之外的生活领域，人们的深度体验正被社交媒体等技术拆解为碎片化的生存样态——新闻成了标题党短讯，知识成了三分钟干货视频，情感交流退化为表情包互动……这种持续加速、浅表化的信息接触方式，使越来越多人逐渐丧失对生活完整脉络的感知能力，也削弱了其专注力以及共情力，完整的、深层次的生活体验被切割为日益分散的注意力碎片。劳动与生活的双重碎片化不仅造成身体上的倦怠，更导致了斯蒂格勒所说的心灵世界的“无产阶级化”——人的感知、记忆、情感与知识在数字化生存中逐渐被剥夺、垄断与外在化，人们被迫沦为受资本逻辑支配、遭遇虚假景观渗透、逐渐丧失思考能力的“空心人”<sup>[5]</sup>。在工业资本时代，对劳动者的剥削更多地体现为在物质层面剥夺其生产资料，从而使其沦为无产阶级；而在当下，越来越多的人在认知、情感与批判性思维层面，同样被剥夺了深度参与和主动创造的可能性，人类正遭遇“心灵无产阶级化”的困境。

### 四、人际关系的异化：平台操控下的物化结构

马克思在《手稿》中揭示，前三重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与人相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sup>[1]165</sup>在工业化大生产下，这种异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异化为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对立；二是工人之间为谋生而异化为彼此疏离乃至敌对的竞争关系。前者是当时社会人际关系中更尖锐的核心冲突，后者则存在通过劳动者联合协作而实现缓解的可能性——

当工人以组织化的形式凝聚力量时，个体间的竞争张力能够转化为集体博弈。但在数字时代，劳资关系的尖锐矛盾常被平台以技术中立的形式所掩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则在平台的操控下变得更加尖锐，致使他们的联合协作及群体认同感构建面临显著挑战。

在数字劳动场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平台似乎以技术中立的形象代替了传统雇主的角色，负责决策、发布任务乃至实施后期的奖惩措施，并在大众认知中构筑起“技术治理”的表象——平台营造出一种其规制是中立的、高效的、为共同利益服务的假象，从而使其权力和控制合法化。然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资本控制的手段：资本家藏身于平台之后，利用技术的权威性来解除劳动者的反抗权，实现对劳动更隐蔽、更高效的剥削。这种新型剥削范式导致了一种更为深刻的物化困境：数字劳动者失去了传统雇佣关系中具体的博弈对象，不能与具象的资本家协商权益，他们面对的是被资本意志深度编码的物化平台系统。当数字劳动者使用平台时，便不得不遵循平台算法设定的劳动流程、绩效标准与规则迭代，让渡自身的各项权利。相较于传统雇佣关系，数字劳动的剥削机制更具隐蔽性与强制性：劳动者不仅难以识别剥削主体，更因平台构建的分散化、个体化劳动场景，丧失了集体抗争的组织基础，致使权益诉求难以形成合力。在此过程中，传统“雇主—雇员”间的人际互动，被平台的中介技术所物化，劳动主体成为被动的执行者。

剥削的隐匿性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残酷竞争。资本通过平台架构的物化机制，将生存压力转嫁至数字劳动者，使其深陷“内卷”与“自我剥削”的泥潭。当代劳动者普遍陷入“主体性过剩”的悖论：“为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劳动者总需付出‘超额劳动’，其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就是‘剩余劳动’；劳动者的内部竞争，让‘剩余劳动’像资本增值一样进入无止境的‘扩大再生产’。”<sup>[6]</sup>在数字劳动

场景中，劳动者虽不再像传统工人那样直接受制于雇主的现场监督，却呈现出高度的“主体性”——竭力从日益稀缺的资源中攫取更多份额，并在相互竞争中无意识地延长劳动时间。剥削隐匿性导致的“主体性过剩”与算法规训下的“主体性危机”，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共同呈现出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双重面向。前者指向平台经济下劳动者之间的疏离与恶性竞争，展现为一种被资本逻辑扭曲的“伪主体性”；后者则揭示技术在治理过程中对劳动者判断力与自主性的消解，导致其陷入无力感与意义匮乏的窘境。更具一般意义的现象是，如今大数据通过平台背后的算法机制对个体进行精神操控，能够对个体在前反思层面施加影响，使个体倾向于自我监测和自我控制，从而提高资本对人的控制效率。正如韩炳哲指出的：“现在，就连自由意志本身也被操控了。大数据是十分有效的精神政治的工具，它可以全面地获知关于社会交际的动态。这种认识是一种统治认知，可以介入人的精神，对精神在前反思层面施加影响。”<sup>[7]</sup>

## 五、数字劳动异化的扬弃路径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数字劳动的异化及其衍生危害已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时代命题。这一议题不仅关涉技术发展路径的选择，更触及劳动本质、人的主体性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各界人士正从不同视角展开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并尝试结合各国发展实际回应数字资本所造成的分化、剥削与操控，探索超越纯资本逻辑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数字化建设致力于探索一条以人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其核心要义在于推动数字技术与“人本逻辑”深度耦合，从而突破“资本逻辑”的桎梏，为构建真正共建、共享、共治的新型数字化劳动关系提供一种可能的实践方向。

（一）推进数据共享，构建新型数字劳动关系  
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平台资本对数据这

一核心生产要素的私有化。亿万用户与数字劳动者在日常交互与劳动中源源不断地创造着数据，然而这些数据资源却被资本平台所攫取。数据私有制致使数据生产者与其劳动成果——数据，被强制性分离，数据不仅无法帮助劳动者提升福祉，反而异化为平台资本强化控制、加剧剥削的工具。因此，破除数据垄断、构建以普惠共享为导向的数据治理新体系，是构筑新型数字劳动关系、实现劳动价值回归的关键路径。

数据共享的核心目标在于：约束平台资本的数据垄断权力，拓展数据要素的多主体普惠流通渠道，提升数据价值的集体治理与合理分配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数字生产力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sup>[8]</sup>。我们应在大力发展数字技术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与政策监管，防范其可能带来的新型剥削与不公，推动技术发展真正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和劳动者的解放。

从全球的立法实践来看，欧盟与美国在数据立法方面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欧盟2018年通过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被视为全球数据保护的典范，其核心理念是将个人信息权视为一项基本人权，并严格限制数据的营利意图，同时将数据的知情权、访问权、删除权都返还于数据主体，由其自行决定。美国则更倾向于以市场为主导、以行业自律为基础来推动数据保护，其在医疗、金融等特定领域通过立法推动有限度的数据开放，例如医疗方面的《健康保险携带和责任法案》（HIPAA）和金融领域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LBA）均成为美国推动数据立法、约束行业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代表性法案。在国际规则与国内需求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初步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为三大

基石的顶层法律框架，并辅之以大量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这些法律法规旨在推进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和使用规范，鼓励将政府数据、企业数据与社会数据进行共享与开发应用。当前，我国正致力于保障广大网民与用户群体的隐私安全，探索符合国情的数据要素市场化路径。

在社会应用层面，为有效推动数据资源的社会化共享，可借鉴维基百科的协同生产模式：其内容由全体用户协同创造，数据所有权归属于非营利的维基媒体基金会，并向公众开放服务。这一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知识生产者的主体性，构建了一种非剥削性的数字劳动机制。同时，还可推广数据信托机制，即在教育、医疗等关键公共领域建立多方参与、受托管理的数据治理架构，确保数据使用符合预先设定的公益目标，防范私人利益对公共数据的侵占。英国的数据信托模式严格基于传统信托法，强调受托人负有法律上的“信义义务”；美国则更侧重其治理功能，不严格依赖信托法，但核心仍是代表集体利益管理数据并履行信义责任。“数据合作社”的模式也提供了有益借鉴。该模式源自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的理念，主张由劳动者集体拥有和管理数据平台，对抗“监视资本主义”下的数据剥削。这一管理理念认为通过特定行业劳动者联合管理匿名化或聚合后的数据，可用于制定更公平的行业标准、发展互助保障机制，从而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和权益保障。

（二）构建数字技术伦理体系，引导数字技术的人本化发展

数字劳动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资本逻辑对数字技术的裹挟，由此伴生出算法偏见、数据隐私侵犯、社会公平受损等一系列复杂伦理挑战。要突破这种技术异化的困境，必须积极推动数字技术伦理体系的构建，引导其回归人本逻辑的轨道，确保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尊严、权利与福祉。

数字技术伦理体系应以人的尊严、权利与福祉

为核心价值导向，从研发阶段的伦理价值嵌入、应用过程中的人机关系调控、违规行为后的责任追溯三个维度系统建立。张凌寒教授指出：“算法治理应以算法和用户交互过程为轴，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维度对算法技术进行全链路治理、全方位规制。”<sup>[9]</sup>技术伦理体系的建立亦应遵循此逻辑：首先，在研发阶段，必须前瞻性地将伦理价值与规范深度嵌入技术创新的全过程，构建系统性伦理规范框架。通过确立透明性、公平性、可问责性、非歧视、隐私保护、人类监督等基本原则，为技术开发者、应用者设定“伦理红线”，防范技术异化。其次，在应用过程中，确保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人而非支配人，保护劳动者的主体性、自主权免受侵害。一方面，需要明确界定人机权责边界，确保关键决策的最终控制权与解释权掌握在人类手中，通过技术透明化设计打破“算法黑箱”对认知的遮蔽，确保数字技术始终作为辅助决策的工具而非主导者；另一方面，应建立动态伦理监测与响应机制，从社会公平、个体尊严、心理健康等维度构建伦理评估体系，通过实时反馈机制实现技术应用的弹性调整，对潜在风险及时进行补救。最后，面对违规行为，确保责任追溯清晰、明确且能有效展开。确立精准的责任认定规则，清晰界定研发者、部署者、使用者等不同主体的角色与义务范围，是杜绝权责不清、防范主体间相互推诿的基础。同时，需同步健全受损害个体的维权保障机制，通过完善维权渠道与执行细则保障劳动者各项权益准确落实。

### （三）重塑劳动者的主体性，激活劳动关系变革的内生动力

当前，数字劳动者被束缚于数字资本的意识形态中，无意识地消耗自身的劳动时间、休闲时间乃至全部生命时间为资本增值服务。打破这一困境的重要步骤，是让劳动者清晰认识到数字资本运作的剥削本质与异化机制——他们创造的数据价值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并异化为规训其自身的工具；

算法控制剥夺其劳动过程的自主权与创造性；碎片化生存侵蚀其作为“类存在物”实现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平台的物化结构遮蔽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往，转移了劳资矛盾并使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加剧。对数字资本认知上的“祛魅”，彻底透视其剥削本质，是重塑劳动者主体批判意识和集体认同感的基础。张龙指出：“张扬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意识是实现数字劳动正义的根本。在数字化的世界中，个体和集体对自身价值和权益的认识至关重要。数字劳动者应当充分意识到自身工作对数字经济的价值所在，这一觉醒有助于他们更积极地争取自己的权益。”<sup>[10]</sup>

推动劳动者主体性与内生动力的建设与发展，一方面需要广大学者、行业领军人物、政府主管部门等社会各界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深刻揭示与反思，从而在公共政策层面实现对数字劳动者的全面保护；另一方面，也需要推动教育体系与职业结构的适应性转型，培育能够主动驾驭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当前，教育模式和职业架构严重滞后于数字技术的飞速演进，加剧了劳动者的技能焦虑、身份迷失与主体性脆弱。要破解这一困局，亟须实现从教育理念到职业体系的系统性升级，培育具有批判力、适应力和主导力的数字公民。在教育层面，应大力推进跨学科融合教育，并积极推行“数字韧性教育”——即个体在数字环境中应对危机、适应变革、保持稳态，并在与技术互动中实现价值重建的综合能力。<sup>[11]</sup>同时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帮助劳动者在技术快速迭代的困境中始终保持适应性与主动性。在职业体系建设方面，应以前瞻性视野构建既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又能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新型职业生态。这包括：加快对新兴数字职业的认定与规范，确立清晰的职业标准、发展通道和社会保障机制；推动传统职业在数字化赋能中实现功能升级与价值提升，而非被简单替代；利用数字技术搭建更灵活、更赋能、更具互助性的职业成长平台，使

劳动者能够在技术变迁中掌握和发挥主动权。

### 结语

数字化时代，在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深度合谋下，劳动产品异化为数据私有化的垄断工具，劳动活动面临算法规训下的主体性丧失危机，类本质遭遇生存碎片化的解构危机，人际关系深陷平台操控的物化结构。这种新型异化形态，作为资本私有化在数字时代的必然延伸，因其隐蔽性、渗透性与系统性，对劳动者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异化的深化本身也孕育着扬弃的可能。数字技术的双重性——既可为资本增值服务，亦蕴含推动人类解放、实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潜能，体现出其超越异化的内在动力。数据共享、技术伦理建构与劳动者主体性重塑三重路径的协同，为数字劳动扬弃异化状态提供了可能性。其核心在于打破资本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垄断以及对数字技术的单向控制，使数字技术复归为人服务的本质属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数字劳动的扬弃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社会主义制度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与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有效规制，为调和数字技术与人本价值提供了制度保障。我们亟须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象化为数字时代的劳动实践，推动劳动从“异化的枷锁”向“自由自觉的活动”跃迁。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人的解放”命题的当代回应，更是构建以人为本数字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蓝江：如何思考数字资本主义？——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下的哲学反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307.
- [3] 陈龙.“数字控制”下的劳动秩序——外卖骑手的劳动控制研究[J].社会学研究，2020(6)：113-135+244.
- [4] 尤里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J].开放时代，2018(6)：196-206.
- [5] 张一兵.心灵无产阶级化及其解放途径——斯蒂格勒对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的批判[J].探索与争鸣，2018(1)：4-13+1+141.
- [6] 夏莹，牛子牛.主体性过剩：当代新资本形态的结构特征[J].探索与争鸣，2021(9)：148-158+180.
- [7]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16.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208.
- [9] 陈增宝，张凌寒.算法技术的法律规制：治理困境、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J].中国应用法学，2024(4)：155-166.
- [10] 张龙.数字正义、算法伦理与美好生活：“数字中国”建设的逻辑体系[J].湖南社会科学，2024(5)：23-30.
- [11] 李琳琳，张务农，范晓伟.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大学生数字韧性培育的认知重塑与路径探析[J].北京教育(高教)，2025(4)：35-38.

责任编辑：郑梅钦

# 自由时间与精神解放：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资本逻辑批判与超越

李青宇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马克思提出的“自由时间”不仅指向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更揭示了人类精神解放的本质要求。资本逻辑通过异化劳动与商品拜物教，将人的精神生活压缩为消费主义的附庸。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自由时间的解放为基础，重构人的精神自主性与创造性，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时间批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调通过制度创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打破资本逻辑对精神生活的控制，重建个体与集体的精神自主性与创造性，进而积极探索在中国语境下实现时间解放与精神富裕的现实路径。

**关键词：**自由时间；资本逻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B03;A81;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072(2026)01-039-08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好生活的实现不仅要求物质上的满足，更需要精神和文化上的充实。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出了保障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要求。<sup>[1]505</sup>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新时代的战略任务，既是马克思主义打破资本逻辑下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理论在当代的制度性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深化。目前，学界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探讨较多，但主要围绕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精神生产等展开。从时间角度分析精神生活的实现以及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当代人

时间使用上的导向作用等研究不多。

马克思提出“时间即人的发展空间”这一命题，从时间维度揭示了资本逻辑通过异化劳动对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进行侵占并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精神生活的危机。<sup>[2]29</sup>受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等错误思潮影响，当前人们精神生活呈现商品化与碎片化的特点，存在一定程度的个人精神贫困与社会公共精神虚无。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超越资本逻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 一、自由时间的精神解放意蕴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理论基石对自由时间进行了科学阐释。马克思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着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分配，工人劳动

**作者简介：**李青宇，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时间异化、自由时间也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导致工人的精神生活贫困。精神解放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在于摆脱外在束缚，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时间的增加是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自由时间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艺术、社交等精神活动，不断拓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实现精神解放。

### （一）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

马克思虽然从未明确提出“自由时间”这一概念，但是从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人的时间进行了“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划分。劳动时间是指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自由时间则是指人们在劳动之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被迫将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工人的劳动时间被资本家支配。在劳动时间里，工人失去了对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控制权，劳动变成了单纯的谋生手段，而非自我实现的途径，因此劳动异化、劳动时间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时间是“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sup>[3]306</sup>。总之，在自由时间中，工人可以自主地安排自己的活动。既可以用这段时间休息和恢复体力，也可以用这段时间学习新知识、培养兴趣爱好、参与社会活动等，从而实现精神生活丰富和自身的全面发展。自由时间是工人实现自我价值和追求幸福生活的重要条件。

马克思认为，只有充分享受自由时间，工人才能摆脱资本逻辑的束缚，实现自我价值和个性的自由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实际上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因为劳动不再是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的活动，而是实现人的本质的自觉自由的活动，所以在劳动时间中人们也是在发展自己

的个性、实现自己的本质。如马克思所言，早上打猎、下午放牧、晚上从事批判的生活就是一种人们充分享有自由时间的生活状态。

### （二）自由时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的关键环节

纵观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过程，“时间”一直具有重要地位。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有他对感性时间的认识。当批判对象从先验的哲学世界转向历史的、现实的世俗世界后，马克思更加重视“时间”的意义。他不是从物理学意义上研究“时间”，而是从社会的、历史的意义上来研究“时间”。时间是人存在的重要维度之一，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sup>[2]161</sup>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时，发现“劳动”无法量化，需要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作日被分割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前者是工人生产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时间，后者是工人无偿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时间由此成为剥削的尺度。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获取更多绝对剩余价值，或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来获取更多相对剩余价值。一天的时间是固定的，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延长意味着自由时间被侵占，工人不仅失去了时间使用的自主性，还丧失了“时间”作为生命体验的本质意义。由此可见，自由时间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维度，自由时间的多少体现着人的解放程度。

### （三）自由时间有助于人的精神解放

第一，自由时间有助于消解劳动异化，使人重新获得自主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大幅度压缩必要劳动时间，即缩短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耗费的劳动时间，因此劳动者的自由时间相应增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sup>[3]269</sup>此处的“时间”指

的就是用于实现个人发展的自由时间。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虽然极大地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却没有相应增加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增加的是剩余劳动时间。消解劳动异化需要增加自由时间，支配和享受自由时间不仅仅是劳动者获得了劳动之外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增加了体会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满足自身发展的时间。

第二，自由时间有助于人们展开创造性活动。

“一个民族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的奴仆。”<sup>[4]125</sup>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人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后会追求精神生活，充分的自由时间能够为艺术、科学等精神生产提供空间。自由时间的扩展为人类提供了摆脱工具化劳动的空间——时间不再是资本规训下的计量单位，而是回归主体性的维度。在自由时间中，个人不再被束缚于重复性劳动，而是进行自觉自由的活动，除了生产活动之外还可以通过艺术创作、知识探索、社会交往等非功利性活动重新建立对自身的掌控权，发展自己的个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精神生产在物的商品属性方面被加以放大，导致精神生产只关注其带来的剩余价值，而文明属性的一面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sup>[5]</sup>。这不仅违背了精神产品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初衷，也无益于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因此，只有扬弃资本逻辑，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才能不被逐利目的所局限，才能真正发挥出个人的创造才能。

第三，自由时间有利于人们进行社会交往，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4]505</sup>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都产生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中，这就需要人有充足的自由时间来进行多样的实践活动，以此来丰富和拓宽人的本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使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sup>[4]403</sup>。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异化劳动所依托的私有制与雇佣关系失去了存在根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人相异化的状况也将不复存在，人们充分享有自由时间。因此，自由时间的实现以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人与人通过共同劳动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人们通过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丰富人的本质、促进社会和谐。

##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间尺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一重要论断：“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sup>[1]501</sup>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探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时，时间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时间作为人存在和发展的尺度为精神生活的展开提供了基础。

### （一）自由时间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前提

自由时间是精神发展的基础，其深层内涵在于，只有社会整体通过生产力的提升与制度的深刻变革，压缩了束缚个体的必要劳动时间，人们才能真正挣脱为谋生进行劳动的沉重枷锁，赢得“个人自由发展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精神发展被压缩至生存需求的缝隙之间，只有实现时间的占有者的主体转变，劳动者才能从“工具性存在”升华成“目的性存在”。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sup>[6]</sup>生产力的飞跃是压缩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前提，例如自动化生产线将传统制造业工人的单件生产时间从数小时缩短至几分钟。但技术进步本身并不必然带来自由时间的增长，还需要制度层面的深刻变革作为保障。

通过社会制度对资本逻辑进行制衡，才能真正将科技红利转化为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这种转化不仅是时间量的重新分配，更是人类存在方式的根本性飞跃，劳动者得以挣脱物质匮乏的桎梏，将时间投入到艺术创作、科学探索、哲学思考等精神生产领域。这种“个体自由发展时间”的积累，不仅有助于塑造个体丰富的精神世界，更能推动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时间被异化为服从资本增殖逻辑的商品。社会主义制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从制度层面破除资本对时间与精神资源的双重垄断。通过法定工时制度，保障劳动者自由支配时间；依托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普惠性精神文化供给机制，实现艺术鉴赏、文化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配置。这些制度创新通过优化劳动时间结构、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将知识、艺术等精神资源转化为全民共享的公共财富，推动马克思时间解放到精神解放思想的现实转化。

### （二）劳动时间的不断缩短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体现

精神生活从本质上来说不能脱离物质生活，物质资料的充足是精神生活富裕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劳动将是科学知识的直接应用，科学将变成直接生产力。”<sup>[7]</sup>自由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而人的发展水平提升又会反作用于生产领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劳动时间的缩短。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社会财富也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此时人们用于生产满足自身物质需求的劳动时间越来越短，有了更多接受教育、发展智力、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人的解放体现在拥有充分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个性，追求更高水平的精神满足。所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证实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另一方面又以人

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提升，解放出更多劳动时间。

### （三）精神共同富裕催生“时间使用的伦理自觉”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动自由时间从娱乐消遣转向自我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化往往带来的是物质上的充足和精神上的空虚，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创造出各种虚假的需求，隐秘地侵蚀着劳动者的自由时间。人们在劳动时间之余通过购物、消费等对物的占有行为来满足精神需求，实际上是在为资本主义生产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使得自己的自由时间重新成为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资本逻辑下精神生产的产品也始终体现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虚无的娱乐和消遣中个人也并没有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精神解放。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包括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增强人的精神素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等，“追求生活目的的完善，不仅求知而且求美求善”<sup>[8]</sup>，将自由时间投入学习、阅读、艺术欣赏等能够充分享受社会精神文明优秀产品和实现自我发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包括个体的精神丰盈，也涵盖社会公共精神的构建，将“小我”和“大我”联结起来，使自由时间不仅是个人发展的空间，更是社会精神财富共创共享的纽带。这种双重维度的精神建构，既彰显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又体现个体的精神成长与社会进步的同频共振。

### 三、自由时间与精神解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资本逻辑批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但其资本逻辑等内在缺陷已经广泛影响社会各个领域，对个人和社会整体的精神生活产生了严重冲击。

#### （一）资本逻辑导致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异化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掌握着生产资料，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实际上就是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时间因此被纳入资本的循环。随着劳动者的具体劳

动时间被纳入生产过程，它开始具有社会性质，成为社会总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这一转化过程的关键在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时间被物化到商品中，成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当这些商品进入市场并被销售时，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时间通过商品交换转化为社会认可的劳动时间，即抽象时间。这个过程中，商品的价值不再由劳动者个人劳动的具体情况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即在现有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生产同类商品所需的平均劳动时间。资本逻辑通过这种转化，将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时间抽象化，使其成为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换的价值。这种抽象化的过程使得劳动时间失去了其具体性，转而成为资本周转和积累的一般等价物。“社会时间原本作为实现人的本质的一种积极存在，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为‘规训’人的手段。”<sup>[9]</sup>

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问题进行过详细论述：“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sup>[416]</sup>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的时间就是如此，劳动者始终感到自身的技能和创造力被边缘化，个人时间被外部力量所控制和消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主体性丧失，所进行的生产活动是一种对人的精神和肉体双重摧残的异化劳动，并且在资本权力支配下劳动者个人的自由时间被无限压榨，生命时间变成了为资本主义服务的生产时间。

### （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制造虚假的精神满足

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繁荣的商业景象，人们不断追求更为丰富、更为精致的商品和生活，迷恋于如本雅明所说的“拱廊街”这样华美的商品堆积。<sup>[10]</sup>尽管社会生产力发展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法律的保障下人们也得到了相对稳定的自由时间，但自由时间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影响下被隐秘地侵蚀。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常常用于消费行

为，人们产生了很多“虚假的需要”，他们的生活目标被物化。弗洛姆指出：“今天的人成为了消费狂，购买和消费的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被迫的、非理性的目标，因为消费就是目标，而不是人们从这些物品中获得使用价值和快乐。”<sup>[11]</sup>自由时间仍然是劳动时间的延续。

资本主义的精神生产体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精神产品的数量多并不意味着质量高。出于逐利的目的，资本逻辑侵入精神文化领域，各类文化载体在物化价值的规训下，日益呈现出功利化倾向，资本用“商品化”的模子，把艺术创作、政治理念甚至学术研究都套进同一个框架——所有东西都被标上价格，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例如艺术品本来所具有的独特性被批量生产的模式打破，“艺术复制品大量涌入社会，艺术作品为大众普遍占有，这造成了大众对艺术作品的快速的一致化的审美趋同”<sup>[12]</sup>，这也意味着艺术品原本最独特的、能引起人共鸣的东西消散了，变成了没有创造性的一般产品。人们在自由时间中仍然被资本逻辑控制，不自觉地接受这些无意义的精神产品。

### （三）资本逻辑最终引起精神生活的危机

第一，个人在资本逻辑操控下容易陷入精神生活的虚无状态。资本逻辑如同无形的巨网笼罩着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下，商品、广告、流量等一套精密系统把所有人的生活悄然裹挟其中。资本构建出虚假的文化盛况，但这繁荣背后藏着冰冷的算计：新的潮流层出不穷，看似提供给了人们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实则是资本在批量制造欲望。许多人每天被工作挤压得喘不过气，下班后只想通过电子设备或者消费行为获得休息，依靠短暂的感官刺激或者消费等方式来获得满足感，这些行为往往给人带来更大的空虚感，也让人感到失去了对时间的控制。数字技术在虚拟的空间中扩大了个人的焦虑、孤独等情绪，使个体的情感需求、文化认同乃至存在焦虑，都被精准映射为消费需求

中的坐标点。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陷入了资本创造的文化牢笼，被劣质的精神文化产品麻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对积极的文化产品的需求逐渐丧失，也慢慢放弃了对美好理想的追求。

第二，资本逻辑下社会精神贫富差距加剧。除了在物质生产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之外，资本逻辑的触角也深入到了精神文化的生产领域。真正的精神财富，诸如独立思考的能力、创造和欣赏美的能力等，正逐渐从普通人身上被剥离。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就如同稀有的矿产资源一样，被极少数掌握大量资本的资本家们所把控。这些资本家通过多种手段，如赞助各种艺术展览、投资私立教育机构，甚至利用其掌控的媒体资源来塑造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从而在精神文化领域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文化壁垒。这种由资本主导的文化体系正在隐秘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使人们逐渐失去辨别自身真实需求的能力。

在资本压榨下，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被极大剥削，同时资本以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占据其自由时间。这种双重压迫使劳动者既缺时间又缺精力追求和享受美好精神生活，并且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遮蔽下，难以看清精神生活贫瘠的真正原因，从而陷入精神困境。

#### 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资本逻辑超越

实现人民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彻底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主导的精神发展路径，从根本上规避了资本逻辑下个人与社会的精神生活危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通过制度创新和价值引领，可以逐步消除资本逻辑对时间的异化，使自由时间真正成为人们精神解放的源泉。

(一)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践根基在于科技

创新促进社会生产率的跃升。马克思说：“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sup>[4]527</sup> 只有通过技术革命对劳动过程重构，才能实现人的自由时间解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技术革命对劳动过程重构不仅体现为生产力提高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体现为智能化、数字化替代重复性脑力劳动，为人们赢得精神发展的时空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牢牢把创新自主权、发展自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实现了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科技驱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变革，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赋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以提升。

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技术、智能化系统和设备的应用，社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人们可以更快速完成工作，节省出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充分享受自由时间的人们又以个性、创造力的发展反过来促进科技的进步。新质生产力在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条件，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促进数字化平台、共享经济的兴起，在节约资源、时间成本的同时为优质精神文化产品的孕育提供新的养分。新质生产力还让我们实现了文化普惠，例如建设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开放数字图书馆、在线课程等资源，突破时空的限制，使偏远地区的人也可以获取优质精神产品。

(二) 以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实现从物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蕴含人人平等的伦理价值，要让全体人民在精神生活领域共同提升，制度层面的公平正义是必要支撑。马克思认为，实现自由时间最大化需要通过社会制度变革来保障，因为在资本逻辑下社会是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人们精神生活参与机会和体验差异巨大。恩格斯曾这样畅想未来的社会制度：“在

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sup>[13]</sup>因此，为了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推翻资本逻辑对人的桎梏，确保每个人都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精神生活领域中践行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体现。中国共产党摒弃资本主义一味追求金钱、将人物化为生产物质利益的工具的逻辑，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例如，教育是提升个人精神素质、丰富精神生活的重要途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资源往往被少数人所垄断，导致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我国打破了这种教育不平等的现象，通过义务教育等方式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从而拓宽自己的发展空间、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精神文明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不仅让人们共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果，还提倡发挥人民的能动性，将人们从消费客体转变为参与精神文化生产创造的主体，通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使精神财富的创造和增量与精神文化产品的分配形成了有机统一。

### （三）克服错误思潮，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指向个人精神生活富足、精神境界提升，更深层次地要求社会整体有积极的精神风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进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一开始就没有给社会提供维护集体利益的价值取向，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主流。资本逻辑主宰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自由”“平等”成为空洞的口号；资本逻辑的价值取向丝毫不考虑人的异化和社会整体精神危机。在个人层面，个人沉溺于消费、享乐的空虚状态，这表征着“自由”外壳下的精神贫困；在社会层面，社会整

体性被残酷的竞争消解，善的公共伦理基础遭到侵蚀。社会这种状态被哈贝马斯概括为“生活世界殖民化”——社会整体陷入价值与意义虚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sup>[14]</sup>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充盈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力、凝聚力，引导人民挖掘、探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更好地改变当前世界的精神生活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sup>[15]</sup>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引，深入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针对青年群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系统化、常态化的教育，引导青年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这些举措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更为推动我国现代文明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四）以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提供精神滋养

精神文化产品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重要载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对精神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操控，导致精神文化生产领域良莠不齐，精神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数量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必须打破资本对精神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垄断，确保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产品。

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增加精神产品的数量，更需要提升精神产品质量。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更加追求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对高质量的

精神文化产品需求也不断增加。人们比以往更看重精神产品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水准，要求精神产品具备深厚的思想性、卓越的艺术性和高度的观赏性。除了提高精神文化产品质量，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还通过精准化的服务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层次性、差异性。这种“需求侧响应”机制确保人民能够享受到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他们多层次、多方面以及个性化的需求。此外，它还致力于调节精神生产过程，公正分配精神资源，引导人们理性消费；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和审美鉴赏能力，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和欣赏精神文化产品的内在价值。通过这些努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人民提供了实现美好生活必需的精神食粮和精神动力，促进人民精神素养和精神境界的全面提升。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卢德友，姜婧. 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2)：36-43.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7.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3.
- [8] 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 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96.
- [9] 谭勇. 时间异化：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重要维度[J].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01)：35-45.
- [10] [德]瓦尔特·本雅明. 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 王涌，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65.
- [11] [美]埃里希·弗罗姆. 健全的社会[M]. 蒋重跃，等，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117.
- [12] 李坤钰. 机械复制时代的拜物景观与另类反抗——重思本雅明都市叙事中的资本批判思想[J].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21(02)：271-282+731.
-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26.
- [1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6.
- [15] 任仲文. 何为共同富裕[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95.

责任编辑：丁春华

# 从“他者凝视”到“主体自觉”： 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叙事逻辑何以重塑

庄顺程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秩序下，“他者凝视”作为一种非对称的权力结构，通过话语霸权将非西方国家客体化与刻板化，致使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陷入失语困境与认同困境。为超越这一非对称权力结构的束缚，“主体自觉”理论要求解构西方价值体系的符号暴力，构建基于本土文化传统与当代实践的价值评判体系；通过话语资源的批判性开掘与全球话语协商，完成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设置的范式转换；通过构建深层叙事体系，超越浅层符号化表达，实现中华文明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这一范式转型将问题域拓展至话语权力、文化主体性与文明对话等理论维度，为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供了理论指引，同时也为建构更加平等多元的全球传播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国家形象；国际传播；他者凝视；主体自觉

**中图分类号：**G206;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072(2026)01-047-08

国家形象是一国内部与外部行为主体基于对该国多重变量要素的总体认知所形成的综合性判断与评价。<sup>[1]</sup>国家形象的建构不仅关乎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效率，更深嵌于权力关系、话语斗争与文化政治中的意义竞合与认同塑造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sup>[2]</sup>这一战略指引要求实现

从“他者叙事”向“自我叙事”的范式转换，掌握国家形象建构的话语主动权。

长期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形象建构往往陷于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的“他者凝视”之中，该凝视机制通过垄断话语权、评价标准与叙事框架，将非西方国家置于被审视、被定义、被表述的客体位置。这种凝视并非客观中立的观照，而是一种嵌入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偏见的认知结构，制约着中国等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中的自我表达权与话语权。面对由“他者凝视”所构筑的叙事藩篱，中国应实现从“他

---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主体性建构研究”（24CJ14）阶段性成果；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创新重点项目“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逻辑与价值意蕴研究”（2025ZD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庄顺程，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者凝视”的被动回应到“主体自觉”的积极建构之转变，要求传播主体主动解构西方主导的不对等话语权力结构，将国家形象建构视为一种动态、开放、参与式的话语实践，充分利用数字时代的传播潜能与符号资源，在与全球受众基于“主体间性”的意义协商与对话中，讲好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实现从“他者建构”到“自我建构”的叙事主权回归。

### 一、“他者凝视”：话语霸权的生成机制与叙事俘获

“他者凝视”是一种话语权力的拓扑结构，凝视主体凭借其话语权力，将客体塑造为符合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预期的“他者”形象，进而造成观看与被观看、定义与被定义的结构不对等。该机制延续并强化了一系列二元对立思维，如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文明与野蛮等，其中支配方通过对“他者”的系统性编码和归类，垄断定义、阐释与评判的话语权。而被支配方则被客体化，沦为无法自我言说的异质存在，“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sup>[3]</sup>。

“他者的形象既是对他者的否认，又是对自身及自我空间的补充和延伸。”<sup>[4]203</sup>“他者”的树立本质上是“为了确定自身”、强化自我认同，即通过对外部的差异化界定来巩固内部同一性。<sup>[5]</sup>“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sup>[6]426-427</sup>自我身份的形成依赖于对他者的持续参照与话语重构，是一个交织着知识生产和权力实践的社会政治过程。因此，凝视不仅是一种视觉行为，更是一种渗透权力运作关系的认知装置。作为视觉中心主义的产物，它赋予主体“观看”的权力以确立自身位置。而被凝视者则在承受符号暴力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他者的价值尺度并进行自我规训。<sup>[7]</sup>在这一视觉场域中，“他者”的主

体性被系统性遮蔽。如拉康所言：“那使视觉领域具体化和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满足的东西是这样一事实，即基于结构的原因，主体的陷落总是难以觉察，因为它被简约为零了。”<sup>[8]</sup>

萨义德揭示：“在五百年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有规律的交流中，一个几乎没有一点改变的观念就是，有一个‘我们’和‘他们’，两个方面都是固定、清楚、无懈可击地不言自明的。”<sup>[9]</sup>“东方”作为西方建构的知识对象和意识形态他者，被纳入欧洲的文化想象与物质结构之中，成为其确立自我主体性不可或缺的对立面。东方学不仅是一套学术话语，更是一种文化政治机制，它通过将文化差异本质化、边界化，为西方支配、容纳、统治东方提供了认识论合法性。这种凝视机制亦是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产的关键环节，“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把它对世界所体验的依附关系作为真实的和合理的关系而接受”<sup>[10]</sup>。于是，国家形象在此过程中被编码为一种意识形态符号，再生产符合西方中心主义利益的符号秩序，从而巩固既有的国际权力格局。

具体而言，“他者凝视”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展现出多层理论含义。其一，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西方主流媒体集团、文化机构与学术体制长期把持全球传播秩序，构成凝视行为的制度化载体，通过议程设置、框架效应与意义阐释，牢牢掌控国际舆论场的叙事主权。如萨义德所言：“东方学话语使相互对立的东两显得‘自然’，它用学术惯语和学术方法表述人的类型，它将现实和外部参照归结为独立存在的客体。”<sup>[6]413</sup>这种深植于知识权力结构中的非对称关系，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长期处于“被述”的处境，“自述”能力遭受系统性压制。其二，认知图式的刻板化。“他者凝视”倾向于将对对象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压缩为可被快速识别与传播的刻板符号，如“威权主义”“威胁论”“文化奇观”等。此类简化机制既服务于特定意识

形态操控的需要,也迎合西方受众对“他者”的认知预期。大众“在观察中会倾向于选择性地识别熟悉的符号,这些符号代表着一些观念信息,他们会用脑海中贮存的图景将这些观念信息补全”<sup>[11]</sup>。西方媒体通过叙事框架的不断重复与强化,将对象国凝固为某种本质主义的他者形象,服务于维持西方在地缘政治和全球价值链中的支配性地位。其三,客体化与去历史化。“他者凝视”悬置被凝视者的历史主体性与发展自主性,将其呈现为一个静止的、可供外部审视的认知客体,从而系统性地褫夺了他国国家形象的复杂性、历史纵深感及其内在发展逻辑。对象国的现代化道路、文化自觉与制度创新因而常常被置于西方线性进步史观的审判之下,其文化合理性与实践合法性遭受漠视。

在“他者凝视”的框架下,非西方国家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常陷入双重困境。其一为“失语困境”,即本国现实被外部叙事系统性扭曲,却因话语权缺失而难以实现有效对抗。传播者被迫在他者设定的议程结构中进行被动辩驳、澄清和自证,大量国际传播资源被消耗在解构负面标签之上,不仅传播效能低下,还可能在反复的语义争夺中强化原有的污名效应,最终落入公信力瓦解的“塔西佗陷阱”。其二为“认同困境”。“在承认中,自我已不复成其为个体。它在承认中合法地存在,即它不再直接地存在。”<sup>[12]</sup>为求国际承认而主动迎合他者期待,对自我进行异质化裁剪和表演化叙事,对叙事进行选择性地呈现,不自觉地将西方的价值观与审美标准纳入自我形象的构建中。如过度强调传统文化符号而遮蔽现代社会的多元面貌,或试图以“去政治化”策略回避社会现代性和制度性议题,形成“自我东方化”倾向,从而导致主体性的进一步消解,国家形象缺乏历史真实性与当代共鸣力。在这一语境下,中国亦长期被标签化为“东方他者”或意识形态异质体,面临严峻的失语危机与认同挑战。若要突破

这一困局,则必须超越对他者凝视的被动回应,转向构建具有主体性的叙事体系与话语策略,从而在国际传播场域中重建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

“语言作为符号的价值和语言的复制功能是重叠在一起的。”<sup>[13]</sup>话语作为一种通过符号操作以界定现实、建构世界的实践,构成具有权威效力的知识体系。它规定了在特定社会形态中哪些陈述可被接受、哪些必须被排除,从而在管理与维系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构成性作用。因此,尽管话语最初是基于认知与表达意图而创建的,它却也反向塑造社会规范、确立政治权威、分配符号权力。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中,“话语主体通过叙事有效传达特定信息,塑造某种观念和形象,影响受众对该主体的认知,从而扩大话语主体的吸引力、感召力。”<sup>[14]</sup>但在话语实践中,“话语的参与者与持反对态度的他者之间,是不存在共同语言的。”<sup>[15]</sup>因此,要突破“他者凝视”所固化的权力结构,就必须推动叙事逻辑实现从“被凝视”到“反凝视”以至“去凝视”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型首先要求对凝视机制中所嵌入的权力关系进行系统性解构,并积极发掘对抗性与颠覆性的叙事潜能。

## 二、“主体自觉”：建构中国自主叙事体系的理论内涵

“他者的价值源于自我的‘意识’,是自我对合作的‘计划设想’和‘预期结果’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是隐藏于历史进程的、自我与他者互动的根本逻辑和根本特性。”<sup>[16]</sup>从“他者凝视”向“主体自觉”的演进,应被视作主体性在跨文化传播结构中的哲学性复归与话语叙事层面的重构。“主体自觉”绝非退行至身份本质主义或文化排他性,而是体现为一国在身份建构与国际传播中从“被凝视的客体”向“言说的主体”、从“被他者阐释”向“自我阐释并参与共同阐释”的范式转型。该过程不仅关乎话语权力的重新分配,更涉及意义生产机制的

结构性改变。

(一) “反凝视”：主客对立消解与间性认同生成

“反凝视”意味着被客体化的行为体通过发出自我注视，重新夺回话语能动性主体位置，从而挑战原有的视觉体制，使注视场域转化为一个充满张力的争论空间。有效的反凝视策略并非旨在颠倒主客二元位置，而是要彻底解构这种二元对立本身，否定其内在的等级秩序，进而走向一种承认差异但拒绝等级化的辩证关系。它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意义流动方式的重构，倡导一种更具包容性与互渗性的认同机制。“国家形象观念是涉及不同国家相互认同的结构性关系，是一个以国家为主体的主体间关系问题。”<sup>[17]</sup>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主体间性的意义协商过程，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原本僵化的边界被不断流动的意义所消解，不再存在一个稳固的中心化主体及永恒他者化的客体。该叙事逻辑“赋予我们一种既深入支配符号与意指实践系统，也支配我们对它们的阐释的原则之洞察力”<sup>[18]</sup>。它要求我们不仅关注话语的表层结构，更要揭示其背后的权力机制与意义再生产条件。

温特指出：“文化形式的一个关键方面是角色结构，即共有观念使持这些观念的行为体所具有的主体位置格局。主体位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现建构的，这种再现是对自我和他者作为以某些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类型施动者的再现，它又建构了独特文化体系的逻辑和再造条件。”<sup>[19]</sup>在国际传播的语境中，国家形象正是在这种主体位置的互构与再现中被不断赋予意义。它既受制于特定文化体系中的角色与观念结构，同时也通过叙事实践参与该文化体系的再造。“他者的否定性给同一者以轮廓和尺度。没有了这一否定性，同质化便会滋长。”<sup>[20]</sup>他者性的消退将导致差异的抹平与绝对同一性的扩张，进而危及主体身份的健全性与真实性。一个真实、健康的国家形象，应源于其内部“自塑”与

外部“他塑”之间所达成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构：前者体现国家作为话语主体的自我认知与文化自觉，后者则承载国际社会对其的情感投射与认知反馈，二者共同构成国家形象的一体两面。因此，打破“他者凝视”的关键，在于通过自觉的叙事重构，超越宣传或辩驳的被动逻辑，转而致力于在自我与他者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共同构建一种可被相互承认的“叙述共同体”。

(二) “主体自觉”三阶进路：溯源—批判—重构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sup>[4]202</sup>在国际传播维度上，“主体自觉”体现为一国对自身历史方位、文化特质、发展路径与国际角色的系统性把握，并能够将这种认知转化为自信、连贯且有效的传播实践。它要求传播主体重返自身的历史语境与文化本源，在高度清醒的自我认知基础上，主动构建具有理论自主性与文化主体性的叙事体系。这一理念承接“文化自觉”的观念，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而“自觉是为了自主，取得一个文化自主权，能用以确定自己的文化方向”<sup>[21]</sup>，进而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文化自觉强调应以全球文明视野审察不同文明之间的源流辐射与衍化发展关系，将中华文明置于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在其中找到“作为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我定位和存在意义”<sup>[22]</sup>。

在此基础上，“主体自觉”进一步拓展为国际传播中“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工程，其内涵可从以下三个递进层面加以阐释。一是“自知之明”：摆脱西方审思框架的隐性支配，运用根植于中国历史与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清晰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制度合理性及文明价值。同时，客观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对世界发展的可能贡献，

避免陷入文化本位主义或文明优越论，保持开放与自省的态度。二是“批判反思”：国家形象重塑首需“破”的勇气，既要深入剖析“他者凝视”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机制、话语权力结构及其再生产逻辑，揭示其如何通过理论预设、符号编码与叙事框架维持不对称的话语秩序，也须反思中国既往国际传播中存在的“自我东方化”、辩白式叙事与话语能力短板等问题。三是“超越建构”：解构最终服务于重建，新的叙事逻辑应突破二元对立结构，代之以更具流动性、交互性与包容性的叙事模式。例如，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应突出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融合、国家发展与个体幸福的统一、本土实践与全球意义的联动，以复合叙事瓦解他者的刻板认知。最终目标是超越对抗性话语和应激性回应，主动提出具有思想包容力、时代前瞻性与伦理感召力的新理念、新范式，真正参与全球意义生产，实现从“话语追随”向“话语贡献”的战略转变。进而，以“文化自觉”为基石，在价值层面构筑具有感召力与共识性的传播理念，并在操作层面实现传播路径与叙事策略的革新，这便构成了主体自觉的内在要求与递归延伸。

### （三）“价值自觉”：开辟共同话语空间

“价值自觉”建立在对自身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刻认同与自信的基础上，要求我们系统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资源，深入发掘其中所蕴含的独特智慧与时代价值，并将其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相结合，从而构建一套逻辑自洽、解释力强且具有感召力的自主价值话语体系。其评判标准不再依附西方预设的价值尺度，而是立足于“是否真正增进人民福祉”“是否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体性尺度。相应地，传播核心也应由“澄清误解”转向“价值表达”，从告知世界“我们并非如你所想”，转变为清晰阐述“我们是谁、我们主张什么、我们能为人类共同未来贡献什么”。

在全球层面，“价值自觉”进一步体现为将中国理念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公共产品。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博弈逻辑，倡导以“对话协商、合作共赢”为内核的新型国际交往伦理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它不仅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方案，也为国家形象传播确立了价值制高点和话语引领力。该理念同时推动一种“主体间性”传播关系的形成，国际传播的目标不再是单向寻求认可，而是在平等、双向的基础上，与全球公众达成相互尊重与理解的对话关系。“自我”与“他者”不再是凝视与被凝视的固化对象，而是流动的、相互建构的对话伙伴。

国家形象并非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需要在与全球公众的持续互动中，通过“反思性修正”不断调整和优化。“反思性修正确保反思性理解所确立的承诺和立场能够随着全球情感与舆论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与进化，从而使得国家形象传播能够持续回应全球舆论的变化与反馈。”<sup>[23]</sup>该机制不仅增强了国家形象建构的适应性与包容性，也使其能够在动态的国际舆论环境中保持道德正当性与情感感召力。任何试图用一套新的“绝对真理”去取代旧真理的尝试，都可能再造新的意识形态封闭。真正的批判性自觉，应致力于揭示所有宣称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体系背后的特殊权力印记与历史偶然性，拒绝任何形式的元叙事垄断。最终，国际传播的价值旨归应从单向的“说服”转向双向的“沟通”，从输出“信息”升华为促进“视域融合”，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在持续对话中构建更具合作性与建设性的全球叙事。

### （四）“实践自觉”：从符号开掘到全球介入

国际传播是一种深嵌政治逻辑的意义生产机制、现实建构实践与主体召唤过程。每一次对外话语表达、跨文化互动乃至公民的跨境行为，均可被视为参与国家形象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实践。在此

视角下，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应被理解为一个“作为实践的国家形象叙事”过程。“形象即话语，传播即建构”，国家形象并非先于表征而存在的客观实体，也非等待被“真实”再现的对象，而是在话语实践中被持续动态建构的符号意义产物。若将“价值自觉”视为指向意识形态重构与意义解放的导向性原则（“道”），那么“实践自觉”则体现为在国际传播场域中争夺话语主导权与意义阐释权的策略性能力（“术”）。它要求将批判性的价值立场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传播效力与斗争意识的实践形态。

这一实践形态涵盖三个相互关联的能力维度：其一，话语资源的批判性开掘能力，即从本土历史经验、文化积淀与当代实践中，系统提炼能够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共识的反叙事符号、意义母题与情感结构；其二，话语体系的系统性建构能力，即将所发掘的话语资源整合为一套既能够清晰阐释自身发展路径，又具备全球对话能力的话语体系；其三，话语实践的全球介入与协商能力，即善于借助多元传播渠道主动参与全球公共议题讨论，在话语交锋中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霸权，推动形成新的认知共识与意义秩序。

由是观之，“实践自觉”本质上是一种贯穿国际传播全流程的意识形态实践自觉，体现在以下几个环节：在议程设置层面，主动策划并推出反映自身价值立场与历史愿景的主题，打破西方对“重要议题”的垄断性定义；在叙事框架层面，构建能够揭示结构性矛盾、激发批判性反思、动员情感认同的替代性意义框架，而非被动适应既有的认知定式；在传播节奏层面，注重把握话语斗争的时间性与策略节奏，在关键舆论节点有效介入以改变力量对比；在效果评估层面，建立科学、多元的评估机制，不仅关注触达率、参与度等量化指标，更重视受众认知结构的转变、意义认同的深化以及行为意向的生成等质化效果，并据此持续优化传播策略，驱动从

“话语战术”到“叙事逻辑”的深层重构。

### 三、重塑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叙事逻辑

（一）赋权多元主体：从官方话语到多层次传播矩阵的复调呈现

传统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长期倚重于政府及官方媒体的单向输出，形成一种“独白式”的叙事模式。这种模式在高度去中心化、渠道多元的当代媒介环境中，不仅传播效能受限，其权威性叙事更因缺乏主体间性而难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认同。“一切论证，都要求同一种相互寻求真实性的组织模式，其目的在于通过争论，凭着更好的论据使主体间相互信服。”<sup>[24]</sup>“主体自觉”理念内在要求打破单一主体的叙事垄断，积极构建多元、协同、互动的“国家形象传播矩阵”，以实现中国故事的“复调叙事”国际化呈现。

“只有从宏观到中观、微观，从政府到组织、个体，从精英到草根，形成多元并存的叙事格局，才能向世界讲述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故事。”<sup>[25]</sup>这一过程是对“他者凝视”的结构性回应，通过打破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单一化、刻板化叙事，以多元主体的真实实践解构西方话语霸权。作为传播矩阵的主导者，官方机构亟需实现从“宣传主体”向“沟通平台”与“叙事协调者”的角色转型，注重传播的专业性、互动性与文化适应性，提升中国声音的接受效度。在实践层面，政府职能应进一步从“唯一叙事者”转向“制度赋能者”，通过政策支持与资源协调，鼓励国内文艺工作者、学者、网红等社会力量以各自的语言形式参与国际叙事。企业尤其是参与全球治理的中资机构，已成为中国故事的重要实践主体。其在当地的经营行为、文化融合与社会责任实践，构成比宏观叙事更具体、更可信的国家形象要素。而各类民间组织、智库与文化团体，以其高亲和力的交流方式，搭建中外民心相通的桥梁。同时，应大力倡导与传播对象国本土创作团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合作生产”与“共同叙事”，

将“他者”转化为对话者，实现真正的跨文化理解。这种多元主体的复调叙事，以开放心态支持民间不同声音在国际场域中的理性表达，展现一个现代国家的包容性与文化自信。“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sup>[26]</sup>这种内在的多样性与宽容度，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国家形象最具说服力的表征。

（二）议程自治：中国经验上升为全球公共知识的路径

从认识论层面审视，国家形象是处于特定知识权力结构之中、经由传播实践持续重构的认知对象。这些形象依其符号组织逻辑可分为两类，一类具有相对系统化的表征特征，符合实证认知的规范；另一类则在意义融贯性及其与现实指涉关系上，深度受制于特定话语权力结构的塑造。长期以来，国内部分观点主张中国国际传播应努力“与西方话语接轨”，使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以促进理解。该类思路虽具策略考量，却在无形中“以‘符号暴力’的形式，与西方形成一种‘共谋’，里应外合地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和偏见”<sup>[27]</sup>，强化了西方作为定义者与评判者的地位，默认了其话语体系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在结构上延续了“他者凝视”的权力逻辑。

“主体自觉”理念要求我们从根本上超越这一依附性范式，实现传播内容从“被动应答”向“主动设置议程”的战略转型，将中国经验转化为可共享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从而在解构“他者凝视”的同时，为“主体自觉”奠定坚实的叙事基础。“议程设置主体在议题信息中植入话语、见解和看法，暗含着议程设置主体的观点理念和价值导向，从而使议程设置成为思想表达的重要途径。”<sup>[28]</sup>中国作为兼具文明延续性与现代创造性的国家，其叙事不能仅限于回应西方议题，而应立足自身价值与发展实践，推出具有思想深度与共鸣感的原创内容。实

现这一转型，议程设置应兼顾双重维度。一方面，深入阐释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大理念的哲学内涵与全球意义，主动聚焦数字伦理、公共卫生、贫困治理等全球性挑战，系统梳理中国的实践路径与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善于将宏大叙事转化为具象可感的个体故事，在叙事策略上推动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有机融合，“从人民生活的源泉中，汲取新的勇气”<sup>[29]</sup>。例如，可选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在华留学生作为叙事主角，以其第一视角串联起两个“故乡”的发展轨迹；或借助中欧班列文化列车，将非遗作品、儿童手绘等具象文化符号转化为“文明对话”的媒介，使高维理念在人间烟火中自然呈现。

（三）平台逻辑适配：算法可见性语境下的符号实践

在网络化社会与后真相语境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广泛传播效度与认同影响力的话语，日益源自民间社会与普通网民的符号实践。作为公共外交的新型行动者，非官方主体以自组织方式在数字空间中建构并传播多元叙事，深刻重塑着国际舆论的生成逻辑与流动机制。全球数十亿用户通过平台化连接被整合进一个动态、开放、持续互动的意义网络，这种重新组合“通过影响个体和团体行动的知识的不输入，来对社会关系进行反思性定序与再定序”<sup>[30]</sup><sup>14</sup>。掌握算法逻辑已成为打破“他者凝视”、实现“主体自觉”传播的技术前提。“主体自觉”的叙事逻辑必须深度契合数字平台的交互特性与传播规律，将宏大国家叙事分解为可感知、可参与、可转译的微观符号实践，使国家形象建构主体从单一抽象的制度性发声者，转变为一个能够赋能多元节点、激发意义共生的“传播生态系统”。

有研究表明，非政府行为体作为公共外交的关键参与者，在信息传播体量及实际效果上已超越多数政府主导机构。在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构成国际舆论核心场域的全球化平台中，“主体

自觉”要求中国传播主体彻底超越“内容搬运”思维，真正以“生态参与者”身份融入平台社群。以多种传播模式之数字化与网络化整合为基础的新沟通系统，其特性是一切文化表现得无所不包与全面涵盖。惟有在这个整合系统中“出现”，才让信息能够沟通与社会化。“若要纳入这个体系，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要能适应其逻辑、语言、进入点以及编码与解码模式。”<sup>[31]</sup>因而必须深入研究并适应不同平台的原生文化与运行逻辑，例如 Twitter 的即时性与意见领袖驱动机制、Facebook 以强关系链为基础的社群传播模式、YouTube 的长视频叙事和创作者生态。传播实践需匹配平台语言与用户惯例，避免将国内“通稿”模式简单移植，从而实现有效触达和共鸣。

#### （四）对话性生产：基于“视域融合”的意义共创与反思性修正

巴赫金指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等。人是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他以整个身心投入话语之中，这个话语则进入到人类生活的对话网络里，参与到国际的研讨中。”<sup>[32]</sup>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以人类存在的基本对话性为基础，其从“独白”转向一种承认差异、尊重他者、致力于在平等互动中构建共识的主体间性“对话”模式，核心目标在于建立链接、促成理解与意义共创。传播的目标不是强迫对方接受“我方视域”，也不是简单迎合“他者视域”，而是在与其他国家、文化、社群等多元传播主体的持续互动中，促使双方的视域发生接触、碰撞、调整和融合。这是理解者带着自身由历史传统构成的“前见”或“视域”，与他者的“视域”进行交流，并在交流中形成一个自我与他者有机统一的、更具共识性的“新视域”的过程。

“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

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sup>[33]</sup>视域融合不是对自我视域的否定，而是通过将其他视域纳入考量，在一个更宏大的整体中重新定位自我。在实践层面，需要建立系统化的对话机制。“将国家叙事与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普遍关切相结合，传者与受者关系方面，数字化公共外交主体要将国际受众看作平等的交流对象，采用策略性叙事方式增进双方情感互动。”<sup>[34]</sup>这意味着在社交媒体等互动平台上，传播主体必须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积极倾听全球受众的声音，并对质疑、批评与建议给予真诚、敏捷、有效的回应。

具体而言，国家叙事应深度对接人类共同挑战与普遍关怀。例如，在讨论“发展”议题时，中方可以阐述自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共同富裕”的实践，同时倾听和回应国际社会对可持续性、公平性的关切，“从文明对话的世界史观出发，广泛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实践，探索更符合人类发展实际的社会科学理论和话语”<sup>[35]</sup>，共同探索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发展理念。这种对话实践不仅有助于消解“他者凝视”的对抗性，更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合作过程，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构全球知识体系，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多元、包容的全球话语生态。当中国的国家形象在这样充满建设性的对话互动中被塑造和接受时，其真实性和吸引力将获得根本性的跃升。

#### （五）深层叙事：文明内核的当代表达与情感认同锻造

“传统的、民族性的东西是国家形象的基础部分，应当向外展示，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仅以传统面目示人已远远不够。”<sup>[36]</sup>这一认知层面的转变，内在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他者凝视”与“主体自觉”之间的辩证张力。前者代表着外部视角的权力性介入，借助凝视机制将文化对象固化为异质奇观；而后者则强调文化主体通过自我阐释和价值重构，确立其文化身

份的叙事本体性与话语能动性。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倡导一种植根于文明内核的“深层叙事”,既从中华文明的源流深处汲取养分,又致力于回应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与发展命题,展现独特的哲学思辨和价值立场。

在实践层面,中国的深层叙事应着力激活如“民本思想”“中和之道”“义利之辨”等传统哲学资源,使其与当代中国治理逻辑和现代性道路探索相融合,从而生成一系列既有文明纵深感又具备现实解释力的叙事文本。吉登斯指出:“在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时,传统甚至不会抗拒变迁,这种环境几乎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分离开来的标志,通过这些标志变迁具有了任何一种富有意义的形式。”<sup>[30]</sup><sup>33</sup>传统文化是在与现代性相互交织的特定场域中被不断重构的动态体系。因此,在文明对话层面,中国应超越符号化、表面化的文化外宣模式,系统梳理中华文明中关于生态伦理、道德规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深刻智慧,致力于“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表达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sup>[37]</sup>。此举不仅关乎内部的文化整合与认同凝聚,也是对外塑造具有责任感的文明大国形象的重要路径。

当然,真正具备传播力与感染力的叙事,最终仍需回归到“人”的维度。深层叙事必须观照个体的命运起伏与情感世界,通过普通人真实而鲜活的生命经验,折射国家的制度变革与社会发展。要夯实跨文化沟通中“视域融合”的微观基础,则需“超越简单化和脸谱化的理论范畴来研究解放与压制体验的社会分布与相关媒体呈现、关注和解释民众复杂的社会利益和意义诉求及其与官方意识形态与话语的链接和互动关系”<sup>[38]</sup>,关注民众在日常生活动中所体验的解放与压制、希望与困境,深入理解其复杂的社会利益与文化诉求,并审视这些微观经验如何与官方话语和意识形态形成衔接。只有将哲学高度与人文温度融为一体,中国方能在全球话语

场中实现从他者定义到主体言说的根本性转向,使国家叙事成为承载历史记忆、伦理价值与未来愿景的意义系统。唯其如此,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文化主体真正意义上的“自觉性在场”与“价值性输出”,最终构建出既彰显中国特色又蕴含全球意义的现代文明叙事体系。

#### 参考文献:

- [1] 漆亚林.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历史进路与路径选择[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24):05.
-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01).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8.
- [4]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形象学研究:从文学史到诗学[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5] 邓建华.他者/他性(Other/Otherness)[M]//王晓路,等.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22-325.
- [6]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 [7] 陈榕.凝视[A].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349.
- [8] [法]雅克·拉康.论凝视作为小对形[M]//吴琼.视觉文化的奇观·视觉文化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0.
- [9]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21.
- [10]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31.
- [11] [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M].常江,肖寒,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59.

- [12] [德]黑格尔. 实在哲学[M]//[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49.
- [13] [法]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M]. 莫伟民, 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51.
- [14] 戴维来. 话语到话语权的转化逻辑与中国话语权的深化路径[J]. 太平洋学报, 2022, 30(07):26-38.
- [15] 陆扬, 王毅. 大众文化与传媒[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0:101.
- [16] 李娟. 自我与他者: 国际传播认识论的内在理路[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 45(12):55-65.
- [17] 刘国强. 国家形象传播: 作为国家认同双重机制的考察[J]. 求索, 2010(09):97-99.
- [18] [美]杰拉德·普林斯. 叙事学: 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 徐强,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159.
- [19] [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253-254.
- [20] [德]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M]. 吴琼, 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9:3.
- [21] 张冠生.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612.
- [22] 邹广文, 赵月. 以文化自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空逻辑[J].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23, 27(06):5-13.
- [23] 刘煜, 张红军. “反思性的激情”: 构建积极国家形象的情感路径传媒观察[J]. 2024(09):24-31.
- [24]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化[M]. 曹卫东,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36.
- [25] 陈先红, 宋发枝. “讲好中国故事”: 国家立场、话语策略与传播战略[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0, 42(01):40-46.
- [26] [苏]巴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 白春仁, 顾亚铃, 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50.
- [27] 蒙象飞. 中国国家形象与文化符号传播[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6:88.
- [28] 马明冲, 韩笑. 议程设置: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一种建构范式[J]. 新视野, 2023(06):17-23.
-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127.
- [30] [英]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 [31] [美]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 等,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464.
- [32] [苏]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5卷[M]. 白春仁, 顾亚铃, 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387.
- [33]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 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上卷[M]. 洪汉鼎,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394-395.
- [34] 孟滇滇, 张举玺. 空间转向与符号流动: 数字化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建构[J]. 当代传播, 2023(01):107-112.
- [35] 白文刚. 文明传播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形象重塑[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74(05):29-39.
- [36] 程曼丽. 中国国家形象符号的拓展与更新[J]. 新闻与写作, 2022(05):1.
- [37]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J]. 求是, 2024(03):4-8.
- [38] 赵月枝. 传播与社会: 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1:38.

责任编辑:魏璐珂

# 当代青年策略性怀旧叙事的景观呈现及 引导策略

——以“勇敢小羊”叙事为例

尹昭桦<sup>1</sup> 花宇馨<sup>2</sup>

(1. 北京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44; 2. 西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勇敢小羊”作为近期流行于网络空间的青年亚文化现象,集中体现了当代青年基于自我成长体验与代际童年记忆所构建的策略性怀旧叙事。青年在其中以自我矮化与成长韧性并置的方式,展现出现实压力下的情感调适与意义追寻,也反映出主导意义系统断裂下的“意义贫困”困境。从动因层面看,该社会文化景观是青年在社会结构性压力与算法催化背景下的主动回应。面对其中潜藏的自我矮化风险,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超越单向的价值评判,以情感共鸣为基础实现价值澄明,并通过社会实践引导青年完成从“言说自我”到“践行担当”的转化,进而将亚文化内部的情感能量升华为推动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动能。

**关键词:**“勇敢小羊”;策略性怀旧;景观呈现;意义贫困

**中图分类号:** D432.6;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2026)01-057-09

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日益多元,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与情感结构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图景。从“躺平”到“内卷”,从“佛系”到“emo”,一系列网络亚文化现象此起彼伏,构成观测青年心理状态的重要社会镜像。近来,以“勇敢小羊”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现象在青年群体中悄然兴起并迅速传播,通过将动画形象“懒羊羊”与青年成长经历创造性结合,青年们自主构建出一种兼具困境中坚韧前行的颂扬色彩与自我降格、戏谑反讽意味的复合型叙事模式。现有研究对青年亚文化现象已有较多探讨,但大多集中于对“躺平”“内

卷”等显性社会心态的分析,或是对网络流行文化的表层解读。相比之下,对“勇敢小羊”这类将怀旧情感、个体叙事、自我疗愈与价值困惑熔于一炉的复杂文化现象,特别是对其生成逻辑和形成动因尚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与学理观照。如何超越现象本身,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审视青年“意义贫困”困境背后的物质基础,有效回应并引导其中蕴含的情感能量,已成为一个亟待回应的现实课题。

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于20世纪中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景观社会理论,他指出,当代社会已从“商品堆积”过渡到“景观的庞大堆聚”,真实的社会

**作者简介:** 尹昭桦,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党建;

花宇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关系被景观的表征所取代。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勇敢小羊”的流行，可被解读为一场青年主动参与构建的、对抗主流成功学和优绩主义的景观。青年将现实中的无力感、挫折感，转化为一种可被言说、传播乃至消费的文化符号，从而在景观体系中为自身的情感困境找到了“栖身之所”。

### 一、当代青年“勇敢小羊”策略性怀旧叙事的景观呈现

“勇敢小羊”景观始于当代青年对“懒羊羊”意象的符号化再造。青年把“小羊”符号作为言说自我的情感载体，借助童年文化符号和自我成长历程构建了策略性的怀旧景观。该景观中内蕴的情感张力及其怀旧式的叙事方式激活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在网络平台的助推下，“勇敢小羊”景观从个体的情感叙事转化为当代青年的共同情感体验。随着叙事的不断延展，“勇敢小羊”景观呈现出成长韧性与自我矮化并存的张力，揭示了青年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困境与社会压力，也反映了他们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自我修复、寻找文化认同的疗愈过程。

#### （一）景观制造：“小羊”意象作为言说自我的情感载体

“勇敢小羊”叙事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景观，关键在于懒羊羊这一角色形象与当代青年群体心理状态之间的高度契合性。在《喜羊羊与灰太狼》中，懒羊羊被设定为性格温和、反应迟缓、处于边缘地位的配角，既不具备灰太狼的攻击性，也不拥有喜羊羊的认知优越感，恰恰映射了大多数青年在现实社会中处于非精英、非中心位置的生存境况。一方面，“懒羊羊”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出当代青年在成长初期面对社会压力时所经历的真实状态。没有聪敏的头脑、坚强的后盾、足够的上进心以及被看好的未来，却仍能够在历经坎坷后坚持向前，象征着当代青年在现实困境中持之以恒、不轻易言弃

的内在韧性。另一方面，“勇敢小羊”能够成为青年普遍接受的情绪载体，还在于其卡通化的形象得以代替青年的真实面孔，降低了直接叙事的社会风险，使得他们能够以更安全的方式映射自我。据此，青年将这一角色从原初叙事中剥离，赋予其全新的文化生命，他们以懒羊羊的“弱小”和“不完美”来合法化自身在面对社会压力时的真实困境，又将历经坎坷后坚持向前的叙事建构为一种成长隐喻，象征青年自身在成长过程中的内在韧性。通过符号的转移和情感的投射，“勇敢小羊”不仅是青年自我表达的媒介，更是一种可以被观看、模仿、使用的景观，链接起走向自我认同的当代青年人，塑造出“我也这样”的共情景观，即德波所述，以影像为中介链接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sup>[13]</sup>。

“勇敢小羊”景观通常有三个核心组成部分，即懒羊羊的形象、当代青年真实的成长事件及《奇思妙想喜羊羊》轻松欢快的音乐，三者共同体现出“小羊”意象外显的温柔与内隐的坚韧、勇敢相统一的特征。这一景观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在于打破了主流“成功叙事”的单一逻辑，以一种更加多元的视角重申了个体价值与成长过程的复杂性。“独自一人外地上学”“一个人搬家找工作”以及“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等片段式叙述并非旨在展现光鲜、线性的胜利者的故事，而是坦然接受了成长过程中的断裂与脆弱，强调一点一点变坚强的坚韧，恰恰贴合当代青年人在现实高压下一边崩溃一边自愈的真实状态。在“今天解出了一道题”“今天和一个陌生人说话了”等叙述中，青年强调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式成就，而是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值得骄傲的成长时刻，其背后反映的是当代青年在现实高压之下，以温柔而坚定的方式重新书写属于自己的成长叙事。上述转变有力地挑战了以宏大成就为导向的成功观，使得在主流视野中微不足道的个体实践也获得了可见性和正当性。

(二) 景观传递：借助童年集体记忆引发情感共鸣

“勇敢小羊”景观能够在网络空间中迅速传递，关键在于内容本身不仅蕴含着“崩溃”与“自愈”并存的情感张力，更在于其怀旧式的叙事方式激活了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崩溃”与“自愈”并存的情感张力精准地捕捉到了大多数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因而成为“勇敢小羊”景观中最具聚合力的部分。而《喜羊羊与灰太狼》作为千禧年代中国动画的典范，承载着一代人共同的成长记忆，其核心价值在于它构成了一个共享的文化符号系统。当承载着当下真实情感的“勇敢小羊”叙事，与沉睡在记忆中的童年角色相遇时，瞬间引发了强烈的集体怀旧效应。熟悉的“懒羊羊”形象成为一个安全的情感通道，使得当代青年基于当下困境的脆弱表达得以合法化，并因集体记忆的加持而更易引发广泛共鸣，为景观的快速传递和情感共鸣奠定了心理基础。在此，“勇敢小羊”景观通过集体记忆的桥梁从个体的情感叙事转化为当代青年的共同情感体验。

可以说，“勇敢小羊”叙事是当代青年无力抵抗流动现代性社会的一次策略型怀旧，需要明确的是，“勇敢小羊”并非简单地沉溺过往，而是借助童年记忆展开的自我叙事。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曾指出：“虽然没有治疗怀旧的神奇方法，但是可以阐明怀旧诱使人们的某种机制，据此区分出修复型与反思型两种怀旧。”<sup>[2]</sup>前者注重于“旧”，后者注重于“怀”，当代青年的“勇敢小羊”叙事正是反思型怀旧的产物，青年群体并非试图原样修复一个完美的过去，而是带着对当下处境的理性认知，去怀想与挪用童年符号。他们将“懒羊羊”从原有的动画语境中提取出来，赋予其关乎当下成长困境的新意义。这种基于记忆的创造性转译，使得童年记忆不再是逃避的对象，而成为审视当下、进行自我叙事的策略性资源。

此外，“勇敢小羊”景观的规模化传递离不开网络平台的中介作用。以小红书、微博、抖音为代表的社交平台及其算法机制精准推送“勇敢小羊”叙事，将分散的、个体的怀旧情绪与叙事碎片连接并放大，引发青年群体的观看、共鸣与再创作，使得童年文化记忆被重新演绎为成年后的自我表达。

“我也曾是那只小羊”“谢谢自己长大了”等评论表明：“勇敢小羊”叙事在平台的作用下营造出一个超越地域、身份限制的情感共同体，该情感共同体实际上是以现实的青年群体的真实链接为纽带，借助虚拟空间展开的数字化怀旧景观。概言之，“勇敢小羊”景观是当代青年在网络平台中以怀旧为媒介的集体疗愈机制，是当代青年在流动现代性生活中重塑自我、重建意义的一次文化实践。

(三) 景观展演：成长韧性与自我矮化并存的情感叙事

经由“情感载体”的制造与“情感共鸣”的传递，“勇敢小羊”景观最终在青年个体的具体叙事中完成其意义的最终实现，即情感叙事的展开。而随着叙事的不断延展，“趁妈妈不在把厨房炸了，我是最棒的小羊”“等男朋友挣钱养我，我就是最棒的小羊”等具有自我矮化倾向的话语逐渐出现在社交平台中，使得“勇敢小羊”景观呈现出成长韧性与自我矮化之间的张力。这种叙事风格的转变，并非简单的意义退化，而是青年群体在特定社会压力下，所采取的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展演策略。

上述自我矮化式的情感叙事，首先可被视为当代青年对主流成功学的“个性式展演”。在优绩主义与内卷环境的双重挤压下，部分青年感到在“正能量”的框架内难以言说自身的无力与挫败。于是，他们转而主动扮演一个“失败”“荒诞”的“小羊”形象，以戏谑的姿态解构“奋斗”等传统价值的绝对权威。这种叙事并非认同失败，而是通过一种“犬儒式”的智慧，将现实的失望转化为带有防御色彩

的幽默，以此表达无声的抗争。然而，这种看似消极的“个性式展演”，其深层动力依然源于对认同与归属的渴望。社交平台的算法逻辑在此扮演了双刃剑的角色。它既通过算法推荐放大了这类争议性、高互动性叙事的可见度，也通过创造“数据剩余价值”激励了用户的跟风创作。于是，个体的自嘲逐渐演化为一种被围观、被消费的符号景观，恰如德波所言，这是一个“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sup>[1]</sup>的颠倒时代。当个体的自我矮化叙事在平台上获得大量“我也一样”的评论时，一种新的身份认同与群体归属悄然形成。他们并非真正拥抱失败，而是在共享的“失败叙事”中，寻找在现实社会中难以获得的共情联结与情感庇护。

其次，这一张力性的情感展演，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所言的反思型怀旧深刻契合。当代青年并非单纯怀念无忧无虑的童年，而是将“小羊”这一童年符号，与当下“摆烂”与“内卷”的困境并置，进行深刻地对照与反思。成长韧性与自我矮化，由此构成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前者是面向困境的正面宣言，后者则是败退下来后的幽默自嘲；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代青年在面对现代性压力时，用于自我修复、寻求认同与进行文化抵抗的叙事策略。因此，“勇敢小羊”景观的展演，远非单向的积极或消极，它深刻地揭示了青年群体在身份困境中，如何灵活运用情感叙事，进行自我言说与群体联结的复杂心理图景。概言之，“勇敢小羊”景观的张力性展演，体现了当代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的复杂心理状态。个性式的自我矮化与坚韧的成长韧性并存，不仅揭示了青年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身份困境与社会压力，也反映了他们渴望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自我修复、寻找文化认同的疗愈过程。在此过程中，“勇敢小羊”作为一种策略性怀旧叙事，发挥了情感表达、文化归属和心理防御的多重作用，成为当

代青年寻找自我认同和情感支持的重要媒介，塑造出盛行一时的青年网络亚文化景观。

## 二、当代青年“勇敢小羊”策略性怀旧叙事的动因分析

“勇敢小羊”的叙事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动力因素，其根源在于当代青年身处个体交往、社会压力、网络算法、文化思潮等多种力量交织的复杂场域。这种策略性怀旧既是青年群体面对时代症候的主动回应，也是其在外界结构性压力与内在认同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创造性选择。

### （一）个体之维：从他者认同到自我认同的主体性转向

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了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sup>[2]</sup>在人际关系的构建中，他者对于主体的评价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哲学论断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体现为个体通过参与社会交往、获得社会认可来确立自我价值的过程。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价值认同机制，而当代青年正经历着这套机制的深刻转型。

在传统社会化路径中，个体的价值与身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套相对稳定的、由外部定义的“他者认同”体系，即通过学业成就、职业地位、家庭组建等可见的、可被社会度量的人生里程碑来获取认可。这种认同机制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为个体的成长提供了清晰的价值坐标和发展路径。然而，在充斥着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这套优绩主义的评价体系正变得崎岖甚至断裂。“内卷”的恶性竞争、“躺平”的消极退出和“45度的人生”，共同映衬出青年在面对刚性社会评价标准时的无力与挫败。在此背景下，“勇敢小羊”的叙事彰显了青年群体主体性的一次策略性转向。选择“懒羊羊”作为自我表达的象征载体，绝非单

纯的自我放弃，而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性自我安置。通过主动降格身份来规避主流评价体系的压力，在边缘位置重构价值认同的空间。在这个新构建的自我叙事当中，对于个体的评价体系发生了实质性转向。“今天也在勇敢噢”“一个人搬家找工作，我是聪明勇敢的小羊”等叙事表明，人生价值不再仅仅由最终的社会性成就来定义，而是由个体在“冒险”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勇敢”这一品质来度量。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勇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气概，而是体现在面对生活琐碎时的坚持、遭遇挫折时的韧性以及保持真诚的勇气。它是对抗现代性压力的日常智慧，是在碎片化生活中保持自我完整性的生存策略。这种对内在情感与努力过程的珍视，标志着一种从“他者认同”到“自我认同”的深刻转向，这既是对异化社会评价的反驳，也是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当代诠释。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建构不仅依赖于外在的制度性安排，更需要个体在积极参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 （二）社会之维：结构性压力下的情感共振与算法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sup>[4]</sup>“勇敢小羊”现象的流行，其根源深植于当代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之中，彰显了当前社会物质生产过程数字化、社会关系原子化的特征。

首先，数字时代生产方式与劳动形态的异化是导致青年“意义贫困”并转向自我叙事的物质基础。随着资本逻辑向数字生活全域渗透，一种“微粒化”的生存状态成为常态。青年一代深陷于零工经济和弹性雇佣关系之中，劳动过程被算法精准切分、计量与监控，劳动成果与其主体价值日益疏离。正如项飙所指出的，在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青年群体面临巨大压力，从而导致“意义贫困”的出现。<sup>[5]</sup>从微观视角看，社会意义系统的结构可分为工具性

意义和价值性意义两种。工具性意义对应“为什么而做”，价值性意义对应“为什么而活”。意义贫困是个体的工具性意义与价值性意义连接发生断裂所致。<sup>[6]</sup>在传统的、稳定的职业路径中，持续的劳动能累积为可见的技能、地位与共同体归属，从而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然而，在高度流动、不确定的数字劳动中，这种连贯的成长叙事难以为继。因此，“勇敢小羊”所颂扬的“一个人搬家”“今天也很勇敢”，实则是异化劳动条件下，青年在无法从劳动成果中直观自身创造力的困境下，退守至“我在坚持”这一形式化、过程性的自我肯定。它将人生价值的度量衡从外在的、异己的社会评价标准，强行扭转为对内在坚韧品质的悲壮确认。其次，社会关系的加速原子化与共同体的消解，放大了青年的生存焦虑，催生了对情感共同体的迫切需求。传统的地缘、业缘共同体在流动性社会中逐渐弱化，而数字平台在重构人际连接的同时也加剧了竞争的个体化与身份的碎片化。青年以“原子”状态被抛入一个充满比较和竞争的社会场域，承受着来自就业、住房、婚恋等多维度的结构性压力。此时，“勇敢小羊”叙事借助算法推荐，迅速聚合了弥漫于青年群体中的普遍性焦虑。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剩余数据”，如点赞、收藏等社交手势，精准捕捉并放大这种以“弱小但积极”为核心的情感结构<sup>[7]</sup>，将其从私人情绪推向公共议题。于是，“勇敢小羊”从一种个体挣扎的言说演变为算法催化下的情感共振，在虚拟空间中构建了一个数字情感共同体。成员们因共同的“小羊”身份获得短暂的身份认同与低成本的情感支持，这有效代偿了现实中的社交疏离与归属感缺失。

最终，算法的赋能与青年的结构性压力相互催化，形成了青年数字生存的新常态。一方面，算法为青年提供了情绪宣泄与群体归属的出口，但另一方面，算法也对青年的表达构成了隐形规训。当算法持续推荐高度同质化的内容时，青年极易陷入信

息茧房中。青年在不自觉中迎合流量逻辑，将复杂的现实困境简化为一种易于被算法识别和推广的“勇敢”，这可能会钝化青年对社会压力的真实感知，从而弱化其对真实困境的反思与批判能力，使其沉溺于一种符号化的自我安慰之中。

（三）文化之维：“逆托邦式”叙事寻求集体身份归属

齐格蒙特·鲍曼曾指出：“逆托邦将怀旧作为现实批判动力的当代社会幻象。”<sup>[88]</sup>这揭示了“勇敢小羊”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逻辑，是当代青年参与并塑造的一种“逆托邦”叙事，其核心在于通过对集体记忆的策略性怀旧来寻求在不确定时代中的身份归属与意义表达。

首先，“勇敢小羊”是青年对“乌托邦”式未来失望后，转向“逆托邦”式过去的文化实践。正如鲍曼所指出的，当“乌托邦”式的美好未来在现实的复杂性、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面前显得遥不可及甚至可疑时，社会心态便会发生从“向前看”到“向后看”的逆转。<sup>[89]</sup>青年一代在优绩主义的疲惫竞争与现代社会的漂泊感中，发现传统成功路径充满荆棘。于是，他们策略性地回望，将情感投注于一个被重构的、安全的“过去”，即以童年动画为载体的集体记忆。这只“小羊”并非真实历史的复刻，而是被净化的情感符号，只保留温暖、简单且“勇敢”的内核。这种叙事正是典型的“逆托邦”转向，从对宏大未来的憧憬逆转为对微小但确定过往的依恋。其次，这一“逆托邦”叙事在数字时代加速演变，并催生了“衣帽间式”的数字情感共同体。<sup>[9]</sup>然而，这种共同体的形成无法脱离资本的运行逻辑。正如黄玮杰所批判的，在资本逻辑下，怀旧本身可以被批量生产为商品，其情感内核可能面临被抽空的命运。<sup>[10]</sup>这正是一种在批判理论视野下被视为完全消极的“商品化怀旧”，即怀旧的情感与记忆被从原有的生活经验与历史语境中剥离，包装成标准化、可消费的符号，其原有的批判性与

反思性在流通中被消解，最终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勇敢小羊”的传播同样无法脱离此语境。平台算法在精准识别并放大这一情感需求的同时，也将其纳入流量经济的生产链条，使得“小羊”叙事迅速模板化、景观化。然而，与批判理论中完全消极的“商品化怀旧”不同，青年群体在其中展现了强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他们并非被动接受被算法推送的怀旧符号，而是主动利用、改造并赋予“小羊”这一符号以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在数字空间构建了“衣帽间式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成员们因共同的“小羊”身份而暂时获得认同，彼此间提供低成本、高慰藉的情感支持。这种联结虽是短暂、流动的，却有效地为原子化的个体提供了代偿性的归属感，缓解了现实中的身份焦虑与社交疏离。

综上所述，青年一代在结构性压力下，放弃了对宏大的、传统的成功未来“乌托邦”的追求，转而退回到一个由童年记忆构建的、弱小但安全的羊村“逆托邦”中。这既是一种对现实高压的策略性逃避，也反映了深层的情感归属需求。然而，“勇敢小羊”现象在展现其坚韧与智慧的同时，也隐藏着让一代人在自我安慰中与结构性矛盾达成过早和解的风险。

### 三、当代青年“勇敢小羊”策略性怀旧叙事的引领策略

“勇敢小羊”叙事映照出了青年群体充满张力的精神世界。青年们既渴望认同又怯于宏大叙事，颂扬勇敢但常伴以自我戏谑，回望童年以期获得继续前行的动力。这种社会景观既体现出个体坚韧自省、重拾主体性的积极意义，但又潜藏着自我矮化、逃避现实的风险隐忧，而这恰恰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超越简单的价值评判与单向说教，在情感共鸣的基础上阐明道理，将青年亚文化中蕴含的情感能量转化为促进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一) 以情动人, 在情感共鸣中实现价值澄清。真正有效的价值引领不是自上而下的简单说教, 而是始于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情感共鸣实践。借鉴中国传统的“疏堵结合, 以疏为主”的治理智慧,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面对“勇敢小羊”现象时, 关键在于真诚理解与顺势引导, 在认同其“勇敢”叙事的情感合理性与其反抗“意义贫困”的积极努力的基础上, 引导青年从自我矮化的戏谑与自嘲中走出来, 并进一步澄清、升华其内在的奋斗价值与担当精神。

首先, 建立多层次的情感认同机制, 实现从单向灌输到双向互动的转变。政策制定者应当在公共话语体系中承认青年情感诉求的正当性, 通过发布青年发展白皮书、组织专题研讨会等形式, 将“勇敢小羊”现象纳入政策讨论范畴。思政教育者需要发挥专业技能, 在课堂教学、谈心谈话中运用“我理解你的感受”“这确实令人困扰”等情感回应技巧, 创设安全的表达空间。社区工作者可组织“小羊心声”分享会, 邀请青年在轻松的环境中讲述成长困惑。网络意见领袖应当发挥示范作用, 通过制作“读懂勇敢小羊”等主题内容, 引导公众理性看待这一现象。青年社群则可以通过“情感树洞”“成长伙伴”等项目互相倾诉心中烦恼, 从而形成互助支持的网络。

其次, 鼓励积极的策略性怀旧, 促进情感资源的有效转化。策略性怀旧具有双重性, 积极的怀旧能够给予力量与慰藉, 而消极的怀旧则可能导致现实逃避。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精准识别并区别引导。具体而言, 应当鼓励青年挖掘童年记忆中关于“互助”“坚持”“勇气”等积极品质的具体事例, 如“回忆一次通过努力克服困难的经历”, 而非沉溺于过去总是更美好的单纯怀念。网络平台应当优化内容推荐机制, 对展现积极怀旧的内容给予流量支持, 同时邀请心理学家参与制作“怀旧与成长”系列短视频, 引导青年建立健康的怀旧模式, 鼓励青

年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回望给予自己力量和勇气的童年瞬间, 引导青年将怀旧情感转化为建设性的行动。

最后, 引导青年正确认识自我矮化现象。在“勇敢小羊”的叙事中, 青年回望童年, 将自我降格为“小羊”, 通过构建新的价值支点来降低社会期待和压力, 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我保护作用, 但也可能导致自我矮化, 限制了对自身潜力的挖掘和对更高目标的追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通过深入的交流和引导, 帮助青年认识到自我矮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鼓励他们树立积极向上的自我认知, 在面对压力时既要保持坚韧, 又要追求更高的自我实现。

(二) 以理服人, 实现奋斗精神的“青春化”转译

在实现情感共鸣、建立信任基础之后, 价值引领需要迈向更深层次的理性认知层面。对“奋斗”这一主流价值观的引导, 亟需置于青年所处的意义结构中进行重新审视与创新表达, 使其成为能够回应青年的精神困境并引发深层共鸣的思想资源。

首先, 厘清策略性怀旧的积极价值与内在局限。学校思政教师可以开发专题课程, 通过案例分析揭示“勇敢小羊”现象背后的双重逻辑: 一方面肯定其通过构建次属意义系统来抵御“意义贫困”的创造性价值, 另一方面也要指出这种“安全屋”的局限性。社区工作者可组织青年成长讨论组, 邀请不同年龄段的参与者分享人生经历, 帮助青年认识到任何单一的应对策略都具有时空局限性。网络平台应当设置专题频道, 邀请专家学者就“怀旧的边界”等问题进行深度解读, 引导青年建立全面的认知框架。

其次, 阐明核心价值观并非仅存在于宏大叙事中, 而是深深植根于青年日常生活的微观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敬业”“友善”“和谐”等价值理念并非遥不可及的价值规训, 而是体现在每一次认真完成的工作任务中, 每一次真诚的

人际互动里，每一个对美好生活的具体追求上。当青年在“勇敢小羊”的叙事中肯定微观勇敢时，实际上已经在践行敬业精神的核心要义；当他们珍视同伴间的“互助友爱”时，已然展现出其友善品质。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帮助青年发现这种内在关联性，进而引导其连接个体体验与宏大价值。通过具体生动的生活化阐释，让青年认识到核心价值观不是外在于生活的教条规范，而是内在于生活实践的价值指引，能够为个体的成长发展提供根本遵循与精神支撑。

最后，引导青年将策略性怀旧中的积极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青年在“小羊”叙事中所珍视的“勇敢”“互助”等价值，并非与主流价值观相悖，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生活层面的生动映照。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细心挖掘其积极价值并实现“青春化”转译。例如，将“小羊”面对困境的坚持升维为坚守平凡岗位的敬业精神；将对“羊村”共同体温暖的向往倡导为对和谐社会的主动追求；将对公平与被接纳的渴望引导至对公正平等理性认同与社会实践。通过这种转译，促使青年认识到国家所倡导的宏大价值并非外在于个体生活的僵硬教条，而是与个体紧密相关的情感表达与价值需求。这实质上是将青年在次属意义系统中自发、零散的价值探索，整合并纳入一个更具包容性、引领性的主流意义系统之中，从而实现其价值世界的丰富发展。

### （三）以行促人，引导青年在实践中践行担当

“只有从知——经过情、信、意——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并进行经常的锻炼和修养，使之成为思想品德行为习惯，思想品德认识、情感、信念、意志才能得到巩固，才能凝结为一个人具有稳定倾向性的思想品德。”<sup>[11]84</sup>“勇敢小羊”景观所展现的，不仅是青年在情感层面的自我调适，更是一种潜藏行动意愿的自我表达。思想政治工作若仅停留在情感共鸣与价值澄明的层面，则无法完全回应青

年掩藏在“意义贫困”之下的深层诉求，容易导致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剪刀差。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将青年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知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实践，从而实现从“言说自我”到“践行自我”的跨越。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更要“以行促人”，通过聚合网络平台、网络意见领袖、社群组织者、政策制定者与思想政治教育者，为青年搭建从“勇敢叙事”走向“勇敢实践”的桥梁，引导他们在真实的社会参与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

“要把正确的思想、观念变为群众的行动指南，就需要善于发现和调动人们内在的积极因素。”<sup>[11]105</sup>具体到“勇敢小羊”景观的实践转化中，思想政治教育行动应主动为青年构建从线上情感共同体到线下实践共同体的桥梁，实现从符号认同到行动认同的关键跨越。首先，着力推动青年的“勇敢”实践从私人生活领域向公共生活领域拓展，实现微观行动与宏观价值的链接。“勇敢小羊”叙事中对“一个人解决问题”的颂扬，是青年个体主体性觉醒的萌芽。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以此为基础，联合社区、企业工作者，共同设计低门槛、高认同的公共参与项目，以基层为切入点，把学校大课堂和社会小课堂连接起来。开展社区微更新、技能互换志愿服务、本土文化传承实践等活动，将青年在叙事中珍视的“独立”“坚持”等品质，引导至具有社会价值的集体行动中。在此过程中，关键在于让青年体验到超越个人成就的被需要感和社会效能感，从而理解个体“勇敢”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内在关联，实现从“自愈”到“共益”的行动转向。

其次，政策制定层面必须要求平台积极介入算法塑造的数字生态，打破从自我叙事到情感共鸣，再到再生产的封闭循环，为青年搭建从数字共鸣走向现实行动的桥梁。平台算法在聚合“勇敢小羊”情感共同体的同时，也易使青年沉溺于符号化的自我安慰。因此，网络社交平台方应主动与青年文化

社群展开合作，发挥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策划具有行动导向的线上挑战与线下联动活动。将“勇敢打卡”从记录个人生活困境，转化为参与实体公益行动的分享；将对于“羊村”共同体的怀旧情感，转化为对社区邻里关系的现实情感。通过“线上发起、线下落实”的混合式实践，帮助青年突破信息茧房，在更为复杂的社会场域中强化其自我认同。

最后，引导青年在担当作为中实现从“自我认同”到“社会认同”的价值跃升，完成意义体系的根本性重构。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帮助青年在更广阔的意义系统中重新锚定自我。“勇敢小羊”景观反映了青年在主流意义系统之外的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使命，则是将这种探索中蕴含的积极要素，如对坚韧、互助、公平价值的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有机对接。政策制定者通过顶层设计锚定青年实践的大方向，学校、社会共同组织青年投身于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基层治理等国家战略亟需的领域，使其在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宏大事业中，亲身感受个体力量与社会进步的深刻联系。唯有通过这种深度的社会实践，青年才能超越“逆托邦”式的怀旧幻想，真正将“小羊”的隐喻性勇敢，升华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直面挑战、担当使命的现实勇气，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

#### 参考文献：

- [1] [法]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 王昭风,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3.
- [2] [美]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M]. 杨德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16.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1.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4.
- [5] 项飙专访: 城市新穷人不是经济穷人, 是意义贫困[EB/OL]. (2023-02-03) [2024-04-1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659368125342278&wfr=spider&for=pc>.
- [6] 路阳, 张敦福. 当代青年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贫困与仪式脱贫——以淄博烧烤为例[J]. 探索与争鸣, 2023(08): 109-119+179.
- [7] 温旭. 智能算法助推高校精准思政的逻辑进路[J]. 思想理论教育, 2020(06): 81-85.
- [8] [英]齐格蒙特·鲍曼. 怀旧的乌托邦[M]. 姚伟, 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 [9] [英]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279-280.
- [10] 黄玮杰. 当怀旧成为商品——逆托邦及其批判[J]. 山东社会科学, 2020(12): 106-113.
- [11] 张耀灿, 陈万柏.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陈琴容

# 高质量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 价值意蕴、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王建生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高质量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逻辑是教育与经济的内在耦合性。职业教育的培育对象、内容及目标契合新质生产力提升人力资本的质态层级、重构劳动资料的质态内涵、拓展劳动对象的质态边界的要求。然而, 当前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在教育理念、专业布局、产教融合等方面存在挑战。为此, 应多维度转变理念, 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 凝聚内外合力, 对接需求优化专业布局; 深化产教融合, 构建协同育人新生态;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新动能。

**关键词:** 高质量职业教育; 新质生产力; 价值意蕴; 现实挑战; 实践进路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 (2026) 01-066-06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原创性经济概念, 将其视为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2024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出明确要求, 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强调要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sup>[1]</sup>这一论述基于对经济与教育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 指明了教育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当前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聚焦两个角度: 一是从学理性的角度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特征进行剖析; 二是从实用性的角度以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为主要研究视角探究如何推动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关于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基于经典的赋能授权理论, 研究侧重在利用新质生产力的优势与成果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实际上, 经济与教育有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 特别是作为面向产业、面向社会、面向经济的职业教育, 其高质量发展不仅深受生产力的影响, 同时又能为生产力提供重要驱动力<sup>[2]</sup>, 两者具有内在耦合性与互塑性。职业教育与经济、产业、社会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立足已有研究, 解析时代语境下的新质生产力内涵, 聚焦高质量职业教育带来的外溢效应, 探讨其赋能的价值意蕴, 结合对福州多所职业院校及在榕的涉及通信、新能源、半导体、机械等50多个行业100多家企业的调研, 明确赋能困境, 以期为新质生产

**基金项目:** 福州市2025年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高质量职业教育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研究”(2025FZB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建生,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研究方向: 职业教育。

力发展提供理论向导和纾困之道。

### 一、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sup>[3]</sup>新质生产力是在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常态下产生的新型生产力质态。作为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性概念，其内涵是“质”与“新”的交织：包含传统生产力概念的构成要素质性跃升，与时代语境中的新形态新结构等特殊意涵的交融。

#### （一）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质态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生产力三要素依然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构成。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从历次工业革命历程也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是劳动者、劳动工具等动态演进带来的能级跃迁。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动力，驱动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生产方式变革调整，推动劳动力、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便捷化流动，带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动态调整，故新质生产力既以满足人们新的需要为出发点，又是人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质变结果。

#### （二）时代语境中的新形态新结构

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是当下的时代语境，新质生产力以新发展理念为内核，衍生表现出各种新形态新结构。首先，新质生产力表现为创新驱动下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以新技术、新形态为主要内涵的生产力，其发展注重结构的平衡性与整体性。其次，新质生产力是追求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形态。再次，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吸收各国发展经验以及先进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所以开放是其必然的形态。最后，新质生产力是具有人本性的新形态。一方面它的发展将推动社会财富的涌动，实现社会发展成果共享；另一方面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特别是

数字经济和数据要素的极低边际使用成本的特点，呈现出新质生产力的普惠性。

### 二、高质量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

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抢占发展制高点、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先手棋。<sup>[4]</sup>高质量职业教育通过提升人力资本的质态层级、重构劳动资料的质态内涵、拓展劳动对象的质态边界等方式形成适应新时代、新经济、新产业的新型生产力<sup>[5]</sup>，推动其向智能化、融合化、可持续化方向跃迁。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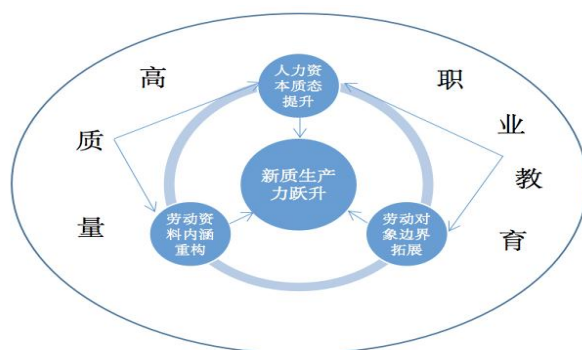


图1 高质量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涌现价值路径图

（一）以劳动者素质为支点，撬动人力资本发展动能

职业教育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方面具有其他教育类型不可比拟的优势，是人力资本开发的“枢纽工程”。<sup>[6]</sup>国内学者认为，高职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高素质人才。<sup>[6]</sup>美国学者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进一步论证了经过教育和培训而形成生产能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sup>[7]</sup>高质量职业教育通过基本性技能劳动者培育与高素质技能创新应用人才供给，推动劳动者从技能存量积累转向能力质态升级，助力提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即劳动者的素质。

1. 培养通用性职业技能劳动者，形成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源规模效应。2025年教育部数据显示，高等职业本专科学校1613所，占全国高等院校的比例为51.7%。如此庞大的规模对产

业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高质量职业教育能够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大量的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应用型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

2. 供给高素质技能应用人才。从社会生产实践发展经验来看，新理论的萌生、新方法的发现、新成果的产出、新领域的形成都离不开人才培养和实践积累。高质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新生态，研学用一体化人才培养的新模式，以赛促教、以赛导学的新趋向等，能够培养一批具备较强数智应用创新能力的人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 （二）优化劳动资料配置，推动技术工具提质升级

新质生产力中的生产工具呈现智能与自动化特点。职业教育与技术的创新发展有着紧密联系<sup>[8]</sup>，当行业技术变革与工具升级出现新需求时，高质量职业教育将教学与实践实训随之调整以实现服务产业的目的。在资源建设方面，融入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在线教学资源，进行新课程开发、搭建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等。在实训实践方面，通过购买设备开设实训课程、开展技能竞赛等途径使学生熟练掌握工具的使用技巧。另外，师生通过校企合作参与生产过程，有益于了解工具特性及存在问题，感知工具升级方向推进工具优化实践。近十年，职业教育累计为全社会培养输送6000余万名技术技能人才，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学校毕业生，为推动先进生产工具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了基础保障和有生力量。<sup>[9]</sup>

### （三）拓展劳动对象范畴，催生新业态与新模式

劳动对象是人的劳动所要施加的最终物。<sup>[10]</sup>

《2023年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高职院校有268

所，专利成果转化数量3300余个，专利成果转化额超过1.6亿元，这表明职业教育的发展使受教育者具备使用新型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能力，进而赋能新质生产力。一方面，高质量职业教育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专业群对接产业链，使专业直接建在产业链上，拓展了劳动对象的范畴与种类；另一方面，通过教学培养劳动者对新型劳动对象的认知与操作能力，促使其在操控复杂劳动对象的过程中探索新业态、新模式。

### 三、高质量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现实挑战

高质量职业教育只有与新质生产力构建起供需适配的耦合共生关系才能实现有效赋能。当前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仍然存在现实困境与挑战。

#### （一）院校目标理念困局——滞后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是不得已的教育选择，认可度低导致难以获得与普通高等教育同质的生源。职业院校也多以培养低层次水平的普通技术工人为定位。发展理念沿袭传统的人才培养观念，导致教学以传统的标准化、模式化的技能传授为主。调研发现，关于职教人才培养对企业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仅11.8%的企业认为“作用显著，是核心人才来源”。95%的企业认为职业教育对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支撑力度“较小”。56.03%企业认为，职教生的主要优势是推动自动化设备、智能机器人等新劳动工具的应用，这从侧面反映出当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度聚焦于低水平的单一技能的机械式训练，培养出的学生综合创新能力不足，难以满足新业态产业升级和转型的需求。

#### （二）专业设置调整被动——“老化”性供给与产业需求失谐

职业教育专业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直接影响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效能。虽然面临产业

结构快速调整的压力,但职业教育专业结构调整总体呈现出的是被动、慢速状态。调研中,62%的企业认为“职业教育在对接产业需求、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方面设置新专业适应新产业不够敏捷,周期较长”。分析多数院校的招生目录可以看到,专业设置老化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一些传统专业的调整优化存在定位偏差,新设置的专业在规模上与实际需求存在出入。

### (三) 产教融合浅层化——难契合新质生产力所需创新范式

产教融合是高质量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原则、必由之路。然而,政策制度不完善、利益诉求不一致、沟通协调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使得校企合作深度受限。企业注重的是应用性强、收益见效快的资源,对长期性的投入缺乏积极性。不少地方政府对于产教融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效应认识不足;或受限于财政资金,没有针对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制定完善的经费补贴和政策优惠等激励制度。而院校方面,更注重教学和科研成果的转化,提供的专业服务难以在短时间内满足企业的利益要求,制约了产教融合的深度。调研数据显示,在协同合作的模式方面,仅27.12%企业表示校企“共同开展技术研发、产品开发或工艺改进项目”,35.59%企业与学校“共建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大多数以实习实训、订单培养为主,存在模式单一性问题。

### (四) 教师发展导向偏差化——工匠创新之师培养受限

对职业教育专业教师的评价应以技能应用、创新服务能力等为核心。但多数职业学校在职称评定、绩效考核方面更注重教师的学术成果或带学生比赛的成绩。存在重理论考核轻实践测评、重比赛轻课堂的问题,使得教师缺乏提升实践应用与创新服务能力的动力。原本参与企业生产实践是破解之钥。然而,当前大部分院校虽对教师有企业实践的要求,但由于监督难效果有限,许多教师长期脱离行业一

线,对新技术、新工艺的了解和掌握不足,在教学过程中难以融入最新的行业动态和技术成果。同时,培训多但针对性不足、重理论缺技术实操等问题,使得职业教育很难培养出综合创新实践能力强的工匠之师。

## 四、高质量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进路

高质量职业教育作为新质生产力要素优化的重要支点,要在把握发展内在规律的基础上,立足现实困境,探索科学系统的改革创新实践方案,从而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 (一) 多维度转变理念,锚定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共生共荣。以多维理念的转变为牵引,树立“大职教观”是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重学历轻技能,职业教育被视为“次等教育”,在招生过程中很难有优质生源,而且职业学校多为中职、高职,更高学历层次的教育资源有限,教育质量参差等问题使职业教育难以突破低层次水平教育的循环怪圈。打造新的发展生态,一是需要转变社会认知。国家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打破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固有偏见,如职普分流就是把“差生”分流到职业教育等。要在社会上形成新的认知,即职普分流是筛选偏好不同教育类型及发展方向的学生,而不是“差生”。科学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大力推进职普融通,完善职业教育“专本硕博”贯通型人才培养路径,吸引适合应用型发展方向的学生选择职业教育。如,黎明职业大学升格为本科职业院校后,吸引很多适合应用型发展方向的学生报考,其录取分数线超过很多公办普通本科院校。这充分彰显了政策引导与院校升级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二是院校要转变育人理念。职业教育的发展应着眼于制造强国建设目标,转变职业教育弱于普通教育的固化思维,摒弃只重

技能的单一性发展理念。根据职教学生理论薄弱、偏好实践操作的特点，分阶段开展教育工作。初阶先以技能夯实为基础使大部分的学生掌握基本的应用操作技能，进阶注重以理论为引领实现技能提升。探索建立跨专业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跨界视野和协同合作能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和职业需求。<sup>[11]</sup>再辅之以工匠精神，涵养学生追求卓越与创新的教育思维，构建与新质生产力适配的教育观和人才观。

## （二）凝聚内外合力，对接需求优化专业布局

职业教育以动态化、前瞻性思维重构专业体系，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人才，进而推进技术突破与产业变革，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然而，仅靠职业院校本身难以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形成市场为导向，政府统筹，学校主建的内外联动格局，实现专业与产业间的良性循环。

1. 注重政府宏观调控。国家要加强对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工作的统筹指导。相关部门要积极关注全球市场产业发展动态，完善专业设置与调整机制。用好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指挥棒，为职业院校调整专业结构、设置新专业提供动态指南。地方主管部门要注重结合本地发展情况，根据本地企业发展状况、用人需求及使用反馈，建立健全本区域技能人才需求预测机制，为本地职业院校设置适应本土市场特殊需求的特色专业提供方向。

2. 压实院校建设责任。作为专业设置的主体，一方面要关注教育部每年公布的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备案和审批结果，分析发展趋势，结合本校情况作出准确的专业设置方向预判。另一方面，紧跟区域经济发展趋势评估本校专业设置情况。诊断存在问题，科学解决专业冗杂问题。根据自身特色与优势，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向，提前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建设市场紧缺专业，适时升级传统专业。应成立专门的调研部门，对区域经济数据、产

业发展状况、就业市场信息等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围绕毕业生就业质量、企业满意度、在岗技能提升情况等建立各专业发展档案并定期开展评估，将评估结果作为调整专业的重要依据。

## （三）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协同育人新生态

“产教融合是衡量职业教育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sup>[12]</sup>是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的核心路径。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应构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1. 完善企业参与激励机制。激励不足是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意愿不强的主要原因。德国是通过发展职业教育为制造业提供持续竞争力的典型国家，在产教融合方面德国有明确的制度规范及完善的激励机制。我国可借鉴德国激励企业参与的先进做法，如建立“职业教育贡献度”评价体系，根据企业的贡献设置对应税收优惠或费用抵扣政策。也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设立专项补贴资金，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每年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申报，以此增强企业的积极性以及长期合作的意愿度。

2. 探索多元校企合作模式。打破单一的订单班与现代学徒制形式，先行先试探索产教融合城市、基地、联盟等新模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中提出，要打造50个产教融合试点城市、1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0个产教融合项目、10000个产教融合型企业。<sup>[13]</sup>结合区域发展需求、院校特色，打造特色融合基地、城市、项目、企业，采用先试点后推广的模式，探索新模式新路径。此外，多方联动组建跨区域、跨行业的产教融合联盟，共建国家级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技术转移中心等载体，比如，职业院校可以通过搭建多层次、多类型的协同创新平台（职教城、产教园区、科创基地、产业学院、校地协同创新中心）<sup>[14]</sup>，以资源共享为牵引，实现产业、创新、人才的有效链接。

(四)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师资队伍是教科研的主体, 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水平与层次, 应从素养内涵着手强化师资建设。

1. 以新型素养为导向完善师资培养体系。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 指出以教育数字化为重要突破口, 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发展新优势。师资发展要注重数智素养, 将数字素养和创新能力系统融入岗前培训、入职后进修学习等环节, 采用理实一体化的培训模式切实提升培训实效。

2. 以“双师型”教师为抓手提升技能应用能力。一是要完善教师的企业实践制度。职业院校需要加强对该项工作的监督与考核, 引入第三方专家考核评估倒逼企业实践出实效。二是实施校企专家团队共建。聘任优秀企业家、技术骨干为院校兼职教师, 以企业导师、辅导讲师等身份参与人才培养, 推动职业院校师资结构提升。同时, 双方增强交流沟通, 立足实际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如将车间搬入高校或将课堂迁入企业, 为教师遍历“产学研”各环节各链条, 提升“理实一体化”素养创造条件。同时探索各院校师资、企业工程师共建共享, 打造市域性“职教大师资”。促进“专精新”等稀缺方向的专业教师、技能大师“共聘互援”。三是优化教学能力评价与激励机制, 引导教师以培养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创新型人才为目标, 利用数智技术夯实课程基础。此外将参与企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纳入职称评审与绩效考核体系, 激发教师参与产教融合与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 2024-02-02 (01).
- [2] 金星霖, 周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职业教育的挑战与应对[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 (03): 53-58.

- [3] 马克思. 资本论: 第1卷(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34.
- [4]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EB/OL]. (2023-09-12) [2025-11-3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3/0912/c1001-40075615.html>.
- [5] 蒲清平, 向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内在逻辑和实现途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 (01): 77-85.
- [6] 杜玉波.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建设[J]. 中国高教研究, 2024 (01): 1-10.
- [7] 马君, 王盼盼. 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4 (01): 88-96.
- [8] 赵丽锦, 戴建平, 马媛.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目标牵引、逻辑解析与实现策略[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4 (03): 25-29.
- [9] 教育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12—2022年)[J]. 职业技术教育, 2022, 43 (24): 69-77.
- [10] 胡莹, 方太坤. 再论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与形成路径——以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为视角[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 (03): 1-13.
- [11] 汤霓, 曾天山, 唐以志. 发展新质生产力, 职业教育如何赋能[N]. 中国青年报, 2024-04-01 (07).
- [12] 贺书霞, 孙超, 冀涛. 数智化赋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探索[J]. 教育与职业, 2024 (03): 23-28.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EB/OL]. (2023-06-08) [2025-12-23]. <https://zfxgk.ndrc.gov.cn/web/iteminfo.jsp?id=20239>.
- [14] 李玉倩.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逻辑与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23 (12): 122-129.

责任编辑: 兰丰丰

#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逻辑、 鲜明特质与实践进路

顾雨萌<sup>1</sup> 李春霞<sup>2</sup>

(1.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99; 2. 中共克拉玛依区委党校, 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独特文化范式, 它集历史传承、多元融合、人民共创于一体, 既承载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精神基因, 又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新成果, 更彰显着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实践品格。就其生成逻辑而言,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两个结合”为根本路径, 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映照, 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的深度演绎; 就其鲜明特质而言,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彰显了人民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价值立场, 展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发展路径, 凸显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相辉映的文明胸怀; 就其实践进路而言,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建构, 应当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相统一, 坚持赓续传承与开拓创新相协同, 坚持独立自主与胸怀天下相融通, 进而形成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以开放为特征的现代化文化发展新格局,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 “两个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 G122;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 (2026) 01-072-10

文化作为社会发展的现实映射与实践产物, 既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内驱力量, 也是时代特征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这一重要概念, 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两个结合”的创造性结晶, 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彰显出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民族特色,

又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念, 焕发出蓬勃的时代活力与创新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构建, 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支撑, 更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贡献了中国智慧, 它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价值理念, 向世界展示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文化发展道路, 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方案。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专项“‘第二个结合’视阈下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路径研究”(24CXWHJ13)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顾雨萌,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李春霞, 中共克拉玛依区委党校教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生成逻辑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成为推动国家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精神标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遵循，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夯实文化根基，并依托“两个结合”的实践路径开拓创新格局，既在理论维度构建起文化现代化的科学框架，又在历史维度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更在实践维度开创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这三重逻辑协同演进，不仅重构了文化现代化的中国范式，更在全球文明对话中开辟出一条既守根脉又开新局的独特道路。

### （一）理论逻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发展的理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根本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基础。这一理论指引过程，绝非教条式的照搬照抄，而是体现为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和良性互动。

1. 守正铸魂，传承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马克思的文本谱系中，虽无针对“文化”概念的具体阐释，但从其浩繁的著述中仍能管窥到“文化”的多元维度与阐释空间。“文化”一词经常同“文明”互释，二者构成一组具有互文性的概念范畴，其语义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著述中呈现辩证的阐释关系。从广义出发，马克思更多地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强调文化不再是社会生活的附属品，而是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当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人类实践将升维至文明演进的高级历史形态。从狭义上讲，马克思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明确了文化的本质属性，“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

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1]</sup>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经济基础是社会的物质关系总和，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而“文化”归属于社会意识形式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框架中，经济基础的特定历史形态形塑并支配着与之相适配的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结构，“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sup>[2]</sup>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将中国国情、历史传统、时代特征熔铸为一体，从而构建出的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模式。它始终强调文化必须适应并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文化发展全方位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彰显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

2. 与时俱进，中国化探索的理论革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形成、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一脉相承，并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实现了理论创新与实践深化。回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加剧与救亡思潮激荡的双重驱动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仁人志士在华夏大地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热潮，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思想基础，深刻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轨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探究中国国情、系统研判中国社会各阶级特性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深度融合，成功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意义不仅在于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它从理论与实

践的双重维度重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形态，开创了非西方文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全新范式。自1978年始，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根基。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体系，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这些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核心理论集群。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展开系统性战略布局，回应百年变局之下的发展之问、治理之困、文明之思，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树起了新的里程碑。这一系列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形成了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构建的开放的、鲜活的科学理论体系，确保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正确航向与蓬勃生机。

## （二）历史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最深厚的沃土，是区别于其他现代化文化模式的独特基因。构建这一新型文化形态绝非割裂历史、另起炉灶，而是对数千年中华文明积淀的智慧结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1. 溯源固本，深植优秀传统文化根柢。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积淀了仁、信、礼等超越时空价值的核心理念。这些文化基因在现代化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融入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价值内核。具体而言：其一，“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天下观，超越了“怀柔远人”的华夷秩序观，超越了简单的共存，承认差异的存在，强调在多元世界中寻求协调与平衡，与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精神相贯通，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倡议，塑造了文化形态胸怀天下的博大格局。其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核心理念，彰显对宇宙规律和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超越了朴素的哲学观念，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追求人与天地万物的协调共生，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相结合，凝练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特征，成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文化理念。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智慧精华，更是应对当前生态环境困局的重要思想源泉。其三，“革故鼎新，踵事增华”的创新观，源于《周易》，是中国历史上创新思维的集中体现，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革命批判本质相契合，转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强音，为文化形态注入了与时俱进的创新动力。这一过程，是传统价值在现代化语境下的创造性重构，而非简单复活。

2. “两创”赋能，助推中华文脉传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激活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根本方法论，二者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sup>[3]</sup>文化隶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始终与社会存在的动态发展紧密相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是时代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传承与时代需求深度融合的必然选择。“创造性转化”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它要求我们在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立足当下时代特质与发展诉求，筛选出至今仍具借鉴意义的文化内核与表现范式，并对其创新性改造与重构，从而重新焕发其内在的生命力。“创造性转化”聚焦于文化符号、载体与表达方式的现代性重构，解决“如何让传统被看见”的问题，这一过程强调文化形式的适应性。“创新性发展”则更侧重于未来，它要求我们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将中国的发展轨迹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坐标体系内，积极探寻中国发展与全球文明进步的深层关联与共振之处，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

会发展需求相结合,推动文化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向更高层次、更具活力的方向发展。“创新性发展”聚焦于文化意义与功能的现代性拓展,解决“如何让传统被需要”的问题,这一过程突出文化内涵的再生性。“转造性转化”同“创新性发展”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法论,二者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文化形态的塑造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过程,它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两创”促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这不仅为文脉传承提供了理论依据,更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塑造注入了内生动力。

### (三) 实践逻辑:“两个结合”的实践化

实践是理论之源,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生成最根本、最直接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归根结底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践中孕育、锤炼、定型的,并在与世界的开放互动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两个结合”的理论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具体实践巩固根基,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1. 贯通融合,塑造现代化文化新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系统阐述“两个结合”这一重大命题,为新时代理论创新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构成实践论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则形塑价值论内核,二者共同支撑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体系。“第一个结合”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机制,为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理论成果,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内容;“第二个结合”则通过构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对话机制,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夯实理论创新的文化根基,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理论范式。“第一个结合”同“第二个结合”之间并非

割裂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成就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贯通融合,共同构成新时代中国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根本遵循。一方面,“两个结合”是理论逻辑上的贯通融合,“第一个结合”为“第二个结合”筑牢根基,“第二个结合”丰富和拓展了“第一个结合”的内涵;另一方面,“两个结合”是实践逻辑上的贯通融合,“第一个结合”为“第二个结合”创造实践条件,“第二个结合”则为“第一个结合”提供文化动力与实践支撑。“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体两翼”,“第一个结合”为理论创新提供现实土壤,“第二个结合”为理论发展注入精神基因,两者在新时代的互动中,既推动理论创新突破,又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塑造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品格的文化新样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文化动力。

2. 创新路径,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sup>[4]</sup>这一生命体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在传承中华文明基因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彰显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形成既传承历史文脉又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新形态。在理论层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基因,使传统文化获得现代性阐释和科学性表达,完成理论维度的关键跃迁;于实践领域,深度挖掘传统智慧,将其巧妙融入现代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转化为切实有效的治理效能,达成实践层面质的提升;从价值视角,在全球化语境中重构文化叙事,使中华文明从地域性经验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方案,实现价值层面的重大跨越。传统现代化理论构建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框架,本质上是西

方中心主义的认知陷阱，这种线性史观将文化发展简化为“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单向度演进，导致传统文化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打破这一思维桎梏，它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结晶，是“两个结合”在文化领域的生动实践，是具有创新性、生命力和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它并不是简单的文化叠加，而是在深入挖掘和提炼不同文化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化的有机融合与创造性转化，这一有机体系既顺应国家发展需求与时代环境变迁，又在现代化进程中持续引领中国发展道路，从而推动中华文明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跨越式衔接。

## 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鲜明特质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鲜明特质，既是对中华文明基因的传承升华，也是对全球现代化普遍性命题的本土回应。这一文化形态内嵌“民为邦本”的价值内核，重塑文化发展的主体性坐标；秉持“古今辉映”的辩证思维，突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割裂；胸怀“中外交融”的文明自觉，超越文明冲突的认知困境，在多重辩证统一中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包容性与创新性的文化范式。这些特质不仅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独特标识，更以其包容性、创新性与实践性，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存续提供了新范式。

### （一）民为邦本：人民性与先进性的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sup>[5]</sup>的重要论断，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转化，更在新时代语境下赋予其鲜明的实践品格。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本质特征，延续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它彻底贯彻了“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体现在文化创造、享有与发展的全过程。

1. 文化创造主体的人民性。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中国式现代化文

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深深植根于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奋斗历程和精神世界，是文化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灵感迸发的沃土。无论是火热的生产一线，还是生动的改革现场，抑或是平凡的社会生活，都源源不断地为这一文化形态提供着最鲜活的素材和最深厚的底气。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鼓励和保障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文化创造，使文化发展真正成为人民共建共享的事业。

2. 文化服务对象的人民性。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精神文化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文化发展的成果必须由全体人民共享。这体现在文化政策的制定着眼于保障和改善文化民生，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紧紧围绕人民的需求和审美趣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致力于实现均等化和便捷化，让每一位公民都能公平地享有文化资源、便捷地参与文化活动、充分地感受文化魅力。从传统文化服务到数字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共享都彰显了文化服务人民的价值导向，与西方文化市场中文化产品主要作为商品、服务对象侧重于有消费能力群体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3. 文化价值评判的人民性。坚持把人民作为检验文化发展成效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文化产品的好坏、文化服务的优劣、文化政策的成败，不是由少数精英或资本逻辑来判定，而是要看人民是否满意、是否认可、是否能够从中获得精神滋养和思想启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反对脱离大众、无病呻吟的倾向，反对唯票房、唯流量、唯获奖的片面标准，确保文化发展始终沿着健康向上的轨道前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作为实践主体的历史性存在，其物质生产与精神创造活动构成文化形态演进的根本动力，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系统，通过塑造共同的价值认同、

提供实践的思维范式、凝聚行动的精神力量，将分散的个体实践整合成有目的的社会行动。这种整合不是简单地思想灌输，而是通过文化符号的意义建构和价值共识的协商达成在人民主体内部形成自觉的文化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正是通过这种过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人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使文化先进性不再是抽象的理论存在，而是具象化为日常实践中的价值选择与行动方向。

### （二）古今辉映：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成功地破解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二元对立的难题，它不是以否定传统为代价来换取现代化，而是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追求相结合，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辩证否定的、创新发展的有机联系，实现了古今辉映。

1. 文化基因的延续升华。在当今时代，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且交融的态势，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理念不仅没有被抛弃，反而在现代化语境中被重新激活和赋予新义，成为构建现代价值体系、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的重要资源，如“仁爱”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转化。无论是古代变法、近代革新以及党的自我革命都彰显了中华民族敢于突破旧有体制、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与现代社会对创新的追求一脉相承，激励着当代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不断探索、大胆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携带着深刻的中华文明烙印，具有无可替代的民族身份识别度。它不是漂浮在历史断层上的“无根”文化，而是有着深厚历史纵深感和文化连续性的稳定结构。

2. 文化表达形式的创新融合。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合主要体现在通过现代技术、媒介与艺术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表达，使其既保留传统内核，又符合现代审美与传播需求。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实践在相互交融中拓展文化表达边界，不仅是对传统

文化的创新性传承，更是对现代文化生态的丰富与拓展。这种融合通过技术赋能、媒介转型和艺术跨界，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内核的同时通过现代手段放大其魅力，吸引年轻一代的关注和热爱，实现传统文化从“保下来”到“活起来”再到“潮起来”的跨越，实现了形神兼备的创造性转化，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为人类数字文明时代的艺术创新提供了东方方案。

3. 发展路径的自主超越。文化符号作为文化的直观载体，成为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融合的关键领域。这种融合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更是在现代语境下对文化内涵的拓展与升华。传统符号承载着特定地域的历史记忆、社会结构与审美情趣，是文化身份与精神内核的象征。在现代化语境下，传统符号通过与新技术、新功能和新审美的结合，实现了单一文化象征向多功能空间元素的转变，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各类现代文化创意产品都体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现代化并非只有去传统化一条道路，传统智慧通过现代洗礼转化为积极资源和独特优势，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为想保持自身文化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范式。

### （三）中外交融：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构建“和而不同”的文明互鉴新格局，以一种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开放包容的胸襟，处理本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实现了民族特色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有机统一。

1. 坚守文化主体性的民族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土壤，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体现在：坚持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用中国审美展现中国形象，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孔子学院通过语言教学与文化展演，促进文化互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协同叙事，拓展

外宣渠道，以跨地域、具象化方式呈现中国文化。海外文化博主通过分享工艺、民俗等内容，直接吸引国际受众，增强中国文化影响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反对文化上的自我贬损和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盲目排外的文化保守主义，倡导在深刻的文化自觉基础上，树立起坚定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使其在全球化浪潮中能够保持定力，不迷失自我。

2. 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胸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坚守自身主体的同时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积极与世界其他文明平等对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文明倡议，深刻阐述了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以双向互动为导向，提升文化产业国际化水平，积极推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国际文化合作，促进典籍互译与人员交流；通过《哪吒》等具有中国价值观的文化产品输出，增强国际文化影响力；引入国外优质文化资源与经验，推动国内外产业融合，在全球竞争中展现民族特色与世界视野。

3. 贡献人类共同价值的世界情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致力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贡献，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中汲取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超越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界限，提炼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它通过自身的发展实践，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中国提出的多个全球倡议都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实践平台，不仅是一条经济合作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之路，它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正是中国文化中“天下大同”“立己达人”思想的现代体现。从《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到中国抗疫合作中展现的国际主义精神，都彰显了这一文化形态所具有的

世界视野和人类关怀。

### 三、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实践进路

理论上的廓清与特质上的辨析，最终要落足于行之有效的实践。全球化与文明互鉴的当代语境下，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构建，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对话的历史必然，也是回应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的时代命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以党建领航的价值导向、守正创新的发展准则、和而不同的文明智慧为三重坐标，系统构建了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中国方案。这一进路既非简单移植西方现代化模板，亦非封闭固守传统范式，而是在引领性与普惠性、传承性与创新性、自主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中，开辟出一条根植本土、面向世界的文化现代化道路。

#### （一）领航聚力：在党的引领下汇聚民心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实现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新时代，紧紧跟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把握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新观点、新论断。

1. 加强文化引领，夯实思想理论基础。“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sup>[6]</sup>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思想领导不是抽象的理论口号，而是贯穿党治国理政全过程的关键密钥，是中国共产党塑造政治认同、凝聚社会共识、引领发展方向的根本所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将其作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在强化思想理论武装的过程中筑牢文化引领根基，其一，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推进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持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研究阐释，将其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清晰的文化发展理念和具体的文化政策，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人民群众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文化

形态的历史必然性与科学真理性，不断增强文化认同与价值共识；其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文化领域的最新成果。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新时代文化理念，明确文化建设在全局中的定位，积极承担新时代文化使命，不断在学习中转化为实践，提高自己的政治能力，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真正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要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推动社会文化风尚的积极转变。特别要加强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主阵地的管理，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确保网络空间清朗，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2. 优化文化治理，提升文化建设效能。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需要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与之相匹配。其一，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能。特别要注重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进行精准调研和分析，通过收集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数据、文化活动的参与反馈、群众文化消费偏好等信息，了解群众的文化需求特点和变化趋势，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打造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的服务新业态，精准对接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切实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其二，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建立健全文化权益保障制度，确保不同群体在文化参与、文化消费、文化创造等方面的平等权利；通过建立文化权益监督机制，设立投诉热线和网络平台等，及时受理群众关于文化权益受损的投诉，并进行有效处理，维护群众的合法文化权益；建设高

标准文化市场体系，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其三，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文化领域“放管服”改革，厘清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推动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定和实施更具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的文化发展规划，形成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合力。加大对基层文化人才的培养力度，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基层文化人才培养体系，定期组织基层文化工作者参加业务培训、学术交流、实践锻炼等活动，提升他们的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对优秀的文化企业人才和文化创意人才提供创业扶持、项目资助等政策支持，激发人才创造活力。

## （二）守正创新：于传承赓续中开拓进取

守正创新是构建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重要方法论，“两个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发展的核心动力。要着力深化“第二个结合”，铸牢文化主体性。

1. 探寻传统民俗源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sup>[4]</sup>文化是民族传承的血脉基因，从古老的文字符号到深邃的哲学思想，从庄重的祭祀仪式到精美的传统手工艺，无不镌刻着民族前行的足迹，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瑰宝，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智慧与价值追求。传统民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基因和精神追求，通过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并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为现代社会注入文化活力，为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深厚支撑。一方面，加强对中华文明起源、特质与当代价值的系统性研究。通过田野调查、文献研究等方式，系统梳理传统民俗的历史源流、文化内

涵和表现形式，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深刻揭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突出优势的学理基础，为“结合”提供坚实学术支撑。同时可结合现代科技和传播手段，对传统民俗进行创造性转化，如开发民俗主题的文创产品、打造沉浸式民俗体验项目等，在社会层面潜移默化提升文化主体性认识；另一方面，应将民俗文化融入学校教育、社区活动和公共文化服务中，通过讲座、展览、非遗体验等形式，增强公众对民俗文化的认知和认同，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推动中国民俗文化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真正实现“亘古亘今，亦新亦旧”的永续传承，构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精神的当代文化图景。

2.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拓宽文化传播空间。真正的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割裂，而是以“日日新”的姿态赋予其时代生命力。创新创造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动力，能够为文化注入新的内容和形式，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使中华文化在现代语境中焕发新生。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文化传播的方式和渠道发生了深刻变革，通过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活力，拓宽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不仅能够提升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还能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新的动能。其一，鼓励文化创作贴近时代、扎根人民。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现代科学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体系，创作具有时代特征和现代审美的文化产品。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一线，感受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激发灵感，创作生产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避免脱离现实、无病呻吟的创作倾向。其二，促进文化业态与传播手段的创新。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创新文化表达形式，并积极推动文化与科技、旅游、教育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催生新的文化表现形

式，打造文化传播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比如元宇宙文化体验等；其三，创新传播载体，打造传播矩阵。通过图书馆、文化馆等载体，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并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短视频等平台，打造立体化、互动式的文化传播矩阵，扩大文化传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同时要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创新的思维，推动文化创新创造与传播的深度融合，让中华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 （三）和而不同：在独立自主中兼济天下

一个成熟的文化形态，不仅要有强大的内聚力，还要具备有效的对外传播能力和广泛的文明影响力。要能够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与之相匹配的传播与交流格局。

1. 夯实独立自主根基，延承民族精神血脉。“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sup>[7]</sup>不仅要坚持经济领域与政治层面上的独立自主，更要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坚定本土文化自信。一是大力弘扬本土优秀文化，坚持内容为王。推进话语体系创新，转变话语表达方式，善于用鲜活生动的故事、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受众的视角，阐释中国理念、中国道路、中国方案，让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可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二是强化技术赋能，构建融媒体传播矩阵。打造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和主流媒体账号，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形成多渠道、广覆盖、强效果的立体传播网络，牢牢占据传播制高点，在多元文化激荡中，坚守自身精神内核，塑造富有民族特色与时代活力的精神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

翻版。”<sup>[8]</sup>我们应紧跟社会变革的步伐，在历史的传承中汲取力量，在未来的征程中持续创新，让独立自主的精神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土壤，让民族精神的薪火代代相传，中华民族必将以更加自信、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2. 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充分承认并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大力加强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一要优化叙事策略，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立足当代国际发展大势，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既要讲清楚中国是什么、在做什么，更要讲清楚背后的思想、精神、价值。善于运用各类文化载体，如文物、文艺作品、影视节目、学术交流等，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当代中国的勃勃生机。二要拓展传播渠道，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完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各类对外传播资源，系统构建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视野的新型文化形态，通过凝练融通中外的文化话语体系，创新理论阐释与实践表达，实现对多元文化资源的高效整合与创造性转化。支持国内媒体平台国际化发展，同时善于借助国外主流媒体、社交平台和海外文化机构等渠道发声。持续发挥好孔子学院、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窗口作用。积极构建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如中欧、中法、中拉等文明对话，鼓励民间文化交流，让中国故事、中国声音更好地抵达世

界、触动人心。三要倡导文明对话，贡献全球文明倡议。运用创新思维搭建跨国界、跨文明的对话平台矩阵，推动文化交流向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纵深拓展，持续拓宽世界文明对话的广度与深度，通过平等对话、包容互鉴，与世界各国共同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如气候变化、贫困治理、和平发展等，在交流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天下情怀与独特价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文明力量，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能，共同绘就美美与共的文明画卷。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1.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6.
- [3]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7.
- [4]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0.
- [5]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2（02）.
- [6] 马新建.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基础[N]. 解放军报，2024-09-29（03）.
- [7]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 人民日报，2021-11-17（01）.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6.

责任编辑：陈琴容

# 从沉浸到速食：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叙事异化与消费逻辑

邓欢<sup>1</sup> 王祥礼<sup>2</sup>

(1.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2. 武汉工程大学党委办公室,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电影解说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影像形态迅速崛起，深刻改变了电影文化格局。在消费逻辑下，注意力经济引发流量崇拜、消费导向僭越与价值维度坍缩等文化症候。电影解说短视频将完整电影叙事碎片化、快餐化，牺牲叙事节奏、情感深度与艺术审美，导致叙事异化现象，表现为情节极端压缩、叙事模板化及视听语言降维。这一转变是技术赋权、受众需求转变与商业利益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平台应优化算法与实行内容分级，创作者需平衡商业性与艺术性，受众需重建“慢观看”文化价值。通过三方协同，推动电影解说短视频从流量狂欢转向文化深耕，成为连接电影艺术与大众的桥梁。

**关键词：**电影解说；短视频；叙事异化；消费逻辑

**中图分类号：**G206；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072（2026）01-082-09

电影作为一门综合艺术，承载着叙事的深度、情感的厚度与美学的高度，以其独特的沉浸感构建起观众与艺术世界的精神联结。移动互联网与短视频时代席卷而来，这一传统的艺术消费模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电影解说短视频以“5分钟看完一部电影”“3分钟解析经典片段”等为标签，凭借快节奏、强冲突、高密度的信息输出，剥离电影原有的叙事肌理，用旁白替代镜头语言，用字幕简化情感表达，将艺术创作降维为情节梗概的“速食套餐”，迅速占领大众的碎片化时间，折射出媒介生态的深刻变革，暗藏着叙事逻辑的异化与文化消

费的重构。当观众习惯于在短视频中“速读”电影，传统电影的叙事美学、艺术价值是否会被消解？这种新型影像消费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技术逻辑、受众心理与商业博弈？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时代命题，以电影解说短视频为研究对象，剖析叙事异化的表现形态，解构背后的消费逻辑，为理解数字时代的影像文化变迁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 一、沉浸与速食：电影接受的美学嬗变

电影接受的美学范式始终与数字技术共生演进，始终站在技术革新的前沿地带。当前，数字技术作为新型劳动资料，正在“不断地吸收和内化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逻辑研究”（22BKS06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邓欢，哲学博士，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电影文化与批评；

王祥礼，武汉工程大学党委办公室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个综合的交流机器”<sup>[1]</sup>，为电影叙事话语重构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向度和技术可能。数字时代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兴起，催生了“速食化”的接受新形态，折射出审美逻辑的重构，其背后潜藏着媒介技术、消费心理与艺术价值的复杂博弈。

### （一）影院“凝视”与手机“滑动”：两种接受美学的对比

在电影艺术的发展历程中，影院曾是观众与影像世界对话的核心场域。黑暗的空间、巨大的银幕、环绕的音效，共同构筑起一个让观众暂时脱离现实的独立空间。在这里，观众专注地跟随镜头的流转深入叙事内核，在与角色的共情中完成一场场深度的审美体验。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与短视频技术的兴起，电影的接受场景正悄然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手机屏幕成为新的“观影窗口”，碎片化的时间里，指尖的“滑动”取代了影院中的凝神专注，快速切换的画面与浓缩的信息成为主流。前者依托封闭空间与专注体验，构建起以深度解码、情感共鸣为核心的审美形式；后者则凭借碎片化传播与即时性消费，催生了以效率优先、符号简化为特征的新审美逻辑。

影院构建的“凝视”美学以仪式感为基底，实现了对时空的双重抽离。黑暗环境消解了观众的个体存在感，将注意力强制性聚焦于银幕，使观众形成心理隔绝。观众与电影的关系是对话式的，在镜头的推拉摇移中完成情感的累积与思想的沉淀，在“凝视”中完成对电影叙事的解码，实现“视线交互的破壁，即镜头内与镜头外空间、现实与电影空间的界限打破”。<sup>[2]</sup>

手机端的“滑动”行为重构了电影接受的美学逻辑，将审美体验纳入碎片化的日常生活流。旁白取代镜头成为叙事主导，观众的“凝视”被简化为对信息的被动接收，原有的“看与被看”权力结构崩塌，转化为信息供给与消费的单向关系。电影原有的影像符号被简化，“成为昙花一现的……有形

无实的、唾手可得的、没有价值的、自由自在的物象”<sup>[3]</sup>。如王家卫电影《花样年华》镜头里晃动的霓虹灯光，在解说中可能仅被解读为“表现主角的孤独”，剥离了其与传统都市文化的深层勾连。

### （二）“速食文化”的兴起：短视频时代的注意力分配

在印刷术主导的时代，人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情节的铺陈、思想的发酵，注意力的分配呈现出集中化、持续性的特征。进入影像时代，影像的流动开始分割注意力，但固定的观影时段仍为观众保留了相对完整的接收框架。而当短视频以席卷之势闯入日常生活，这一切悄然改变。首先，短视频时代的注意力分配呈现出“碎片化”与“瞬时性”的特征。一段15秒的电影解说短视频，往往需要在3秒内抛出核心冲突，否则就可能被指尖的滑动无情抛弃。这种“瞬时性”如同快速切换的手电筒光束，在海量内容中短暂停留，难以形成持续的聚焦。其次，算法的介入让注意力分配成为一种“被驯化”的行为。短视频平台通过用户的停留时长、点赞、评论等数据，持续优化推送模型，将最符合用户偏好的内容精准投送。如“3分钟看完”“反转不断”“高能预警”等标签如同速食套餐的标准化配方，通过算法的放大效应占据用户的注意力资源，使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被简化为对“爽点”的单一追求。

传统电影观赏中，注意力的持续投入能够让观众捕捉镜头语言的微妙变化、体会角色情感的细腻转折，从而完成对作品美学价值与思想内涵的深度解码。在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视域中，意义的生成依赖于观众与历史语境的持续对话。“对话既是一个理解事件，也是两者共同参与构成艺术经验普遍性的过程。”<sup>[4]</sup>而短视频的速食消费则斩断了这种对话链条。观众注意力被压缩在信息密度极高的片段里，原有的叙事节奏被打破，情感铺垫被省略，只剩下情节梗概的快速堆砌。观众一旦习惯了用碎片化的注意力“消费”电影，他们失去的不仅是沉

浸体验的愉悦，更是对艺术作品进行深度思考与价值重构的能力。这种变迁背后，隐藏着文化消费从深度到浅表、从自主到被驯化的深刻转向，而电影解说短视频的盛行，正是这一转向在影像文化领域的生动缩影。

### （三）电影解说短视频的用户画像与消费动机

从用户画像来看，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受众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与碎片化特征。数据显示，该受众群体中20~35岁的青年占比超过70%，其中学生与都市白领构成核心用户群。这一群体处于快节奏的生活与工作状态下，时间被切割成无数碎片，难以维持传统影院观影或长视频平台追剧的完整时间投入。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提出的“加速社会”理论在此得到印证，“各种现代时间结构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命定般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这些时间结构是被加速逻辑所支配的”<sup>[5]</sup>。根据这一论断，社会运转速度的不断加快，使得个体不得不适应“时间贫困”的生存状态，而电影解说短视频的“速食化”特质，恰好契合了他们高效获取文化内容的需求。

消费动机的层面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个体面临着海量电影内容的选择困境，电影解说短视频通过提炼核心情节、解析叙事结构，为用户提供了“筛选器”般的认知简化服务，用户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影片的关键信息。例如，对于多线叙事、烧脑复杂的《穆赫兰道》，很多用户会先通过解说短视频理清故事脉络，再决定是否深入观看原片。另一方面，情感性需求则更多指向用户的心理补偿与身份认同。都市青年在高压生活中积累的情绪需要宣泄出口，电影解说短视频中对悬疑、惊悚、温情等类型片的集中呈现，能够快速调动观众的情感共鸣，实现情绪的短暂释放。一名学生或许为了在同学间拥有谈资而观看《长安三万里》的解说，却也在解说短视频中感受到唐诗的意境进而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形成了对这类影片的情感依赖。如此，多元动机的叠加使得电影解说短视频

的用户黏性不断增强，也使电影解说短视频成为当代青年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解构与加速：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叙事变异

电影叙事作为承载情感与思想的艺术载体，在百年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美学体系。从线性叙事的起承转合到非线性叙事的时空折叠，从镜头语言的细腻铺陈到声画蒙太奇的表意张力，都遵循着完整叙事流的创作逻辑。观众跟随情节推进完成对故事内核的解码与情感的沉淀。而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出现，对这一传统叙事范式发起了挑战。它以“解构”为手段，拆解原片的叙事结构、人物关系与符号意义，以“加速”为特征，压缩叙事时间、强化冲突密度、简化情感表达，改变了电影的呈现形态，重塑了观众对叙事的感知方式。

### （一）从完整叙事到“三分钟神话”：情节的极端压缩

传统电影的叙事艺术，始终将完整性视为构建审美体验的基石。正如巴拉兹所言，电影的叙事魔力在于“对寂静的伟大的宇宙式的体验”<sup>[6]</sup>。依赖于情节发展的自然节奏与意义的逐层显现，观众在90~120分钟的观影时长里，完成从“感知”到“理解”再到“共鸣”的审美进阶。电影解说短视频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叙事传统，折射出数字时代的文化逻辑与“符号消费”的异化特征。

其一，情节的极端压缩体现为主干抽离与枝叶剔除的双重操作。传统电影情节发展往往包含核心事件与辅助细节两个层面，辅助细节虽不直接推动剧情，却承担着塑造人物性格、营造叙事氛围的重要功能。而在解说短视频中，“枝叶”被尽数剔除。以《阿甘正传》为例，原片通过阿甘跑步穿越美国的情节，穿插了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等历史背景，并用“巧克力盒”“羽毛”等意象隐喻人生的偶然性，共同构建了影片的史诗感与哲理性。但在“三分钟解说”中，历史背景与意象符号被完全剥离，只剩下“励志故事”的单一意义。其二，极端压缩

导致叙事时间的量子化处理。热奈特在叙事学研究中提出的“时距”概念，强调文本长度与故事时长应保持恒定比例的状态。“无论在美学构思的哪一级，存在不允许任何速度变化的叙事是难以想象的……叙事可以没有时间倒错，却不能没有非等时，或毋宁说没有节奏效果。”<sup>[7]</sup>电影叙事是通过“慢镜头”“长镜头”等手法延长时距，以强化情感张力。而解说短视频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叙事，往往采用“加速蒙太奇”与“时间跳跃”的策略，将故事时间压缩为一个个离散的“叙事节点”。电影情节被压缩为可快速传播的数字符号，其原有的叙事被彻底消解，在无形中重塑观众的叙事认知。

## （二）算法推荐与叙事模板化：“机械复制”的流量商品

在数字内容生产领域，算法推荐机制正以无形的力量重塑着创作生态。算法如同一位隐形的“指挥家”，通过分析用户点击频率、停留时长、互动数据等指标，持续优化内容分发策略，决定着哪些作品能进入大众视野。符合特定叙事模式、能够快速引发共鸣的作品更容易获得高流量，而创作者为了获得算法青睐，会主动模仿这类“爆款模板”。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在此可作注解。场域中不存在孤立的个体或元素，一切意义都由“关系”定义，每个场域有自身的“游戏规则”，不受外部直接控制。<sup>[8]</sup>创作者为了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位置，不得不遵循算法设定的“游戏规则”。

算法推荐的流量导向与叙事模板化的批量生产持续叠加作用，将不可避免导致电影解说短视频陷入本雅明所警示的“机械复制时代”困境，即“隐藏着物性与事性的基本矛盾”<sup>[9]</sup>。电影解说短视频的有限承载力，与原作承载的特定时代语境、创作意图等不可复制的历史价值之间的矛盾，在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中被急剧激化，陷入“自我复制”的创作闭环，从而致使艺术“灵光”的消逝。本雅明指出，传统艺术的“灵光”源于其“独一无二的存

在性”与“对传统的仪式性依附”，而当机械复制技术将作品从特定时空语境中抽离，其超越性的艺术价值便会被消解。<sup>[10]</sup>机械复制技术虽能批量生产艺术品，却无法复制“灵光”所带来的持久感染力。如鲍曼所言：“在机器工业社会下，人只有机械地服从机器的管控，任何创造力都被隐藏，人的自由和个性都被掩盖。”<sup>[11]</sup>因此，模板化思维对创作者创新能力的侵蚀，本质上是对“灵光”生产机制的破坏。如若所有解说都套用同一叙事框架，原片所蕴含的独特文化语境、创作者的个体表达与观众的个性化阐释空间被一并抹去，只剩下可无限复制的符号碎片，观众必然会产生“审美疲劳”。算法推荐与叙事模板化的合谋，将电影解说短视频从“艺术阐释”异化为“机械复制的文化商品”，这与本雅明对技术复制时代艺术命运的担忧高度契合。

## （三）视听语言降维：“高能片段”的感官劫持

电影的视听语言如同精密的织锦，每一缕丝线、画面的光影韵律、声音的层次叠合、镜头的运动节奏都在叙事的经纬中承担着独特的表意功能。在电影解说短视频中，这种精密的视听织锦正被“高能片段”的单向冲击所撕裂。“高能片段”在短视频的传播逻辑中被单独抽离，通过加速剪辑、音量放大、特效包装等手段强化感官刺激，形成对观众注意力的“劫持”效应。一方面，感官劫持表现为对叙事语境的暴力剥离。如《霸王别姬》中程蝶衣拔剑自刎的瞬间，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是因为前文用3小时篇幅铺陈了他从一而终的艺术信仰与时代碾压下的悲剧命运，视听元素的爆发与叙事逻辑形成共振。但在解说短视频中，这一片段常被剪辑为“虞姬自刎”的孤立画面，配以“终极悲剧！”的嘶吼式解说，原有的历史厚度与人性深度被简化为悲情刺激，观众接收到的只是剥离了叙事血肉的视听骨骼。另一方面，感官劫持导致视听符号的意义扁平化。电影的另一视听元素往往承载多重表意功能。而“高能片段”的传播逻辑，要求视听符号

必须指向单一、明确的情绪刺激，多重意义被过滤为“燃”“哭”“爽”等标签化表达。

因此，电影视听语言的降维，并非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感官劫持下的文化选择。传统电影的视听设计遵循“叙事服务”原则，而“高能片段”的创作则遵循“注意力争夺”原则。为了在3秒内抓住观众，画面必须用最强烈的色彩对比，声音必须用最尖锐的频率变化，镜头必须用最快速的剪辑节奏。视听语言不再是叙事的“仆人”，而成为劫持注意力的“武器”。“高能片段”的感官劫持所带来的危害，更在于对观众感知能力的重塑。长期沉浸于被劫持的视听体验中，观众会逐渐丧失对细腻视听语言的感知力。而这种感知力的退化，最终会反向影响电影创作，弱化深层表意，导致电影艺术向感官杂耍滑落。

### 三、流量与消费：注意力经济下的文化症候

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逻辑深刻重塑着文化生产的肌理。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新的生产技术超越以往，将所有旧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予以抛弃，从而形成了新的生活形态。”<sup>[12]</sup>在这一语境下，文化产品的价值评估标准悄然发生转变，从对审美深度与思想厚度的追求，逐渐向流量数据与消费转化倾斜。电影解说短视频生存与发展受制于注意力经济的运行法则。流量成为衡量内容价值的核心指标，消费则是流量变现的直接路径，二者共同构建起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机制。然而，这种机制在提升文化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文化症候。

（一）流量崇拜的异化：注意力经济导致电影解说的同质化

流量作为衡量注意力分配的核心指标，是内容传播效果的量化呈现，逐渐演变为文化生产的终极追求。这一新的消费方式促使电影解说短视频创作者“利用新技术来获取、注解、占有和再次循环媒体内容”<sup>[13]</sup>。对流量的极致崇拜，在电影解说短视

频领域催生出显著的异化现象，而同质化便是其最突出的表现形态。流量成为悬在创作者头顶的指挥棒，算法推荐机制不断强化爆款模板的复制效应，电影解说的个性化表达与深度解读在逐利的洪流中逐渐褪色，形成千篇一律的叙事景观。这便印证了杜威对技术理性的担忧：“人的个性在机器及其技术所创造的理性社会中消散，导致人的内心世界的荒芜。”<sup>[14]</sup>

其一，流量崇拜导致内容选题的扎堆与解读视角的单一。注意力经济的本质是“眼球争夺”，而热门电影天然具有吸引注意力的优势，因此成为解说创作者的首选对象。如《奥本海默》《哪吒2》等影片上映时，平台上的解说视频会呈井喷式增长，且多数内容都聚焦于影片的核心剧情与大众热议的话题，鲜有人关注冷门影片或挖掘主流视角之外的解读维度。其二，算法推荐机制的“正反馈循环”，为流量崇拜下的同质化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关键推力。在算法构建的奖励机制下，创作者的创作决策逐渐被数据反馈绑架，体现出技术理性对创作理性的压制。正如马尔库塞所批判的，技术进步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可能催生出“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既定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退化到这一领域”<sup>[15]</sup>。算法推荐机制下，人的创作感性被关进了技术和科技的笼子，温情解读、哲学思辨等多元风格迅速边缘化。创作与作品本质的错位，是技术理性规训下创作主体性丧失的鲜明印证。

（二）消费导向的僭越：从文化体验到注意力商品的转化

消费时代，文化变成一种可以用来进行“物质交换”的商品，其表现出来的模式化、娱乐化、快餐化等特点，决定了由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必然是扁平化、肤浅化的。“消费的快乐可以让人沉醉其中，摆脱痛苦的煎熬，实质上导致人更

为孤独的状态……娱乐所承诺的自由，不过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sup>[16]</sup>人类习惯于按照文化工业所描绘的方式和模式去生活，内心深处的本性和反思力量被文化工业所遮蔽。消费导向以不容置疑的强势姿态完成对文化领域的僭越，将原本以精神体验为核心的电影解说，异化为可供量化交易的“注意力商品”。其逻辑是，“为了提升消费能力，决不能让消费者休息。他们需要不断被置于新的诱惑之下，以便于一直保持激动状态”<sup>[17]</sup>。这就导致文化逻辑急剧扭转，从以体验为目的转向以消费为目的。

其一，文化符号从其原有的叙事肌理与意义网络中被暴力抽离。电影符号的意义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符号的关联、与整体叙事的互动中生成。但在电影解说短视频中，文化符号被切割为孤立片段，镜头语言的节奏被加速剪辑破坏，原有的意义网络被撕裂，符号便丧失了“灵光”，从有意味的形式降为无意义的奇观。对此，鲍德里亚指出，消费社会的核心在于“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即通过赋予符号新的交换价值使其进入商品流通体系。电影符号的“再商品化”正是遵循这一逻辑。<sup>[18]</sup>符号的交换价值彻底取代了其使用价值，电影解说则成为符号商品化的中介平台，导致观众与电影艺术之间的认知阻隔。其二，消费导向的僭越重塑了观众的文化认知方式。传统观影中，观众与影片的关系是对话式的，通过反复品味镜头语言、琢磨台词深意，形成个性化的理解。而注意力商品的消费则培养出快餐式的认知习惯，观众不再追求深度体验，而是满足于快速获取可消费的文化碎片。其三，消费导向通过制造“虚假需求”，使人们在追逐注意力商品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对真实精神需求的感知。叔本华认为，作为需求与欲望化身的人类，凝聚了成百上千种的欲求，而每一个需求在得到满足的同时，新欲求也会如期而至。“永无止境的欲望和需求却只能够通过较短的时间来

满足。”<sup>[19]</sup>如此一来，一个无限消费意义链就会形成。电影解说本应是帮助观众突破认知局限的桥梁，却在消费导向的操控下，变成了将观众引入浅层消费的诱饵。

### （三）价值维度的坍塌：电影文化的误读与庸俗化传播

在技术理性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空前便捷的表象下，实质性的社会联结日益稀薄。正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所剖析的：“人的实在完全孤立无援，他被安全地抛置于连最小的细节都变成存在这难以忍受的必然性中。”<sup>[20]</sup>萨特所揭示的“存在性孤独”在算法主导的虚拟空间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人们精心打造数字化身，却在这个过程中将真实的自我与他人隔绝开来，而非完整生命存在。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态，是历史记忆的镜像、哲学思考的容器与审美革新的试验场。电影所营造的精神世界，“是叙事或明或暗激起的世界……是被重新讲述的事件和情景”<sup>[21]</sup>。因此，电影既扎根于现实的肌理，又在光影编织中完成对真实的重构，既承载着创作者的表达意图，又在观众的解读中生长出多元的意义。当下，流量成为衡量电影解说短视频的核心标尺，爆款逻辑主导内容生产，电影文化中原有的历史深度、哲学厚度与审美高度被一一剥离，只剩下可供快速消费的娱乐符号，其作为精神启蒙者的身份被降格为情绪抚慰剂，甚至“流量诱饵”。这就容易导致观众丧失内省和深思的能力，以致“对意义的关注度下降，甚至对意义也失去了清晰的定义”<sup>[22]</sup>。

其一，哲学内涵的消解是价值坍塌的重要表现。电影往往蕴含着对存在、真理、自由等哲学命题的影像化思考，需要观众以思辨的姿态参与意义建构。如《黑客帝国》中“红色药丸与蓝色药丸”的选择，并非单纯的虚拟与现实的二元对立，而是对柏拉图“洞穴寓言”的现代回应，探讨着人类对“真实”的认知困境与自由意志的可能性。但在解说短视频

中，这一哲学命题被简化为“选择觉醒还是沉沦”的励志口号，沦为贴满“人生哲理”标签的鸡汤容器。其二，审美体验的降维加剧了电影文化的庸俗化。电影的审美价值在于视觉语言和镜头语言的创造，如色彩象征如何呼应主题内涵，叙事节奏如何引导观众体验。而当速食化的误读与庸俗化成为传播常态时，观众会逐渐丧失对电影文化深层价值的感知能力，形成审美降级的集体无意识。其三，历史感召的扁平化处理遮蔽了观众的历史认知。电影对历史的艺术再现，本应搭建起过去与现在的意义桥梁，通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洪流，让观众在共情中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但在扁平化传播中，影片常被简化为“戏子的爱恨情仇”，历史背景沦为模糊的叙事陪衬。一旦观众习惯通过解说短视频认知历史，便难以理解个体命运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历史认知被降格为碎片化的情感记忆，丧失了“以史为鉴”的反思价值。

#### 四、反思与可能性：电影解说短视频的趋向

如前所述，电影解说短视频在流量与消费的裹挟下，显露出叙事异化、价值坍塌等文化症候，对其走向的反思便有了迫切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平台作为内容分发的枢纽，其算法逻辑与规则设计直接塑造着创作生态；创作者作为内容生产的主体，其在商业利益与艺术追求之间的抉择，决定着解说内容的精神质地；受众作为文化消费的终端，其观看习惯与价值取向的转变，又反向影响着创作与平台的策略调整。三者构成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共同指向电影解说短视频从流量狂欢向文化深耕转型的可能性。

##### （一）平台责任：算法优化与内容分级

在电影解说短视频的生态系统中，平台作为技术架构的搭建者与内容流动的调控者，占据着枢纽性地位，深刻影响着文化生产的导向。因此，要通过算法优化与内容分级的双重举措，打破“唯流量论”的单一评价体系，为多元内容提供差异化的生

存空间，从而在技术效率与文化价值之间建立动态平衡。

其一，算法优化的关键，在于重构流量分配的价值维度，打破“信息茧房”对创作多样性的压制。当前，以用户互动数据为核心的推荐机制，本质上是一种“马太效应”的放大器，高流量内容获得更多曝光，小众化、深度化创作则被边缘化。平台需要在算法模型中注入“文化价值权重”，将思想深度、艺术创新性、历史厚度等难以量化的指标转化为可计算的参数，与流量数据形成互补。例如，对于具有独特解读视角的艺术电影解说，即便初期互动率较低，算法也应给予一定的扶持性曝光，避免其被淹没在爆款内容中。其二，要对不同类型、不同深度的电影解说进行差异化管理，满足多元受众的需求分层。电影解说本身具有丰富的形态，而当前“一刀切”的传播模式，导致深度内容被迫向娱乐化妥协，以适应大众审美。平台需建立基于内容复杂度、受众适配度的分级标准，对速览型内容明确标注“剧情浓缩”，提示其可能存在的信息简化；为深度解读开辟专门的“精品专区”，通过付费订阅、知识付费等模式保障创作者的收益，使其摆脱对流量广告的依赖；对涉及历史、哲学等严肃主题的解说，设立“专业推荐”标签，引导有需求的受众定向获取。

（二）创作者伦理：在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平衡  
商业逻辑与电影艺术的审美追求形成张力，创作者的伦理抉择便成为影响行业走向的关键变量。创作者需要在商业性与艺术性之间建立动态平衡的实践智慧，既要尊重市场规律以实现创作的可持续性，又需坚守艺术底线以守护电影解说的阐释价值，避免在流量狂欢中沦为文化快餐的制造者。

其一，创作者应建立对电影原作的“阐释敬畏”。电影解说作为二次创作，是对原作艺术肌理的准确把握与创造性转化，而非对原作的任意解构或片面解读。本雅明指出：“对作品作评判的不是批评家，

而是艺术本身，它或是借助批评媒介把作品吸收于自身，或是拒绝之并因此而视其为不值得批评的。”<sup>[23]</sup>创作者在商业诱惑面前应保持克制，不为追求“爆款”而刻意放大影片的猎奇元素，不为迎合低俗趣味而消解作品的精神内核，让解说始终成为连接观众与电影艺术的桥梁而非屏障。其二，创作者需保持对审美自觉的关照，在技术呈现与意义阐释之间找到平衡点。雅斯贝尔斯指出：“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器械制造得尽善尽美，但如果人本身不在场，那就毫无用处……在他的历史道路的起点上，他曾面临被自然力量从肉体上消灭的危险，而现在，由他所建立的世界同样威胁着他的本质。”<sup>[24]</sup>因此，只有驾驭“物的依赖关系”，人类劳动才能实现物质生活和审美生活的统一，才能告别分裂的、畸形的、单向度的生活。对于电影解说来说，其商业性往往依赖于剪辑节奏、语言风格等技术层面的吸引力设计，而艺术性则体现在对影片美学风格、叙事技巧的深度解析。

### （三）受众教育：重建“慢观看”的文化价值

在电影解说短视频的传播闭环中，受众并非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文化意义的共同建构者。受众的观看习惯与审美取向，通过点击、评论、转发等行为反向塑造着内容生产的逻辑。

其一，要将“慢观看”的文化价值回归到对电影文本的“沉浸式解码”上。电影的真实性存在于时空的连续性之中，但在对电影解说短视频速览式的观看中被切割为孤立的碎片，而“慢观看”则能让观众在解说的引导下，回溯影片的叙事脉络，品味被忽略的细节。如《教父》中迈克接手家族事务时，眼神从犹豫到决绝的微妙变化，其背后是对权力与道德的复杂考量。这一解码过程需要观众付出时间与注意力成本，从而获得远超即时刺激的审美满足。正如伯格森所言，艺术作品要“把情感铭刻在我们心上”<sup>[25]</sup>，观众才能够感受并理解作品内在的思想、精神和情感，触及作品的“灵魂”，直至

体验生命的“绵延”。可以说，“慢观看”正是为这种生命的“绵延”提供了时间维度的可能。其二，需要构建多层次的教育路径，重建“慢观看”的文化价值。学校教育可将电影鉴赏纳入美育课程，通过解析经典影片与解说视频的异同，培养学生的媒介素养；媒体与文化机构可推出“深度解说”专栏，以“解说+原片片段对照”的形式，示范“慢观看”的方法；平台则可通过设立“慢观看模式”，为选择深度内容的用户提供积分奖励等激励机制。

### 参考文献：

- [1] [新西兰]肖恩·库比特. 数字美学[M]. 赵文书, 王玉括,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60.
- [2] 陆颖. 凝视理论视域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从电影学到图像学的考察[J]. 文艺理论研究, 2021, 41(01): 143-149.
- [3] [英]约翰·伯格. 观看之道[M]. 戴行钺,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44.
- [4] 杨立, 秦明利. 伽达默尔修辞学的诠释学意义[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03): 88-94.
- [5] [德]罗萨. 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 郑作或,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4.
- [6] [匈]巴拉兹·贝拉. 可见的人——电影文化、电影精神[M]. 安利, 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0: 239.
- [7] [法]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54.
- [8] [法]皮埃尔·布迪厄, [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 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 李康,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110-113.
- [9] 卢文超. 艺术事件观下的物性与事性——重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J]. 文学评论, 2019, (04): 64-70.
- [10] [德]瓦尔特·本雅明. 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 本雅明论艺术[M]. 许绮玲, 林志明,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5-55.
- [11] [英]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 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61.
- [12]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4.
- [13] [美]詹金斯.融合文化:新媒体与旧媒介的冲突地带[M].杜永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12.
- [14] [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M].孙有中,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79.
- [15]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2.
- [16] [德]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0.
- [17] [英]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M].仇子明,李兰,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67.
- [18]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
- [19]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73.
- [20]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36.
- [21] 尚必武.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J].外国文学,2009(05):97-105.
- [22]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M].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460.
- [23] [德]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浪漫派的艺术批评概念[M].王炳钧,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9.
- [24] [德]卡尔·雅斯贝尔斯.现时代的人[M].周晓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14.
- [25] [法]伯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M].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2.

责任编辑:郑梅钦

# 习近平在福州实施“堡垒工程”的创新实践 及其时代启示

蔡雄杰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 福建 福州 350014)

**摘要:**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 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十分重视, 紧紧把握住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条生命线, 在福州市全面实施党的“堡垒工程”, 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满足新任务新需要的党组织工作路径, 使福州各级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基层各类事业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深入研究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践探索, 对当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 堡垒工程; 基层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 D267; 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072 (2026) 01-091-06

治国安邦, 重在基层; 管党治党, 重在基础。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根基, 是党组织系统的基础, 能否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党组织系统的战斗堡垒, 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切实地在基层得到贯彻落实, 直接影响到党群关系的和谐。只有基层党组织切实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基层政权得到切实巩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基才能稳固。20世纪90年代, 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 紧紧把握住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条生命线, 在福州市全面实施党的“堡垒工程”, 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新需要的基层党建工作新路子, 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 用三年时间, 将全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使基层党组织成为推动基层各类事业发展及团结带领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归纳与总结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

期间实施党的“堡垒工程”的经验与做法, 对当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一、福州实施“堡垒工程”的时代背景

### (一) 进一步激发农村改革发展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 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 就能够把人类社会不断推向前进。”<sup>[1]</sup> 20世纪80-90年代, 中国农村社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改革浪潮, 深刻影响了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面对新形势, 福州部分基层党组织未能及时转变观念与角色定位, 因循守旧, 工作方式方法陈旧落后, 缺乏创新能力与服务能力, 缺乏壮大集体经济的发展能力, 难以承担领导、凝聚农民推进农村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的责任, 无法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堡垒作用, 影响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面对新形势新任务, 习近平同志认真总结、借鉴过

作者简介: 蔡雄杰, 中共福州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研究方向: 执政党建设。

去成功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党建工作新路子。自1991年起，福州市委实施党的“堡垒工程”建设纲要，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旗帜鲜明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联系群众、纪律严明、富有战斗力的坚强堡垒，以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激发农村改革发展活力。

## （二）着力解决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强基固本作用是实施“堡垒工程”的明确目标。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执政之基，是党带领群众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战斗堡垒。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切实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如果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那么我们上级机关的工作就成了一种自我循环式的“空转”，我们的各项部署、决策也不能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弱化的突出问题，福州市委着重强调要加强党支部核心建设，采取下派干部、结对帮带、限期整顿等形式，解决后进支部转化的问题。通过加强党支部核心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切实加强，领导群众致富能力得到提升，在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切实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针对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实施“达标升级”活动。20世纪80-90年代，福州市部分基层党组织存在软弱涣散、凝聚力战斗力不强的问题，党组织书记不胜任现职，农村干部作风不廉不正、服务群众意识差、服务能力弱，这与当时建设服务型党组织的要求不相适应、与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要求不相适应。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福州市委领导班子全面实施《“堡垒工程”建设三年纲要》，指出要通过“达标升级”等活动，在农村开展“发展一类支部，提高二类支部，转化三类支部”竞赛活动，使不同类型的村级支部都能跃上新台阶，对软弱涣散、脱离群众、不起作用的支部，

采取有力措施，限期整改，经过三年实施，“堡垒工程”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 二、福州实施“堡垒工程”的创新实践

###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力建设，突出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实施“堡垒工程”的根本保证。基层党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担负着直接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的重任。不管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还是基层社会治理任务的完成，都要通过基层党组织来进行，没有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没有基层广大党员作用的发挥，我们党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始终把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改善党的领导作为推动事业的根本保证。1991年他指出，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这是我们今后五至十年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最根本保证。今年要继续按照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各项部署，围绕迎接建党70周年，大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动员和团结全市人民，同心同德认真落实“八五”计划，努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 （二）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权配套建设，筑牢基层基础

基层政权配套建设是实施“堡垒工程”的组织基础。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任务十分繁重，涉及范围广，事务多且杂，仅仅依靠基层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善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统合基层社会各种治理力量，充分发挥基层各类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力量，形成基层党组织统一领导、其他社会力量协调配合的联动治理机制。为了促进形成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力，整合农村各类治理资源，1992年1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抓好农村基层

政权的配套建设，即建立健全村委会和村经济合作组织以及青、妇、兵等群团组织，明确各组织地位，理顺关系，分清职责，各方协力合作，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加强农村基层政权的配套建设，充分发挥社会各方积极性、创造性，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与目标成为当时福州各级党组织与群众的共识，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了切实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福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农村要根据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情况，研究党组织活动方式，合理调整党组织的设置，加强村支部、村委会以及村级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保证农村经济和精神文明的健康协调发展。

### （三）加强基层党组织党员队伍建设，提升履职能力

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是实施“堡垒工程”的关键。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是党组织活力的源泉。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需要通过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也要通过各级党员干部努力工作来完成。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就提出：“再好的规定和制度，也要通过执行者去运用、去操作。执行者工作态度如何，决定着这些制度、规定的实际效果。”<sup>[2]</sup>为了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升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习近平同志把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基础环节来抓。首先，把党员的理论教育作为加强思想建设的切入点。“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sup>[3]</sup>福州市委高度重视在全市党员中系统、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育、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党的基本知识教育，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理论教育引导党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1990年8月，在市级领导干部社会主义理论读书班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和水平，才能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前，识别真伪，坚定正确的立场和方向。”<sup>[4]</sup>其次，注重建立健全党员学习制度。在重视党员理论学习的同时，制订党员教育规划，建立健全学习制度，并把它纳入党建目标责任制和党员目标管理责任制，建立必要的考评机制和学习档案，经常检查督促，认真组织实施。最后，重视发挥各级党校的作用。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发挥各级党校的作用，他经常强调，党校应当成为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办成培训党的领导骨干的学校。当时福州市着重加强各级党校建设，形成市、县（区）、乡三级党校，充分利用党校阵地培训、教育党员干部，在市、县党校领导的配备上都是由党委一把手或副手担任校长。

### （四）加强基层党组织作风建设，锤炼过硬作风

加强与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作风是实施“堡垒工程”的重要抓手。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作风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sup>[5]</sup>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严字当头，坚持从严管党治党。1993年8月30日他在福州市反腐败斗争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党风问题始终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不良的党风会损害党的性质，甚至使党蜕化变质，这已经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际问题，近年来苏东的剧变，就是明证。同时，党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影响到党的形

象、党的威信、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决定着人心向背。党风的好坏，还直接影响到民风 and 精神文明建设。针对当时部分党员干部存在“慵懒散拖”和“不担当、不作为、不落实”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习近平同志大力倡导“马上就办”工作作风。1992年5月8日，在福州市委六届五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指出，“马上就办”加上“真抓实干”。为了解决基层反映突出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建立了市县区领导联合接访和现场办公制度，使得马上就办——办事讲时效、重实效在各级机关中形成良好风气。习近平同志还大力倡导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作为开展工作的基点。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福州市的13个县区走了一遍，从中增强对福州的感性认识。在实际工作中，他尽可能多地深入挂钩联系点，接访群众、现场办公、广泛了解市情，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 （五）加强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

基层党组织制度建设是实施“堡垒工程”的制度保障。制度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工作，具有判别是非、明确规范的作用，纠正错误、强制约束的作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扩大，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环境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党的肌体，在党内产生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这些消极腐败现象损害党群关系，直接影响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为此，福州市当时在1100多个单位实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实行人民代表评议基层所站党风廉政建设制度，还聘请了近2000名社会各阶层人士担任党风廉政工作的监督员，扎实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不断提升服务能力。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规范市场运行，确保新形势催生的新的经济行为有法可依，也确保反腐败斗争有具体标准，当时习近平同志就指出，要加强地

方性立法工作，要建立健全公开监督等制度，特别要在执法部门和直接掌握人、财、物的岗位，建立有效防范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约束机制，从机关、团体和个人的行为规范到办事规则方面，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应当支持和提倡，哪些需要限制或禁止，做到既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又能使执法执纪、惩治腐败有所依据。

### 三、福州实施“堡垒工程”的时代启示

#### （一）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基层党建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基层党组织处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第一线，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和繁重的工作任务，面对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复杂化与多元化的情况，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要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直面新时代新形势变化带来的挑战，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善于从实践中发现原因，并解决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把为人民造福的事情办好办实”<sup>[6]</sup>。从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状况看，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在弱化，有的甚至处于软弱涣散状态，部分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对党建工作缺乏重视，未真正确立抓党建工作是主责主业的意识；党内组织生活流于形式，甚至呈现庸俗化娱乐化趋势，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基层党员干部作风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影响了基层工作的顺利开展与党群关系的和谐。从党员干部素质看，有的党员政治意识淡薄，党性观念不强，责任感缺失，缺乏工作热情和积极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面对这些基层党建问题，迫切要求基层党组织及党员干部根据形势与时代发展的要求，树立正确人生观事业观政绩观，不断提升业务能力，转变工作方式方法，以适应新时代深化“堡垒工程”建设的要求。

（二）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

政治属性是基层党组织的根本属性。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与其他组织的最大不同，在于基层党组织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坚定的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sup>[7]310</sup>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sup>[8]</sup>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突出政治功能。对此，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牢牢把握政治方向，回归政治根本属性，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引领作用，不断强化服务功能，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原则不动摇，坚定不移地把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全面贯彻落实到基层工作的方方面面，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武装全党，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从而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三）坚持党建引领，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堡垒工程”建设的重要任务。基层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离不开基层党组织坚强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必须夯实基层。要有千千万万优秀基层骨干，结合实际情况落实好各项工作。”<sup>[7]317</sup>基层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是基层党组织的基本职责。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sup>[9]</sup>只有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才能把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好。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要把党支部建好建强，选强配好支部领导班子，大力抓好基层党组织的人才队伍、制度机制建设、后期基本保障建设，全面补齐基层社会治理的各种短板，最大限度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具体来说，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基层党组织居于核心地位，要着力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提升组织力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点，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基层组织力，自然而然会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因此，基层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其核心作用，就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基层党组织才能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与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使党的执政基础坚如磐石。

（四）坚持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提升基层党建水平

优秀党员队伍是新时代“堡垒工程”建设的重要人才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sup>[9]</sup>新时代新征程，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历史任务，要如期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必须锻造一支高素质党员队伍。首先，要加强基层党组织作风建设。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只有树立好为民办实事的清廉作风形象，才能引导各基层党员干部争先创优，才能凝聚广大群众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壮丽篇章。其次，基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基层领导班子是基层各项工作的决策者，也是落实上级组织精神的执行者，党的各项政策能否在基层落地生根、发挥作用，关键还要靠这些“关键少数”。为此，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要抓好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选拔管理使用，选好配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再次，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对基层党员的教育。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建设，需要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强化党员理想信念教育，提升党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水平，这是提升基层党建质量的重要保证。特别是在当前数字化时代，要不断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专业素养和工作能力，着力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大数据思维”“互联网思维”，探索应用互联网大数据开展党建工作的新路径，给党建工作理念体系注入新的元素。最后，基层党组织要创新基层党组织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基层党建工作的有效载体和方式，进一步健全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增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基层党组织工作的探索与实践，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认真归纳与总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展基层党建工作的经验与做法，对当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462.
- [2] 中共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 福州市民办事指南[M]. 福州: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1991: 2
- [3]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160.
- [4] 市级领导干部社会主义理论读书班开学[N]. 福州晚报, 1990-08-29 (01).
- [5]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5: 36.
- [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35.
- [7]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8.
- [8] 习近平.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 2022-07-22 (01).
- [9]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01).

责任编辑：郑梅钦

# 《福州党校学报》2026 年征稿启事

《福州党校学报》是由中共福州市委主管、中共福州市委党校主办的社科类综合性期刊。2026 年本刊辟有新时代新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党的建设、治理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社会与文化研究、党校教育研究、福州发展研究等栏目。2026 年本刊重点选题如下：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习近平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
4. 党的全面建设研究
5.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研究
6. 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研究
7.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研究
8.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研究
9.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研究
10. 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
11.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研究
1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研究
13. 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研究
14.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研究
15.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研究
16. 人工智能及其社会化应用研究
1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福州的孕育与实践研究
18. 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路径研究
19. 榕台两岸融合发展研究
20. 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欢迎广大读者、作者来稿，来稿要求如下：

1. 来稿内容包括：题名、作者姓名、工作单位、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作者简介。另附题名的英译。如属基金项目成果，应在篇首地脚标注项目名称和编号。
2. 题名应简明、具体、恰当，一般不超过 20 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题名；摘要一般不超过 300 字；关键词选取 3-5 个能反映文章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
3. 作者简介主要包括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学位和研究方向。在论文末尾注明：单位详细地址、邮编、电子邮箱、联系电话。
4. 正文一般以 8000-12000 字为宜。
5. 参考文献按引文先后在文中标出序号，并与文后参考文献序号一致。
6. 来稿请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本刊电子邮箱：fzdxxb@163.com。作者来稿文责自负，请勿一稿多投；本刊不以任何形式向作者收取审稿费、版面费等。
7. 本刊有权对采用的稿件作适当编辑删改，作者若不同意删改请在稿件上注明。稿件自寄出或发送 2 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来稿一律不退。

《福州党校学报》编辑部